

*August Bebel*

新  
知  
船  
聲

PDG

## 出版者說明

《我的一生》是倍倍尔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全书三卷，叙述的时间从倍倍尔的童年直到一八八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取得初步胜利时止。倍倍尔本来想写到一八九〇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因为他于一九一三年逝世，所以未能实现他的愿望。

在本书所叙述的时期内，倍倍尔在为德国工人阶级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这也反映到本书中来。这里举两个例子，如书中对哥达代表大会上两派合并一事的看法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通过克服拉萨尔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才能实现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买卖”<sup>①</sup>。倍倍尔起先也不同意牺牲原则，但是后来以“统一”为重，竟同意了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向拉萨尔派作了原则上让步的纲领。又如在叙述一八八一年后由于俾斯麦采取了缓和措施而在工人运动内部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并引起了党内争论时，书中只当作一般的意见分歧看待，说它是由于“各个人的气质和性格，通过对一般情况和自己党派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磨擦和意见争执”，没有揭示这次意见分歧的严重性质，事实上这是党内的一场大辩论，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之争。对这种意见分歧，决不能采取调和的态度，只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三二八页。

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粉碎右傾機會主義，才符合黨的利益。

此外，書中對某些人物的評價不很正確，比如書中對拉薩爾的思想和活動雖然有所批判和揭露，但很不够。又比如，倍倍爾在書中袒護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痛恨的赫希柏格。對於希爾施譴責犯了機會主義錯誤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凱澤爾這一事件，書中不但沒有揭露凱澤爾的機會主義錯誤，反而指責希爾施是出於“私人的仇恨”。

因此，當我們閱讀倍倍爾這部有相當史料價值的著作時，不能不採取分析批判的態度。

原書末有一篇考茨基寫的《編者後記》，刪掉不用。

## 奥古斯特·倍倍尔

弗·伊·列宁

倍倍尔的逝世，不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在工人中间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因为倍倍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极为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正在探寻自己的道路，正在探寻自己本身。刚刚从一般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带有个别爆发的性质，例如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就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准备和诞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年代，当这个时期结束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一切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形式已宣告破产（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工人阶级已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历史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大批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空前发展，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而在各个方面所作的全面准备，——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紧

接着的第三个时期就是最近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准备好了的力量定会在许多危机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奥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顽强的斗争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壮大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倍倍尔出生于莱茵河畔科伦城的一个贫穷的普鲁士士官的家里。还在幼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不少荒谬的偏见，直到后来才逐渐地永远地把它抛弃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即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莱茵河畔的居民都向往共和政体。在国民学校里只有两个男孩（倍倍尔是其中的一个）拥护君主政体，他们因此遭到同学们的殴打。倍倍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时，曾得出了一句“格言”，如果把它译成俄语，大意是这样：“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反革命年代以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春天”，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出色的、但为时不久的鼓动工作。这时，倍倍尔还是年轻的旋工助手，他贪婪地读着一八四八年的老活动家出版的自由主义报纸，并且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参加者。倍倍尔摆脱了普鲁士兵营的偏见，逐渐接近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反对社会主义。

但是生活毕竟起了作用，尽管当时在德国由于十多年的反革命压迫而很难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但年轻的工人从阅读拉萨尔的小册子中逐渐接触到马克思。工人生活的条件，以及对社会科学

的认真严肃的研究，促使倍倍尔倾向于社会主义。他自己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十四岁，这时刚从伦敦迁回国内）的帮助更加速了他的这种发展。

当时马克思的敌人散布了一些恶毒的流言，说马克思的党由三个人组成；党的首脑是马克思，他的秘书是恩格斯，他的“代理人”是李卜克内西。尽管某些笨蛋畏避李卜克内西这个侨民“代理人”，但倍倍尔却能够从李卜克内西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同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伟大主张的生动联系，找到同当时建立起来的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生动联系，找到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者。据说，年轻的施工倍倍尔是这样评论李卜克内西的：“在这个人身上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倍倍尔断绝了同自由派的联系，把工人联合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中分离出来，并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站在爱森纳赫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的最前列，这个派别同另一个工人的派别即拉萨尔派作了多年的斗争。

德国社会主义分裂的历史原因，简单说来可归结为下面这一点。当时德国统一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关系下，这种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或者是通过革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就是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

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地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暴虐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

做任何微小的让步。

虽然德国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正确的。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問題也正在于党的基础。

如果说，拉薩尔派向俾斯麦精神献媚或对它“迁就”而没有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危害，那只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这些企图作了最有力、最猛烈的反击。

当問題已在历史上获得解决，德意志帝国建立五年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两个工人政党统一起来，并保证马克思主义在统一的党内的领导地位。

从德国国会成立时起，倍倍尔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德国（以及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策略原则就是对敌人不作丝毫让步，不放过争取工人生活改善即使是很小的改善的任何机会，同时在原则上绝不调和，始终力求实现最终目的，这个政策的原則是由倍倍尔本人或在他直接参加和领导下制定的。

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的、按照普魯士方式和容克意旨加以革新的德国，用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来对付工人政党的成就。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被取消了，它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困难的时期到来了。当时除了敌人的迫害以外，还有内部危机，即在一些主要策略问题上表现了动摇。机会主义者重新抬头，他们因失去合法地位而惊惶失措，并开始唱起哀歌来，他们叫喊要放弃不折不扣的口号，责备自己走得太远了，等等。应当指出，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赫希柏格，在党还很薄弱还不能立即站稳脚跟

的时候，他曾經在財政上帮助过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猛烈地反对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这时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領袖。他及时地看出了危险性，認識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是正确的，因而把党引上了进行不調和的斗争的道路。当时创办了秘密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該报最初在苏黎世出版，后来迁往倫敦，每周运送到德国，它拥有一万个訂戶。机会主义的动摇被彻底消除了。

当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由于人們对杜林的迷恋而产生了另一种动摇。倍倍尔也曾一度被杜林所迷惑。以“左派”面目出現的杜林的拥护者們（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斯特）很快就滾到无政府主义立場上去。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論提出的尖銳的致命的批判，遭到許多党組織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議不許中央机关报再登載这种批評。

但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他們的首領是倍倍尔）很快就認識到各种“新”理論的全部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論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企图一刀两断。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领导下，学会了把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結合起来。当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投票贊同撥款補助輪船公司这个重大問題上大多数站在机会主义立場时，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起来反对党团，經過四个星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八九〇年，施行了十二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废除了。这时再次出現了其性质与七十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党内危机。一方面，以福尔馬尔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准备利用合法性来抛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調和的策略；另一方面，所謂“青年派”則玩弄“左派”儿戏并滾到无政府主义立場上去。这次党内危机所以历时很短，而且并不严重，应当說，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是有莫大功劳的，因为他們給予了两方面的动摇以最坚决的反击。



党开始了广泛而深入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政治組織内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机关以及其他組織内发展起来。身为国会议員、鼓动员和組織者的倍倍尔，在所有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巨大的实际工作是难以計算的。正是由于进行了这些工作，使倍倍尔无可爭辯地被公认为与工人群众最亲近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領袖。

德国党内的最近一次危机就是所謂“伯恩施坦主义”，对于这次危机倍倍尔也采取了最积极的行动。曾經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伯恩施坦，在十九世紀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政党被企图变成实行社会改良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僚中和在知識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拿出全副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緒和他們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諾威和德勒斯頓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演說，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准备和集合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經的阶段。没有一个人象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工人，他能够树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能够成为工人領袖的典范，他能够成为資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所进行的群众斗争中的代表人物和参加者的典范。

原載《列寧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60—296 頁。

## 目 录

序 言	1
第二版序言	3
童年和青年时期	5
学艺和漫游时期	21
回到维茨拉及以后	36
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40
拉薩尔的登場及其后果	61
各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的联合大会	67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80
新的社会现象	82
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91
威廉·李卜克内西	101
工人协会中日益高涨的愤慨	106
一八六六年的灾祸	110
战 后	134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140
个人私事	147
向纽伦堡前进	151
工会运动	166
我的第一次判罪	178
巴門—爱北斐特代表大会以前	180

## 序 言

15

在党內的我的許多同志希望我写一部回忆录，这正合我的心願。既然像我这样的人由于环境的恩賜而取得了富有影响的地位，那么一般人也有权利来了解达到这个地位的情况。还有常常加到我身上的大量的虛伪指責和歪曲批評，也使我认为有理由把真情实况告知大家。

为了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坦白和真誠，否則，把一个人的生平公之于世，就沒有意义了。我的回忆录的讀者，不論他站在哪方面或者属于哪个党派，决不能指責我，說我有所隱瞞或是有所粉飾。我說的是真实情况，即使有的地方，一些人以为我若不談出来还要好些。那种見解我不贊同。沒有不犯錯誤的人，自己承认一个錯誤，往往会使讀者非常感到兴趣并最能使讀者作出正确的評價。

我既然要尽可能写得真实，那就不能依賴我的記憶。記憶在过了一些年后消失了，甚至有些給人印象很深的事件，在若干年里，在各种各样的影响之下也会完全变样。我不仅常从我自己方面，而且常从別人方面得到这种經驗。我許多次在熟人和朋友中間誠心誠意地讲述往年的事件，可是到了后来，例如找到了在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写出来的信件，所讲述的事件却显得完全不同。这使我有这样的看法：法官在一件事已过几年之后不应该听取证人的誓詞。作伪誓的危險性是很大的。

我尽可能地利用了信件、筆記、文件等等，以便确证我的叙述以及我在一定时期的看法的正确性。

16

1

PDG

但在我的生活的某些时期，如果我不想作别人或自己的告密人，保存信件是会发生危险的。这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时期特别是如此，这时我每时每刻都有被抄家或搜身的危险，不管这种搜查是为了想获得控诉我的材料还是为了获得控诉别人的材料。我有很长时期被警察和检察官认为是不可太信任的危险分子。这也許不无道理。由于同样理由，我也禁止自己记日记。

在这里所发表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前一世纪六十年代反社会主义的工人协会的东西里，包括着迄今只有部分地为人所知的材料。自从去年十月底 L. 宗纳曼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逝世以后，除我以外，不再有人对当时的史实有如我这样的认识和亲身经历，并掌握这个材料。我曾希望，我能像以往那样继续进行这个工作。但是使我差不多两年之久不能胜任任何紧张的脑力劳动的疾病，不許我这样做。只要能保持必要的健康，则在第一卷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会有第二卷，也许还有第三卷问世。

柏林，宣尼堡，一九一〇年新年

奥·倍倍尔



## 第二版序言

我的书在销售七万册后，需要再版，我除作了許多更正以外，还在正文中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补充；因为我最近得到的信件和资料促使我来做这些补充。

我还要说明的是，我的回忆录的第二卷也将同第一卷的第二版一同出版。

苏黎世，一九一一年六月

奥·倍倍尔





要想对于一个人作较为精确的判断，就必须熟悉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历史。人的出生是带着某些天赋和特性的；这些天赋和特性的发展，主要以这个人周围的情况为转移，而且可以由环境的教育和榜样来促进或阻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抑制。此后，错误的教育或被抑制的特性是否发挥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是以这个人后来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并且常以他的毅力为转移的。这往往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自我斗争，因为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承受的印象，对于他的感觉和思想影响最大。不管在后来的生活中各种条件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他的青年时代的印象对他总发生着好的和坏的作用，并且常常决定他的行为。

我至少必须承认，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印象和经历，时常这样地控制了我，使我吃力地去抵抗它们，但是我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它们。

人总要有个诞生的地方。

命运使我在1840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杜伊茨—科伦的暗堡。我的父亲约翰·哥特洛普·倍倍尔是第二十五步兵团第三连下士。我的母亲威廉明娜·约翰娜，娘家姓西蒙。我的洗礼证书上写的出生地不是杜伊茨——那时还是一个独立行政区——，而是科伦，这显然是因为那时杜伊茨警备区还是属于科伦要塞，而且是同属一个教区的缘故。

在我出生后所见到的“世界之光”是一盏锡制的油灯所发出的暗淡灯光，它无力地照亮着暗堡里一个大房间的灰色墙壁。这间

18 房屋是臥室，同时也是起居室、会客室、厨房和工作室。据我的母亲說，我出生是在夜晚正九点钟，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那时恰巧号手在暗堡前面吹着归营号，人們都知道，这个号声“自古以来”就是催促兵士們就寝的信号。

天性好作預言的人也許会从这件事事实断定，这預告了我后来对于現行的国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严格說来，在正当下令肃靜的时候，我这么一个普魯士下士的小孩的呱呱声震动了国王暗堡的这个房間的四壁——据說我一生下来就有很宏亮的噪音——，那是违犯軍規的。

但这样推断是錯了。这种暗堡里的生活和后来青年时期的印象把我束縛在偏見的枷鎖中，后来需要很久很久的時間我才从这些偏見中解脫出来。

在这里把我的父亲和母亲略述一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于判断我自己是必要的。我的父亲生于波森省的欧斯特罗沃，他是箍桶匠約翰·倍倍尔的儿子。我认为必須假定倍倍尔族是約在宗教改革时代由德国西南部(符騰堡)迁到东部来的。我所能确定的是，早在一六二五年在克略茨堡(西里西亚省)就有一个姓倍倍尔的。直至今日，这一族在德国西南部还很繁庶。倍倍尔一族自宗教改革时代起，即任公职，因此知名于世。我記得《談譜录》的作者——人文主义者亨利·倍倍尔是杜宾根的教授，于一五一八年逝世。此外，巴塞城还有一位出版家約翰·倍倍尔，于一五一八年出版了托馬斯·莫尔的《烏托邦》。一六六九年前后有一个巴尔塔沙尔·倍倍尔教授居住在阿尔薩斯的斯特拉斯堡。一七九二年前后，又有一位医学博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倍倍尔住在符騰堡的那哥耳。倍倍尔姓氏在德国南部也有，但被訛传为别倍尔。我的父亲从东方迁往西方，是因为在一八二八年同他的學生兄弟奥古斯特来到波森步兵团，大約是第十九团入伍。之后，一八三〇年，

19



波兰人起义爆发，普魯士政府认为应当把波森兵团从該省調开。我的父亲服役的那个步兵团，因为是普魯士联邦卫戍軍的一部，于是奉調改駐联邦要塞美因茨。因此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得以彼此認識。

我的母亲生于旧日的直轄自由市維茨拉的一个老住戶、不甚貧穷的小市民家庭里。她的父亲是面包师兼农夫。家庭人口很多，因此，我的母亲仿照着維茨拉别人家女儿們的先例，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充当使女。她从法兰克福到邻近的美因茨，遂結識了我的父亲。后来，当那个步兵团調回波森省时，由于我父亲照顾他的未婚妻，或許也因为他对莱茵区比对他的故乡更为爱好，于是就退出原来的步兵团，而加入駐防科伦—杜伊茨的第二十五步兵团。他的學生兄弟奥古斯特——我的教父，也照他的榜样轉入了当时在美因茨駐防的第四十步兵团（第八莱茵区輕步兵团）。

当时一个普魯士下士的家庭生活是很困苦的。薪餉远不敷用。在当时普魯士軍界和官場，口粮不足，几乎每人都必須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而勒紧褲带，忍饥挨饿。人們說普魯士是饿大了的，这话倒有点真实。普魯士所以时时刻刻垂涎他国較好的土地，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緣故。我的母亲得到許可，得以開設一个小卖部，那就是說，她有权利将各种零星必需品售給暗堡內的兵士們。我們这个仅有的房間就作为小卖部。直到如今，我心中还浮现着她每晚怎样在菜油灯下把热气騰騰的帶皮馬鈴薯給兵士們裝进磁鉢，每份六个普魯士芬尼。

我們小孩子——一八四一年四月我得了第一个弟弟，一八四二年夏季又得了第二个弟弟——在暗堡中的生活是充滿欢乐的。我們在暗堡里跑来跑去，受到下士們和士兵們的撫愛和調笑。他們出操的时候，住室都空了，我就走进一个房間，把溫特曼下士（也

是我的教父)的六弦琴从墙上取下来,拿它作音乐演习,直到沒有一根弦是完整的为止。为了把这样一种难以約束的音乐演习及其恶果适当地扭轉过来,他用一块木板給我雕成一个形似六弦琴的乐器,把腸弦张在上面。此后,我就同我的弟弟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杜伊茨大街一个院子的門槛上,尽情地撥弄琴弦,这就使住在对門的龙骑兵上尉的两个女儿那么“喜欢”,以致她們常常为了我們的音乐演奏而款待我們些点心或糖果。当然,这种音乐演习妨害不了我的軍事操练。对于軍事操练的鼓励,确是到处都有,簡直是弥漫于大气中。我一穿上第一条裤子和第一件上衣(不消說两件全是由父亲的一件旧軍大衣改做的),就带上必要的武装,站到在暗堡前面空地上操练的兵士旁边或者后面,模仿他們的动作。像我的母亲后来时常很幽默地对我說的,我居然能把那种使兵士們流了許多汗的向左轉、向右轉的动作做得十分熟练,有时指揮官或伍长竟让我去給他們作示范动作。

21 我的父亲对于军队生活的看法渐渐地与他的儿子不同了。像我的母亲常常对我们說的,他固然同他的兄弟一样是一个非常忠实、认真和精明的軍人——一个所謂模范兵士,而且曾有一次由少校在检閱时当着全营嘉奖过的——,可是他在那时已担負了十二年以上的兵役,終于如俗語所說,吃够了士兵生活的滋味。这种事务,当时比现在还要煩瑣,还要拘泥。繁文縟节的勤务,当时正在十分盛行。我的父亲显然不乏独立精神和反抗精神,当时莱茵省正是这种精神的适当園地。因此,他常常在盛怒之下,嘴里咒罵着由操場回到阴郁的暗堡。一八四〇年,在路易·菲力浦和他的梯也尔內閣統治之下,普法之間有发生战争的危險,据說有一天他极为憤激地冲进屋子,他认为一个年青的軍官侮辱了他,他对我的母亲喊道:“妻,若是打起仗来,我射出的第一顆子弹是对一个普魯士軍官发的!”“普魯士軍官”这个詞从一个普魯士下士嘴里說出来,

是使人詫异的，但是不难理解。当时以及以后很久，在普魯士的菜茵区，居民把每个军官和官吏简单叫作“普魯士人”，菜茵区的居民觉得自己并非普魯士人。若是一个年轻人要入伍当兵，就简单地說成：他要做“普魯士人”（低地德語作“普律士人”）。甚至由此产生了一句粗野罵人的話。一八六九年春季，我为了政治事务同李卜克内西去到爱北斐特，在我們住的旅館里，有一个客人看見街上一个军官走过，就对另一个人說：“那个普魯士军官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爱北斐特在那时和現在一样沒有駐軍。

上面所說的显然也是我的父亲所常抱的看法。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当他服兵役十五年后，他身罹重病，成年累月住在軍医院中。眼看着死已临头和家庭的貧困，他再三用強調的語气請求母亲：他死后千万不要把我們这些孩子送进軍人孤儿院，因为这样一来，就負有后来在軍隊中服役九年的义务。想到母亲可能在不得已时还会那样做，他以那种因病而增高的激动一再喊叫道：“如果你竟然那样做，我会在連队面前把孩子們刺杀的”。在激动中，他忽略了自己以后就不再在人世了。

一八四三年春季，我的父亲被派为他早已報名申請的边境稅警，这对于他总算是一个救命的轉机。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全家一部分人步行，一部分人乘坐裝家具的貨車——当时那个地区还没有铁路——，迁往与比利时交界的海曹根拉特。可是我們在这里也居留不久。三个月試用期还未滿，我的父亲就因紧张的夜間勤務而身染重病。我的母亲說那是肌肉炎，我猜想那是关节痛风湿症，又加上了肺結核。我的父亲因未滿試用期，所以仍未脱离軍隊关系。我們只得伴着一个重病人以来时的方式由原路回到科伦去。这对于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

到科伦后，把父亲送到軍医院，我們遵照指示又在杜伊茨暗堡得到一个房間，这次是靠着后面城濠的房間。父亲病了十三个月

之后死了，年三十五岁，而且沒有賦与母亲領得恩給金的权利。父亲死后不久，我們便須离开暗堡。如果不是父亲的孿生兄弟奥古斯特·倍格爾把母亲和我們收留下来，母亲就会被迫迁回她的故乡維茨拉。为了更好地尽到这种責任，他在一八四四年秋季决定同我的母亲結婚。

我的这位继父是在一八四一年九月因完全殘廢免役，脫离了第四十步兵团，每月領取恩餉二塔勒<sup>①</sup>。殘廢的原因是由于喉头炎而失音，不能喊操，嗣后也同样轉为肺癆。他放弃步兵团的职务后，在美因茨軍医院充当警察下士将近二年，此后在科伦的布勞委勒省立反省院充当临时看守人。他原想在邮局謀一职位，但这在当时并不那么簡單，按照习惯須先有一个在职人員死亡或退休，別人才有任用的希望。当时郵政如何，可以一事表示它的特征：一八四四年夏季，我的继父为要取得必要的官厅发的結婚证，曾写信到欧斯特罗沃給他的弟弟，在这封偶然落到我手里的信的住址上，他

23 注明：“发信人請求迅速投递。”由此可見，当时邮件的投递显然是稀少而且迟緩的。我的继父盼望在邮局当一个邮差，等候多年之后，终于在一八四六年十月他正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才把这个职位給了他。

一八四四年夏末，我們迁居到布勞委勒。我当时的父亲在这里的省立大反省院的工作一定是极其繁重的。他也兼作監獄的看守人，獄里是些在反省院里犯了过失而被判拘禁的苦力。反省院是由許多房屋和院落組成的，里面也有园地。这一切都圈在一道高墙之內。院里的成年男子、妇女和青年人都被互相隔离开。我們的住处就在拘押室，要到那里去，必須經過許多由沉重的、鎖閉的大門隔离开的院子。这样，拘押室就与人世隔絕了。每晚，一到

<sup>①</sup> 德国旧时銀币，每塔勒約合三馬克。——譯者

黄昏，就有几十只大大小小的猫头鹰，发出呼啸和尖叫声，围绕房屋飞翔，吓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心惊胆战。这些猫头鹰的巢穴在附近教堂的钟楼上。这个住处，即使不是这样，对于我们小孩子們本来就是不愉快的，对于我们的父母大概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的工作从早晨五点钟开始，一直继续到深夜，是一件非常吃力而且可恼的工作。那时候对待犯人的方式是残酷的。我不只一次从旁看到，被判处特别重刑的幼年人和老年人，不得不受可怕的曲身上綁的刑法。这种刑法是使犯人腹部向下躺在獄室的地上，而后用手铐脚镣把右手与左脚，左手与右脚从背上綁在一起。这还不够，还要用麻布拧成绳連胸带臂勒紧，在背上打成結子。这样，犯人就被捆成一个活肉球，腹部贴地躺着，持续二小时之久。然后把他的镣铐卸下来，但在几个钟头之后，又开始用这种刑法。受酷刑的人的叫喊和呻吟响彻了整幢房屋，这自然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們造成一种恐怖的印象。 24

在布劳委勒，一八四四年秋季我刚刚四岁半，就进了乡村小学，因为年纪小被收为“志願生”。由学校回家，我们必须通过反省院的一个大門，大門是由一个哨兵开門的。有一天，当哨兵开門的时候，我們看见戴在他头上的不是一向用的軍帽，而是一頂高高的、晶亮的鋼盔，我們都吓呆了。这种最早的鋼盔同現时的鋼盔比較起来，真是一个怪物，而且相当沉重。直到那个哨兵向我们厉声嚷道：“孩子們，赶快进来，要不我就把你們关在門外了！”我們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

我們小孩子們在这个反省院里的生活，是很少有变化的。全部生活主要是在反省院的部分围墙里面度过。同时我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有的是烦恼，越来越容易激动，这种激动由于他当时发生肺病而更加剧烈起来。母亲和我们孩子們因此大吃其苦。当父亲在无限的激动下对我们施行沉重的体罰时，母亲不只

一次地抓住父亲的臂膀。如果棒打是教育智慧的最高流露，那末我就一定成为一个真正的模范人物了。但誰敢这样主张呢？无论我成个什么样的人，是与棒打不相干的。

另一方面，父亲也是尽最大努力为我们謀幸福的，无论如何，他总是个好心腸的人。例如，每逢耶穌圣诞节、新年或者复活节，他总是尽其所能，就那有限的财力所許可的限度来使我们欢度佳节。我们的财力也实在是有限得很。父亲每月除住房（两个房間）、取暖和照明免費外，可領到工資約八塔勒。这点錢必須維持五个人，后来是四个人的生活，因为我的最小的弟弟，一个美丽如画的小孩，父亲的寵儿，在一八四五年夏季夭亡了。

25 此时，我父亲的病症迅速加剧，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他結婚后約二年逝世了。我的弟弟和我把继父的死亡看成是沉重压迫的解除。他以可怕的严厉来惩罚我们似乎不合他意的生活表现，这种严厉使我们一见到他就浑身发抖。他引起我们对他的恐惧，而对他亲爱的感觉是我们所沒有的。我的母亲如何忍受她的第二个丈夫的亡故，我不知道；但她在他身边所过的，决不是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她在三年内作了第二次寡妇，我们又成了无父的孤儿。母亲从这次婚姻也沒有得到享受国家补助的权利。现在别无他法，只有迁回她的故乡維茨拉。十一月初，再次把全部家当装在一辆車上，登上往科伦去的旅程。天气坏得很，寒冷，又下雨。到科伦后，把家具卸在莱茵河岸露天的石子路上，以便从那里搭船到科布伦茨，再从科布伦茨搭車循兰河谷上行往維茨拉。当我们夜晚十时登上开往科布伦茨的船时，舱内已經人滿，烟氣瀰漫，使人窒息。因为无人給我們让出地位，我们两个儿童疲倦得要死，倒在紧靠門边的地板上便睡着了，只有疲倦的儿童才能那样睡。到了第五天或第六天，我们终于到达維茨拉。在那里，当时还住着我的外祖母和母亲的三个已結婚的姐妹和一个弟兄。

現在，我們在这里度过我們的真正青年时代了。維茨拉是个风景美丽的小城，当时有一所十分好的国民小学。我們俩最初进了一个貧民小学，学校設在从前属于德意志騎士团的一座大房子——德意志大厦。在宽大的前院左方，有一座二层楼房，歌德所著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女主人公夏綠蒂·布芙曾在这里住过。恰巧后来我的一个表兄弟充当游覽这个夏綠蒂·布芙故居的向导，我因而在这里住过多次。我还記得歌德百年誕辰（一八四九年）庆祝会，会是在微尔巴荷泉水附近举行的，那里还有歌德手植的菩提树。那个泉水从那时起改名为歌德泉。十年后，我又在薩

26

尔斯堡的市立剧院参加了席勒的百年誕辰庆祝会。

数年后，貧民小学并入国民小学，我們叫做免費生；德意志大厦撥为女生校舍。

我同学校和教师大体上相处得都很好，只有唱歌教师不喜欢我。我属于最优秀的学生之列，这就使得我們的几何教师，一个短小而非常好的人，对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特别照顾，使我們窺得了数学的秘密。我們还学习用对数来计算。我喜爱的科目除了算术和几何，还有历史和地理。对于宗教，我不感兴趣——我的母亲是一个开明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妇女，在家中向来不拿宗教来折磨我們——，我学习它，只因为不得不学习。我在这里也誠然是第一流的学生，不过在牧师长的宗教問答課时，我不免有时回答得不合規格，因而受到小小的譴責。

在其他方面，我們的牧师长是一位极可欽敬的人，完全不是伪信徒之流；但是，順便說說，这还是擋不住有一天，更正确些說是有

一夜，有人同他开了个玩笑。那时維茨拉有一种风俗——也許現在还流行着——，把深秋或冬季宰好的鵝挂在外面冻一夜，据說这样会使味道更好。人們把鵝挂在高高的地方，一般是挂在窗子前面。牧师长也照样做了。但次日一早，鵝不見了，而到了第三日早

晨，一副啃得非常乾淨的鵝骨架，却在大門的拉鈴繩上高懸着，骨架上系着一個紙條，上面寫着美麗的詩句：

老表先生早晨好！

昨日我肥今瘦了！

維茨拉全城都笑了，因為在一個小城里，這類事情是很快就傳遍各處的。我料想牧師長也會發笑。

27 我既然學習勤奮，在能力上也處處都居前列，那麼在惡作劇方面——這是有較大活動自由的青年們所不可避免而且是理所當然的——多半也是我帶頭。這就使我在“操行”方面聲名狼藉。尤其在我們的唱歌教師那里，我享有惡名。他主持對外部門的事，就是說，凡是外面向學校報告的各種惡行，都由他來處理犯人。為什麼不是由校長而是由他來主持，我不知道。也許是因為他資格較老，或者因為他身體肥胖，或者因為一種習慣法規定他主持此事。他也很會用那種不易模仿的風度十分有效地揮舞戒尺。當他用他那一雙小小的、胖胖的手在我們的臉上左右打擊時，雖然劈啪作響，疼痛倒是輕些。可是，甚至在那種時刻，我仍不能不欣賞那一雙小小的、胖胖的手。

我們的主要活動場所，有教堂的周圍附近，有昔日最高法院的房舍（它的寬敞房間，近年來充作旅館的堆棧），還有近郊的卡爾斯孟特大堡的遺址，有加本亥姆大道旁的山岩群——加本亥姆地方也有紀念歌德的建築——，在岩石的平頂上我們建築了我們的“碉堡”，還有古老的城牆，尤其是位於高原上的加本亥姆了望台，在秋天我們的劫掠隊從那里出發到馬鈴薯地裡去劫取馬鈴薯來烤着吃。因此，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忍受一家農戶一個多鐘頭的包圍，但我們終於勝利地衝破了包圍。這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人們從碉堡裡早先作過大膽的練習才能爬到碉堡外邊。加本亥姆了望台後來改為所謂的俾斯麥堡。歌德曾經在往來加本亥姆的散步中，常



由这个了望台所在的高地经过，因为从这里看去，兰河谷的景色尽入眼底。其他的消遣就是经常到森林和郊野去游玩，在那些地方我们也做了些毁鸟巢和取鸟卵的顽皮勾当。

我们所谓的“抛索摘果”，是我们夏秋两季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因为在维茨拉周围，水果非常丰富。兰河是一条值得重视的河流，23 夏季给人所想望的游泳机会，冬季给人滑冰运动的可能。有一次在滑冰的时候，我的弟弟在我的近旁把薄薄冻结的冰踏开了一个洞，如果不是他无意中张开两臂把自己在冰上撑住，他无疑会陷在冰下而惨遭灭顶。一个同伴和我把他从水中拉出来，把他带到加本亥姆大道旁的石坡上。在这里，他必须脱下衣服，我们把我们的几件衣服借给他，然后把湿衣绞干，放在那二月里异常温暖的日光下曝晒。几个月后，母亲才知道她的老二的意外事件，这只是因为我们的衣服是由自己洗的，并且尽可能自己来缝补，以免母亲发现这些损坏。

次年，在相似的情形下，我相帮救了我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表哥的性命。他是一个出色的滑冰家，有一天他以飞快的速度向下游的水闸冲来，冰面光亮如镜，所以他沒有看见闸前是一片沒有冻结的水。我惊慌地大声叫他调头。他听到了，但为时已晚。当他转弯的时候，跌了下去。他极度紧张地坚持在冰上面，但他一试图把一条腿拔上来，就又陷下去。当这时候，我赶快把我的长毛线围巾从脖子上取下来（那时代一般都被围巾），又从我旁边一个同伴那里取下一条，把两条结连起来，把一头丢给我的表哥，他幸而接到了。我们才慢慢把他拖到坚固的冰上。他得救了。

我的坏名声在我们的唱歌教师那里渐渐地根深蒂固，他以为一切发生的恶事自然而然地都有我参加。有一次为使一个同学免受不公平的责罚，我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就无情地被視為共犯，尽管我不曾丝毫参与其事，也一同受到了处分。后来党内的同志因为我

29 这种不惜任何代价来主张公道的性格，戏謔地把我划为维护公道的人。当然，我們的唱歌教师常常有正当的理由来制裁我。因此，有一天我为模糊地追求“名誉”的心所驱使，把我的姓名、出生地点和出生日期用刻石体字刻在教堂进口的紅砂石台阶上。一个大钉子作凿子，一块石头当錘子，就是我所使用的工具。这种坏事自然会在下个星期天上教堂时被大家发现，也被唱歌教师发现。后果是几个耳光，并且中午留校三次。这就是說，由上午放学到下午上学时止，我必須耽在“禁閉室”里，直到第二次放学才准回家，这样我就沒有午飯吃了。幸而还好，唱歌教师有一个軟心腸的女儿。第二天中午，我站在禁閉室的窗前，恬靜地观察院中成群的吱吱喳喳的麻雀的自由的时候，她站在她的未婚夫身旁注意到我。她同情我的遭遇，立即到她的父亲那里为我求得完全赦免，亲自来宣告我的自由，开释了我。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受到赦免。如果常有这样的永存的女性的关怀来决定我的命运，那末，我相信，我許多次就会較好地从困难中脫身了。

可是，我也有懂事的一天，我自己对自己說，从現在起你要作个正經的人了。于是就这样办。在維茨拉駐防的狙击营少校的儿子摩里茨·封·格·，是参加我的許多恶作剧的伙伴。学校考試到了。居民中可以参加旁听的只有少校一人，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考試完毕，宣讀成績。奇怪的是，这次成績完全按照操行而定的。全班学生都已得到了自己的成績，只剩下摩里茨和我。单单我們两个人的成績是戊等，就是說这是所有成績之中最坏的。那位少校父亲脸上沒有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回家后摩里茨决不会得到寬恕的。从那天起，我沒有再看見他，他在那次事件之后，直接进了士兵学校。到九十年代，我得悉他在K城充任高級軍事职位。可見頑童秉性对他如同对我一样，是沒有有什么損害的。从那时起，我端正起来，就是說，我不再做招致处罰的事。所以在下

次考試我的成績是丙等，再下一次即我參加的末次考試是甲等。如果當時取決於全班的情緒，我會是兩個得獎者中的一個。當校長要提出第二個優秀學生的名字時，全班喊出了我的名字。但是校長認為我雖然改好了很多，卻還沒有達到得獎的程度。於是我不會得獎就走上了謀生的道路。

我們的物質狀況在維茨拉不能有所改善。我的母親不能要求恤金。她後來從國家得到的唯一補助，是我們兩個幼兒每人每月的十五銀格羅申<sup>①</sup>。這是她不顧她的第一個丈夫的勸阻，而仍申請把我們弟兄二人作為波茨坦軍人孤兒院的候補生才得到的。她為困苦所迫，不得不如此。她固然由於當時她的母親逝世，繼承了分散在維茨拉四周各邊界的五、六小塊田地。她也曾為應急需，賣掉其中的幾塊來維持生活。但此事使她痛心。她的一切打算都集中於為我們保持存留下的財產，使我們不至於貧無立錫之地。一個母親所能為她的兒女犧牲的，我由我自己的母親身上體驗到了。有幾年，我的母親為她的表兄弟——一個手套工人——縫制白色軍用皮手套，每雙工價六克略采，約合二十芬尼。但是，每天所完成的不能超過一雙以上，這份收入，活命不足，卻累死人。可是甚至這件工作，她在幾年後也不得不放棄了，因為她這時也染上了肺癆，在她在世的最後幾年任何工作都不能做了。作為長子，我必須把料理家務瑣事，整理大小房間接替過來。我必須煮咖啡，清理房間，每星期六還要作掃除；還必須擦拭錫器銅器，鋪床疊被等等，這些活動在後來我做手工學徒和當政治犯時很有益處。此後我的母親也不能作飯，我們弟兄兩個每人到一位姨母家吃午飯，她們表示樂於作這種友愛行為。我們輪流由情況較好的親戚家裡為母親帶回

31

<sup>①</sup> 銀幣名，每格羅申合一二·五芬尼。——譯者

一点点她所必需的食物。为着略微改善我們的处境，我决定去充当九柱球的植柱童。每天放学后就到一个花园飯店中的九柱球場道上作植柱工作。通常每晚在将近十点钟时从这里回家，星期日要晚得多。但是，由于这种长时间的曲背弯腰，腰背疼痛异常，每晚都是呻吟着回家。我不得不停止这种工作。另一种我們弟兄俩都参加的工作，是秋季到我們一个姨母的田里去收馬鈴薯。这种工作，如遇雾天，又湿又冷，自早晨七点钟到天黑，真不是件舒服事情。但引誘我們的，是一大袋借以过冬的馬鈴薯作为报酬；此外，我們每晨到田里去时，每人得到以资鼓励的一大块李子糕，这是我們二人非常喜爱的。

当我十三岁、我的弟弟十二岁时，軍人孤儿院来通知，我的弟弟可以进院了。根据医生检查，我因为身体太弱，不能进院。这时我的母亲勇气消沉了；她感觉到她的末日将临，她认为，对于我的弟弟經二年軍訓后有义务服九年軍役的事，已不能負起責任。“你們如果願意当兵，那么等将来你們去志願参加，我不負这个責任”，她这样對我們說。于是我的弟弟进軍人孤儿院的事擱置了，这在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引起了我的热烈天真的兴趣。維茨拉的多数居民由于本城的传统而倾向共和政体。这种思想也感染了青年学生。在有一次关于我們个人的政治見解的討論会上——这一类会是青年学生们所常开的——，表明只有一个同学和我是倾向君主政体的。我們二人因此挨了一頓打。如果說現今我的政敌对于我的“反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示憤慨，因为照他們的意思，君主政体和祖國是同一件事，那么，他們从上述这件事实可以看出——也許使他們感到滿意——原来当他們的父亲和祖父在青春时代天真烂漫地属于反爱国者的时候，我已为祖國受过苦了。在萊茵省，至少在那时，大部分居民是醉心共和政体的。

那时，我的父亲服军役所在的第二十五步兵团的一营，我想它是由巴登战役回防，路过維茨拉小駐，我的母亲的单调生活却因而得到短暂的调剂。那个营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军士是我的母亲原先所认识的。现在他们来拜访我们。由于他们的恳求，我的母亲允许为他们做一顿午餐。她自然不会有什麼赚头。有一天，当两个客人离去时，我听到他们在楼梯上谈话，他们很赞美这餐饭，并且对于我的母亲怎能以这样廉价供应，表示惊奇。

我们青年很感兴趣的事，是那几年中在維茨拉区所发生的农民起义。那时的农民还必须履行封建时代遗留下的种种义务。现在既然一切趋向自由和平等，那么他们也要解除这些负担了。他们聚集了几千人，向布伦菲尔的苏尔木·布伦菲尔侯爵的邸宅出发。队伍照例以一面黑白色的大旗为前导，这表示人们宁愿属于普鲁士，也不愿属于布伦菲尔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扛着各种口径的火枪，但大多数是拿着镰刀、粪叉、锄头、斧头等。在这曾多次发生而从未流过血的队伍后面，照例跟随着維茨拉駐防军来保护侯爵，如果他们不是事先已经出动的話。关于农民领袖和侯爵的会晤在維茨拉流传着很有趣的传说。維茨拉人民的反抗情绪保持了很久。当一八四九年或一八五〇年，普鲁士亲王，就是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由当时的第八莱茵军团司令希尔施菲尔将军陪同作检阅旅行时，也来到維茨拉，在城門前面有人拿骰牌东西抛到他的座車上。我有一个亲戚曾因匆忙地乘机大敲警钟，被判徒刑三年。在維茨拉的革命运动期间，也成立了市民保卫团，虽然我有許多亲戚参加在内，我对它的感觉只是轻视。这也因为他们在演习中的姿势缺乏軍人气概。随着反动势力的恢复，市民保卫团就消失了。

33

一八五三年，我和我的弟弟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六月初，我的母亲去世。她以英雄气概正视她的死亡。在她去世的那天下

午，她感觉到她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她命我们去把她的姐妹们请来。为什么请她们来，她没有说。她的姐妹们到后，她打发我们到房间外边去。我们怀着悲哀的心情长久坐在楼梯上，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最后将近七点钟时，她们由房间里出来了，告诉我们，我们的母亲刚才死去。就在当天夜晚，我们必须收拾起我们的一切什物跟姨母去，对于死去的母亲不得再见一面。这个最可怜的妇人在她的婚姻和寡居生活中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但她总是保持乐观和好兴致。她在三年以内死去了两个丈夫，此外她还死了两个孩子，即除我的小小弟弟之外，还有一个生在我前、我不曾见过的姐姐。对于我们两弟兄，她也一再地使我们度过沉重的疾病。我在一八四八年患伤寒症，在生死之间徘徊了许多星期。此后几年，我又患自发性跛行，不过腿还是长好了。我的弟弟九岁时，在谷仓内玩耍，由梯子的顶层跌到打禾场上，头部受了重伤，脑受了震荡。他也幸免于死亡。我的母亲自己患肺病至少七年。几乎没有一个母亲忍受比这更多的困苦和烦恼了。

34 我现在来到一个姨母家里，她在维茨拉有一个世代代租用的水磨。我的弟弟到另一个姨母家，她的丈夫是面包师。我现在必须在磨坊中辛勤干活。特别使我高兴的是，用我们所有的两头驴把面粉运到乡间交给农民，再运回从他们手里取得的粮食。我最喜欢的，就是只有少量粮食运回来，于是我可以骑着一头驴回到城里。这也是我们那头有耐性的牲口黑驴所容许的，但是我们那头口轻性躁的灰驴就另有一种想法。它显然具有一种像是等级意识的东西，因为它除了所习惯的负荷外，不让任何陌生的东西放在背上。有一天我刚骑在它的背上，它立刻撒腿就跑，把头伸到两条前腿之间，两条后腿用全力向外踢出去。转眼间我就以一个圆弧形飞到街边阳沟里去。我幸而没有损伤。它达到了它的目的，此后我不再干扰它了。

除两头驴以外，我的姨母还有一匹马、许多母牛、一些猪和几十只鸡。因为她还种地，尽管除她的儿子外，还雇了一个磨坊长工——这是当时伙计的称呼——和一个使女，但事情还是做不完。如果伙计没有工夫，我就必须刷洗马和驴，有时还要把马骑到洗马场去。鸡场的管理完全交给我来做。我还要管喂鸡，从鸡窝或随便什么地方拾取鸡蛋，还要清理马棚。这样干到一八五四年的复活节。接着，我离开了学校，这决不是我所欢迎的，如果能继续留在学校，那我就最称心了。

## 学艺和漫游时期

你究竟想干什么？我现在的监护人，我的一位舅父，这样问我。“我想学习矿业！”“那么你有学习的钱吗？”经这一问，我的空想打销了。

我所以想要学习矿业，是因为五十年代初兰河通航达到维茨拉，维茨拉一带的铁矿开采大为发展。原先因运费高昂，利用矿砂无利可图，以致大量矿砂堆积在坑道外面，几乎像废物一样。我既不能学习矿业，就决定去做旋工。有一个白铁匠师傅提议收我做学徒，但我对他没有好感，而且他是个有名的酒徒，我拒绝了他。我所以要学旋工，只是因为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的丈夫是旋工师傅，他是本城有名的能干的人，他愿收我在他那里学艺。事情就这样办了。他根据很奇怪的理山，同意了我的请求。据他说，是他的妻子告诉他，我在教堂里应坚信礼的宗教考试，成绩很好，于是他认为我在其他方面也应该是个有用的小伙子。我诚然不是笨货，但是，如果我敢说我在旋工这一行里成了一个名手，那就不是实话了。那种人自然也有，我的师傅就属于那种人之列，我虽用尽全力，却并

沒有超过一般水平，不过这也无碍于我在三年学艺期滿时的职工作业得到第一等成績。

36 我的体力工作能力受了身体衰弱的影响。我是一个特别孱弱的青年，自然也是因为营养缺乏的緣故。多年来，我們的晚餐每日都是一块不大的面包，塗上薄薄的一层奶油或果子醬。如果我們訴苦——我們天天訴苦——，說我們还餓着呢，母亲照例回答說：“有些时候，袋子虽沒有装满，也要把袋口捆起来的。”一不做，二不休。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一有可能就偷偷地切片面包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事馬上就被我的母亲发觉，惩罚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又做了这种犯罪的事。我虽竭力模仿母亲所切的整齐刀痕，但到晚上这事还是被她发现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怀疑到我的弟弟身上，立即用父亲遗留下来的长米达尺打了他几下。我的弟弟抗議，声明不是他做的，可是母亲认定这是謊話，于是他又挨了第二次打。我当时想承认是我做的，但又觉得这是蠢事；我的弟弟已挨过打了，說不定我会再挨一顿比他更厉害的打。后来当我的弟弟埋怨我不承认自己的罪过时，我也用这个理由安慰他。多年来我的理想就是能好好地饱吃一顿奶油面包，这是可以理解的。

师傅和师母都是很端正而且受人尊重的人。我是完全在他們家里吃飯的，伙食还算好，只是不大丰富。我的学习是严格的，工作時間长，早晨五时开始，直到晚上七时止，中間沒有休息。离开旋床吃飯，飯后又上旋床。每早晨一起床要从走五分钟才到的水井，为师母挑四担水，这样每星期给我四克略采，合十四芬尼。这是我学艺期間的零用钱。每星期很少許我出外，夜晚除特許外，几乎从不出外。星期天也一样，这一天是我們主要的售貨日，农民这天进城来，买些烟斗之类的东西，并且請人修理物品。在傍晚或晚上，才准我出外二、三小时。在这一点上，我算是維茨拉全城受最



苛刻待遇的学徒，在美好的星期天，看見朋友們和伙伴們都去游玩，而我立在店里，等候主顧，为农民們清理他們的骯髒烟斗，我常常气憤得哭起来。只有在星期天上午，在我不再上星期日学校以后，才許我上教堂。我对上教堂并不热心，于是利用机会来躲避教堂。为了保证安全免被識破，我总是先打听出唱什么詩歌，由哪位牧师讲道。但有一个星期天我遇到恶运。在吃晚飯时，师傅問我是否到教堂里去了？我大胆地回答：“去了！”他又問唱的是什么詩歌？我报了号碼，但同时发现那同桌吃飯的两个女儿已忍不住要笑，不禁大吃一惊。当回答第三个問話：“哪位牧师讲道？”时，我又答錯了，她們哄堂大笑。我上当了。原来我到教堂大門去得太早，教堂职员还没有把新的詩歌号碼挂出，而关于牧师的名字我又得到假的消息。师傅乾脆认为，我上教堂看来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以后还是呆在家里吧。这样就把一种美好的自由丧失了。我现在以更大的热情埋头讀書，无选择地讀，大部分自然是讀小說。早在学校时，我就因为帮助同学解答問題或讓他們照抄作业，而对他們居于优越地位，我利用这种地位要求他們借书給我閱讀，作为酬謝。我因此就讀了像《魯濱遜飄流記》和《湯姆叔叔的小屋》<sup>①</sup>等书。现在我用我的几份錢向租书处租书閱讀。我所喜爱的作家之一是哈克兰德，他描写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使我稍稍降低对軍事的热情。再进一步，我閱讀瓦尔特·司考特的著作和斐迪南·司滔萊、路易士·米尔巴赫等人的历史小說。从父亲和继父的遗产中，我們保存了几本历史书。其中有一本很好的希腊和羅馬历史概要，作者的名字我忘記了。此外还有几本普魯士历史书，自然是經官厅检查过的，书中关于勃兰登堡—普魯士的君主、著名的將軍、交戰年月等項記載，我都記得烂熟，能够背誦。我痛切地期待学艺期

① 旧譯《黑奴吁天錄》。——譯者

滿，渴望能跑遍全世界。但并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快。在我學藝期滿的那一天，我的師傅死去，也是死于當時在維茨拉流行的肺癆病。我就處于一個少有的境遇，在我剛成了伙計的那一天就做了經理。沒有另外的伙計，也沒有可以繼續管理營業的兒子；所以師母就決意逐漸出清存貨，停止營業。師母是一位特別美貌的、在她那樣年紀所不常見的精神健旺的婦人，她始終待我很好，我會為她赴湯蹈火。現在，我為她犧牲的精神，表現在過分努力來工作。從五月到八月，我是日出而作，一直工作到夜晚九點鐘，有時還要晚些。一八五八年一月底，商店倒閉，我準備開始我的漫遊。我向師母告別，她除給我每星期十五銀格羅申的應得工資外，還贈我一塔勒的旅費。二月一日，我冒着大雪，開始了我的徒步旅行，我的弟弟，他是學習木工工藝的，送了我一個鐘頭的路程。我們分別時，他痛哭起來，這種感情沖動是我以前沒有在他身上見過的。這應該說是我同他最後一次見面。一八五九年夏季我得到消息，他患嚴重的關節風濕症三天就死了。我成了一家中的最後一人。

我最近的目的地是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我從朗光搭乘火車，當天晚上到達法蘭克福，投宿于卡爾親王棧房。我還不願做工作，兩天後又乘火車往海得爾堡。我所乘的火車，用的是可以放下的紗布窗簾，而不是玻璃窗。當時還有強制攜帶護照的規定，就是說，手工藝徒必須帶一漫遊簿，寫明擬經遊的地區并須由警察機關登記和簽證，誰沒有簽證，誰就要受罰。在許多城市，海得爾堡也是其中之一，當時還有明文規定，手工藝徒必須于早晨八至九時到警察機關受醫師檢查，特別是對於傳染性皮膚病的檢查。誰要是錯過了檢查時間，就必須等到次日才能起程，因為他沒有得到簽證。我就遇到了這種情形，因為我不知道這個規定，到警察局去晚了。我從海得爾堡步行往曼海姆，又由那里到斯派爾，在這裡我找到工作。待遇好，伙食好而且豐富，只是必須在作坊里睡覺，在一個墻

角里安上一张床。后来我在夫賴堡(在巴登)也遇到同样情形。当时手工业中还流行着这种习俗,伙計在师傅那里食宿,而住宿情况常常是极其恶劣的。工資也低,在斯派尔每星期一古尔盾六克略采,約合两个馬克。当我对此提出意見时,师傅认为当年他在外乡的第一次工作崗位上所得的也不过如此。而那是大約十五年前的事了。有一个星期天,我在一个啤酒釀造厂里被人誘去打牌。我完全不懂得玩牌,在短時間內輸去了十八克略采,超过一个星期工資的四分之一。我很是气恼,发誓永不賭錢。我实践了这个誓言。只要春天一到,我就不再在这个作坊受苦了。四月初,我又像術語中所謂的远足,开始漫游。我經過普法尔茨,越过兰道,抵格尔梅謝姆,再渡过萊茵河,回到卡尔斯卢合,上行經過巴登-巴登、欧芬堡、拉尔到夫賴堡(在巴登)。在那里我又获得工作。那年春季,特別需要裁縫帮工,因为我走路輕快,外表看起来又很像人們所想像的裁縫,所以这次旅行中常常在城門口就有裁縫师傅向我攀談,大約他們把我当作他們的剝削对象了。許多人竟不相信我不是裁縫,有些人又向我道歉說,“因为我的外貌完全像个裁縫。”

在夫賴堡我度过一个很舒服的夏天。就夫賴堡的环境來說,是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有迷人的森林,庄园山地是一小块美好的土地,四周有几十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引人游覽。但是对我來說,所缺少的是与志同道合的青年的适当結合。技术人員的聯絡当时还不存在,在我的作坊里我又是唯一的帮工。行会废止了,却还没有新的职工組織。人們以工人身份可能参加的政治性团体也沒有。在德意志,到处还都是反动势力的天下。对于單純的娱乐团体,我既不感兴趣,也沒有錢。这时我听说有个天主教的帮工协会,在卡尔广场有它自己的会舍。当我确实知道它也吸收其他信徒参加时,我当时虽然是耶穌教徒,也参加了該会。 40

在我停留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期間,我在夫賴堡和薩尔斯堡

都是天主教的帮工协会的会员，而且从未后悔过。文化斗争<sup>①</sup>在那时幸而还未发生。因此，这个协会对待异教徒十分宽大。协会主席向来是由神父担任。夫赖堡帮工协会的主席是后来在文化斗争中很著名的阿尔班·司透尔茨教授。全体会员选举一个工长做代表，他是主席以下最重要的人。协会有时举行演讲和讲授各门学科，例如法文。所以它是一种教育协会；至于这些协会后来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能说了。会所有大量的报纸，自然都是天主教的，但总可以由此得知世界上发生些什么事情。这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学校的末期和此后的学艺时期，正是克里米亚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很关心政治。

我与年纪相仿、奋发有为的青年交游的需要，在这里也得到了满足。协会中一些特殊的人们，一些乐生的愉快的青年教士们，能够与年纪相仿的人们结交。我曾有几次同这些年轻的教士度过最快乐的夜晚。这样的晚会，我在一八六〇年三月初从萨尔斯堡回来，路过慕尼黑投宿帮工协会会所时，又欢度一次。会员如离开当地，协会发给游历簿一本，如果他向协会和神父请求补助，这游历簿可以证明他的身份。我至今还保有这样一本，其中第一页是圣约瑟怀中抱着婴儿基督的像。圣约瑟是帮工协会的监护神。协会的创始人考尔平神父当时在科伦，如果我没弄错，他在青年时代就是制鞋匠，我是在布赖斯区夫赖堡有一天听他的演讲而认识他的。

41 一八五八年九月，我急欲继续漫游。我离开了夫赖堡，天气晴朗，经过赫伦谷，越过黑森林向纽斯塔特、多瑙辛根和沙夫好森前进。在那几天，一到下午就可见到一种奇观，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彗星（多那提彗星），发着罕见的光芒，拖着一个特别长的尾巴。在那时，黑森林还保持着它全部的庄严和壮丽。几十年后，斧头和锯

---

① 一八七二——一八七八年俾斯麦对天主教的斗争。——译者

子大片大片地斫伐了这个最壮丽的森林。这是近代发展的要求。在瑞士我是不准停留的。那时普鲁士政府禁止普鲁士手工匠在瑞士逗留。纽恩堡的争端在一年前才在不利于普鲁士政府的情况下告结束。此外，还因手工匠可能接受革命思想，这就必须为国家秩序的利益而加以防范。当我于一八五八年春季向驻卡尔斯卢合的普鲁士使馆申请在瑞士停留的许可证时，根据上述的禁令被拒绝了。

于是我由瑞士方面往君士坦兹，乘船经过波登湖往弗里德里希哈芬，途中遇到风暴，因而晕船。从弗里德里希哈芬步行前进，经过拉文斯堡、比贝拉赫、乌尔姆、奥格斯堡往慕尼黑。当时符腾堡邦各城市有一种制度，漫游的手工艺徒可以领取一种所谓城市赠金，照例是六克路采，使他们避免行乞。这种赠金我到处都心安理得地领取了。自乌尔姆出发时，一个壮健的的罗尔人与我结伴同行，他看来像个屠夫，却是个裁缝。他不用“柏林包”（一个用漆布包裹的捆，一般像大香肠的形式，里面装着日用必需品），却背一个军用背包，穿一件麻布罩衫，这使他看来有点古怪。我们既然缺少金钱，而且一个手工艺徒流浪行乞，从来不算可耻，所以我们每经过乡村，往往敲门求乞。有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乡村，又作了个战略计划：“你取右面，我取左面！”当我来到一家向它求乞的时候，主人的女儿一面给我东西，一面警告我，要注意宪兵就在附近。我听取了这句话。但是到了村外，我看见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虽是在路的那面，看样子，那里的主人定会资助我们两个手工艺徒。我抵擋不住这种引誘，于是毫不迟疑地奔向前去。幸而当我走上六、七级石阶的时候，又把房子端详一番，使我大吃一惊，发现门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王室巴伐利亚宪兵队部。我恭恭敬敬地走过，到村外躺在草地上晒着灿烂的阳光，等候我的旅伴。他终于迈着大步来了，径向那座房子走去，它原来是座落在分配给他的那面的。他不看宅子外面，直上台阶进里面去。我承认，我在这一瞬间

42

不由地哈哈大笑。几秒钟后，那个的罗尔人由宅内冲出，从全部台阶上一跃而下，撒腿就跑。当我笑着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说：他进去后，闻到厨房发出香喷喷的气味，一直向它走去，可是在那里站着个没穿外衣的宪兵，叱问他要干什么。他自然马上看出情况，飞也似的跑出宅子。

次日下午，我們到了达绍。我的旅伴提議，我們两人應該到裁縫师傅那里去探望，我因外表完全像个裁縫，所以不必有所顾虑。这里应說明，向本业师傅探訪，所得的贖贖比乞討所得的多，但負有一种道义上的义务，在探訪时如师傅声称有工作要做，即应接受。想了就做。为謹慎起見，我让那位的罗尔人走在前面。立刻就显出这办法是聪明的。我們走上一家人家的阶梯敲門。的罗尔人一說：“两个新来的裁縫請求帮助”，接待我們的师傅就答道：“欢迎得很，您俩我都很用得着，請把您們的漫游簿給我。”当的罗尔人  
43 迟疑不决地把漫游簿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我赶快向右轉，大踏步跳下阶梯，走出这小鎮。我失去的罗尔人这个旅伴，深觉可惜，他是一个好朋友，可爱的伙伴。

从达绍到慕尼黑，那时有一条笔直的大路，两旁长着茂盛的白楊树。大路的景色被慕尼黑圣母教堂的钟楼所截断，这就是亨利希·海涅所說的“脱靴器”，好像耸立在几里长的大路的尽头。正当我垂头丧气地走着，从后面来了一个农民赶着一辆柳条車，一望而知是往慕尼黑去的。車内的东西用帆布盖着，路程还远，而天色将晚。我恭恭敬敬地探問可否許我搭乘。农民回答的是一口巴伐利亚的德語，我那时还听不懂，但听他的語气，我认为是同意了。于是我上了車子，泰然自若地在篷布上挪动，寻找适当位置。农民一再地向后看，并且对我說点什么，我还是不懂。后来我們到了慕尼黑。車子停在卡尔門一个商店前面。我跳下車来，脫下帽子，恭恭敬敬地为免費搭車而道謝。这时农民将篷布拉开，那布上面粘了

一块好几磅重的奶油。原来我无意中把靴后跟轉入一个仅由篷布盖着的奶油桶里。我一看到惹出禍来，满面通紅，請求原諒，并声明甘愿賠償損失。当时楼上窗口两个少女看着这个情景，也一齐发出一陣大笑。这使我更难为情。但是农民却立刻解脫了我的困窘，他对于我的請求賠償損失粗魯地回答道：“走你的路吧，你什么也沒有！”我不等他說第二遍，几步就跨过了紐好斯街的轉角。后来我每次到了慕尼黑的卡尔門，我就又記起这件事情。

我到慕尼黑那天，适逢建城七百年庆祝大会閉幕，大会持續了一星期，紧接着是十月节。全城居民还陶醉在狂欢中，在玫瑰巷的旅舍中，那时还盛行着濃厚的行会习惯，十月节正在隆重举行。我受到亲热的欢迎，在慕尼黑逗留了整一星期，我感到非常称心滿意。只是我和我的同业虽然竭力寻找工作，却徒劳无功。所有的位置都有人占着，誰也不肯让。我就决定走向累根斯堡。我同一个也往那里去的旅伴先到伊薩尔河，看看能否乘到一个木筏到兰茨胡特去。据说：我們如願在筏上搖槳，可以免費搭乘，而且供給伙食。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就不对了。伊薩尔河那时水浅，河道又很曲折，我的旅伴——一个特里尔人——在前面搖，我在后面搖，他又搖得很笨，以致我們有几次擱浅在沙滩上，惹得掌筏人发脾气，破口大罵。換班时，我同乘客們——一些农民和一个牧师談論起政治来，我談得十分兴奋，掌筏人竟威胁着說，这“該死的普魯士人”如果不停止辯論，就把他拋到伊薩尔河里去。我不再出声了，在这种十月天气去結識伊薩尔河水，我是沒有这种兴趣的。傍晚时，我們在离兰茨胡特几个钟头路程的摩斯堡登岸，走进了旁边的丛林。我們已經航行够了。

黑夜里，受狗的狂吠声的迎接，我們在一个乡村旅舍里找到住处。人們要在次晨赶兰茨胡特的年度集市，所以各房間都已客滿。我們必須在谷仓中睡眠，那里面已經橫七豎八地躺着男男女女儿

十个人。我們挨着冻刚要睡着的时候，又被吵鬧醒了。原来一个躺在干草上的妇人亲眼看到，她的丈夫如何用一些粗魯的表爱举动向那拿灯笼引他进仓住宿的使女致謝。她于是对她的丈夫用地道的巴伐利亚語加以教訓，把所有睡觉的人都吵醒了，并惹得哄堂大笑。早晨，天还漆黑，我們就从仓库里挤出来，因为我們衣服单薄，寒冷不堪，原来我俩睡在一堆干草上面，夜里从相反的方面滚了下来。我們在院中井边盥洗后，又繼續前进。先往兰茨胡特，从那里經艾克穆尔（这个地方以一八〇九年拿破侖在那里战胜奥地利而出名）往累根斯堡。

在累根斯堡，我与一个由布勒斯劳旅行来的同业在一个作坊里工作。旅館中有人劝我，不要接受那个工作，因为师傅是巴伐利亚出名的最粗暴的莽汉，这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但我并未因而气馁。

在累根斯堡的生活值得記述的不多。在与我来往的同行技工中，除那个布勒斯劳人外，沒有一个人有較高的精神需要。誰酒喝得最多，就最受崇拜，竟有人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喝完了一个星期工資。这样我俩星期日晚上多半是到戏院观剧，自然是坐最便宜的座位，每位票价九克路采。有一次我們在一星期中間想看某一出戏，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們放工時間恰好是戏院的开演時間。于是我們同厨妇說好話，請她把晚飯早开半个钟头，我們并把室内的钟相应地撥快。那时在南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师傅那里总是吃热晚飯的。飯后我們赶快換好衣服，奔向戏院。在我們从这边进去的一瞬間，师傅同他的妻恰好从那边进来，邻近教堂的钟也正在这时打七点。現在才是應該放工的时候。我們敗露了。奇怪的是，师傅次日对我們一字不提，只告訴厨妇說：“您听着，卡梯，对那些普魯士人要多加小心，他們昨晚将钟撥快了半点钟。”

在累根斯堡曾去游覽烈士祠，祠在多瑙河上游一个高岭上，由



此可以远眺平原。人所共知的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維希一世，那个“脱意志人”<sup>①</sup>，紀念祠的創建者，当时祠中所立的名人半身像中没有路德像。

一八五八到一八五九年的冬季很长很冷。严寒已由十一月半开始。因与师傅发生争执，我于二月一日不顾寒冷和下雪，登上旅程。这个布勒斯劳人跟我一起走。我们先往慕尼黑去，在那里寻找工作，又是无着。此后，我们继续前进，经过罗森汉，往庫夫施太因。奥地利的入境手續真叫我們头痛。当时在奥地利的边境上，入境的手工艺徒必須提出确有五古尔盾旅費的证明。可是我們沒有这笔錢。于是我們計上心来，利用铁路，由巴伐利亚的末站搭火車到庫夫施太因去。为了尽量打扮成紳士模样，我們把靴子和衣服刷得特別仔細，并且装上一条白領子。我們的詭計如願以償。我們整洁的外表，加上乘火車而来的事实，蒙蔽了边境官吏；未加留难，讓我們通过了。在严寒的天气，一公尺深的雪中，我們徒步經過的罗尔。大雪严寒把羚羊从山里逼了下来，我們在黄昏行程中，听到它們哗哗的呼喚声。我們所十分詫异的是，在这里乞討竟得到很多的錢，而且所得的是有我們現今二馬克那么大的銅錢。第一天晚上进旅館的时候，我們沉重地扛着得来的銅錢。可是當我們次晨清算我們这小小賬目的时候，必須把这种銅錢摊滿了半张餐桌。原来奥地利政府已发行新币，这种銅錢几星期后就一文不值了。这样，关于这个慷慨大方的謎解开了，人們乐于把就要作废的銅錢开銷出去。

过了几天，我們终于經過萊欣哈尔徑向薩尔斯堡出发，在一个艳阳天的下午到达。當我們繞过一个不高的山脊（敏希斯山），看見眼前这个城市及其很多教堂和意大利式建筑当中高聳着薩尔斯

<sup>①</sup> 脱意志人(der Teutsche)系德意志人(der Deutsche)之古写。——譯者

便要寒的时候，我們站住，好像是着了魔。

47 我在后来生活中总觉得是个謎的是，在这些奔波中常常把衣服完全湿透，寒冷不堪，却没有因而得过重病。我的衣着决不足以应付这些困苦，羊毛内衣或者一件外衣已是陌生的奢侈品，一把雨伞对于一个漫游的手工艺徒来说会成为嘲笑和諷刺的对象。我时常把头一天湿透了的、在早晨还有点潮湿的衣服穿上，第二天又有同样的遭遇。青春战胜一切。

在薩尔斯堡我找到工作，而我的旅伴在我用余剩的錢尽力帮助之下，继续往維也納去了。我在薩尔斯堡停留到一八六〇年二月底。大家知道，就形势来说，薩尔斯堡是德意志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因为它那时还是属于德意志，但它也以夏季多雨出名。一八五九年的夏天却是例外，必须承认那是特别好的夏季。但是一八五九年的夏季也是一个有战争的夏季。以奥地利为一方，以意大利和法国为另一方的战争，在北意大利爆发了。因此，当大批各兵种和各民族的军队歌唱着、欢呼着开往南的罗尔的时候，在薩尔斯堡的生活颇饶趣味。几个月后，这些军队垂头丧气地战败而回，后面跟着几百辆车载着受伤的和病弱的人。但是，最初却弥漫着必胜的欢乐信念。我对于这个政治事件异常兴奋，在别的日子既没有錢也没有时间，可是每到星期日，不把所有的报纸差不多全读完不肯离开托馬塞里咖啡館。一个普魯士人当时在奥地利的处境是困难的。因为普魯士延迟了对奥地利的援助，奥地利认为是背信弃义。我当时还算是一个好普魯士人，我就試行为普魯士的政策辯护，但因此遭到不幸。不只一次，为着免得挨打，我不得不离开旅館的餐桌。但后来当的罗尔志願狙击队从維也納、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来到薩尔斯堡，在这里設立招兵处的时候，引起了冒险的乐趣。我就同另一同事——一个烏尔姆人，前往报名志願参加，但答复是只收的罗尔人，不收别处人。在这里留下来既无益处，同

时传聞普魯士在动员，我就决定回故乡报名当志願兵。我即刻写信給我的监护人，請他为这个目的給我寄几塔勒的旅費。过了些时，錢(六塔勒)寄到了，但我已經不再需要拿这笔錢作路費，因为这中間已經締結了維拉法郎加和約。战争結束了。但我在次年春季回維茨拉的时候，这錢对我还是很有用处。

薩尔斯堡的工資，同各地的施工工資一样，也是低微的，因而很难积蓄。我在深秋才以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第一件冬服；而且作为一个誠实人，我不仅節約而且忍饥挨餓，才能每星期如約偿还衣价。除午餐由师傅供給外，我仅靠黑面包和牛奶維持生活。同时心中惴惴不安；工作不多，我又是作坊中最年幼的一人，生怕在新年后遭到解雇。师傅由同事那里知道了这种情形。在我向她和师傅拜年的时候，她安慰我，保证留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我回乡为止。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我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奥地利公使馮·許布納尔男爵在推勒里宮<sup>①</sup>参加新年招待会，会上拿破侖对許布納尔的談話就意味着意大利战争的先声。<sup>②</sup>

薩尔斯堡有一个天主教帮工协会，二百多个會員中至少有三十三个是耶穌教徒，而且几乎全是北德意志人。根据前述原因，我也参加了。协会主席是当地神学院教授舍夫博士。他是一个年輕漂亮的人，而且性情十分和藹和开朗。据說他是属于耶穌会的。他当然知道他的协会中有相当数量的耶穌教徒。

有一次在大会上他公开声明，他最喜爱耶穌教徒，因为他们属于到会最勤者之列。每星期六晚上，他經常举行一个純粹的道德演讲，听讲的人总是很踊跃，不論信仰什么，都可以无顾虑地参加。我和舍夫博士相識了，我常在星期日下午应他的邀請到他的住宅

① 法国皇宮。——譯者

② 拿破侖第三当时說：“我很遺憾，我国政府与貴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如从前那样好。”——譯者

去，談論德國和奧地利的情勢，他發表了驚人的自由觀點。

耶穌聖誕節快到了，協會照例要舉行一個聖誕節慶祝會。會中組織了一個小音樂隊和一個歌詠隊。各隊要借這機會極力表演一番。此外還照舍夫博士的建議，由一些屬於德意志各民族的會員舉行朗誦。我被選為萊茵區的代表，要朗誦一首詩《雪茄煙和人》。練習地點是在舍夫博士的住宅，他用啤酒和麵包款待我們。在練習中發現我幾乎每次都在末韻上犯一個錯誤，我所用的一個字雖合韻押韻，但與詩意不符。舍夫博士諄諄勸告我在慶祝晚會上可不要搞錯了。慶祝會（十二月十九日）到了。顯貴人士參加了這個會！有薩爾斯堡的侯爵主教、聖彼得修道院院長和其他教會人士，也有機關代表。終於輪到我表演了。在我快上場以前，舍夫博士再次關照我要特別注意，我十分鄭重地答應了。但是強有力的時運不是永遠助人的，噩運急速來到。我又犯了那個語言錯誤，舍夫博士在後面舉起臂膀，拿拳頭向我發恨。但是，不幸的事已經發生，我相信，人們多半沒有覺察到。此外，慶祝會進行得非常如意，我毫不介意，心滿意足地回家去。

三月里有聖約瑟紀念日，這在奧地利是個大節日。聖約瑟，如前所述，是天主教幫工協會的監護神。在節日的前幾天，舍夫對協會的天主教會員作了一次懇切的講話，號召在那一天要全體前往教堂。他說，他深知有些年輕人喜歡逃避，但這次是不行的，不要讓我丟臉，因為皇后（斐迪南皇帝的寡妻，現在住在薩爾斯堡）對協會會多方幫助，對這一定會知道的。他接着微笑地說道，下午我們到馬利亞平原朝拜去；原來這個朝拜的地方離薩爾斯堡足有一小時路程，教堂就在平原中間的小崗上，那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在那里由協會公賬負擔一桶啤酒，第二桶由他個人開支，他斷定，這就無人缺席了。全場發笑。我相信，他是對的。於是舉行朝拜。我們非天主教徒全體歡天喜地地跟在工長舉着的隊旗後面前

进，旗上繪着圣約瑟怀中抱着嬰兒基督的像。到馬利亞平原后，我們瞻仰了那裝飾非常华丽的教堂。而后开始喝酒。几桶酒很快就空了，很多人蹣跚地走回薩尔斯堡。队伍解散了。那面带着圣約瑟像的旗如何回到薩尔斯堡，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

舍夫博士、我和一个汉諾威人一同走回来。到城中后，舍夫把我們領到一个咖啡館，在那里打了一盘台球。这在我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然是我們二人輸了，但仍是舍夫博士付賬。

一八六〇年二月底，我返回故乡。三十余年后，我接到一个普菲斯特的騎士由林嗣寄到柏林的信，信上說，他原拟前往柏林并借此把薩尔斯堡的大教堂住持舍夫博士对我的問候帶給我，但因病不能成行，所以用信把它寄来。何以舍夫博士会記得我，到现在还是个謎。他决不可能料到那个十九、二十岁的年輕施工——假如他还記得他——后来会作社会民主党的国會議員。我决不会給他这么深刻的印象。我猜想，大概是我曾將我在薩尔斯堡的經歷順便对中央党的国会同事們述說过，他們把这事轉告給大教堂住持了。当我在本世紀初重往久別了的薩尔斯堡的时候，舍夫博士已在數年前逝世了。他会終生保持他那快活、爽朗的性情和充沛的生活樂趣的。

我在結束我的侨居薩尔斯堡时期的叙述以前，还要提一下当时我們年輕人所說說笑笑的一件事。在那时，大家知道由于罗拉—蒙提茨事件<sup>①</sup>而退位的那位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維希一世，夏季在薩尔斯堡附近的列奥波尔茨克伦宮內居住。这位国王身材瘦长，穿一身灰色夏服，戴一頂稍有損伤的大草帽，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常由我們的作坊旁边經過，喜欢独自在薩尔斯堡四郊散

<sup>①</sup> 罗拉—蒙提茨是一个舞女，得到路德維希一世的寵愛。他們这种关系在一八四八年初引起慕尼黑騷动，也是路德維希在三月革命开始时退位的原因。——譯者

步。有一天，他又在这样散步，看见一个男孩为取不下树上的苹果而苦恼。国王走到男孩跟前说：“瞧，你要这样办！”他把手杖扔到树枝中间，效果极好。这却被附近房屋里的农妇看见了，她那时愤怒得满面通红，走到门口，向她所不认得的国王叫道：“你这老野人，不害羞，竟帮着孩子偷苹果！”国王拾起手杖就走开了。第二天早晨，一个仆人前来送给农妇一古尔盾，说明是赔偿昨天那位先生从树上打落的苹果的。当她问那位先生是谁时，使她惊讶万分的回答是：“国王路德维希。”

我在这里指责一位逝世的巴伐利亚国王的盗水果罪时，我要真实地附加一句，我在这方面也不无罪过。偷水果，随时都是我的弱点；这大概是由遗传得来的天性，我成了这一天性的牺牲。现在在萨尔斯堡又是这样。引诱我的是侯爵主教郁李园中的鲜美桃子。我在园中散步多次，每每不能自制而摘取几个果子。我以为我的盗水果罪对侯爵主教不会有所损害，而果实对我却大有好处。当我读了第四世纪末期米兰主教圣安布罗兹的话后，我的良心谴责也就烟消云散了，他说：

“自然界将一切财富一起给与一切人们；因为上帝创造万物，为的是使大家共同享用。这样，自然创造了公有的权利，而创造私有权的是不公平的霸占。”

对我的行为还能够有比这说法更辉煌的辩护，甚至言之有理的吗？

## 回到维茨拉及以后

我于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启程还乡。那时巴伐利亚东南部还没有铁路，再说当时一个手工艺徒最省钱的旅行还是步行，同

时还乞討点东西。天气又是十分恶劣。有一天，狂风大雪吹打在我的脸上，我把双手插在裤袋里，把棍子挟在臂下，把帽沿低低拉到脸上，在弗兰哥尼亚的山脊大道上大踏步前进。这时忽然什么东西抓住我的臂膀，把我擲到道旁漆沟里。我大吃一惊，看时，原来是迎面来了一匹马，拉着车，巧妙地咬在我的臂上，并把我擲向旁边。在风雪中，我既沒有看見，也沒有听见这辆前来的车子。

我漫游经过慕尼黑现在是第三次了，从这里往股果尔斯塔特、艾希斯台特、紐伦堡、佛尔特、沃茨堡、阿沙芬堡和法兰克福。在沃茨堡和阿沙芬堡之間，我用了四个钟头穿过斯塔薩山的一座雄伟的櫟树林，在树林里我沒有看見一个人影。我的脚步声是我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林中道旁的森林管理处的房舍也好像是无人居住。当我走出这个好像无边无际的森林时，我深深出了一口气。几十年后，我看見鮑克林<sup>①</sup>的画“林中靜寂”，我才第一次又感到当年穿过阴森寂靜的櫟树林时独步前进的心情。当我终于走近維茨拉的时候，心里有点特殊感觉。我跑到面前的一个小丘上面，从这里先看到教堂的楼頂，然后看見整个小城市就在眼前。那时是三月中旬，我重新見到这离别二年多的第二故乡。我暫住在那位当磨坊女主人的姨母家里。

我因全身衰弱，兵役入伍期延迟一年。嗣后几年在薩勒河畔的哈雷——我曾由萊比錫去过那里两次——应召入伍也同样延期，末后被认为不能当兵而被免除。因为在維茨拉找不到工作位置，我往离維茨拉二哩的布茨巴赫，在一个犹太人旋工师傅那里工作。季节越来越美好，有一天，三个学友背着“柏林包”到作坊来告訴我，他們将往萊比錫漫游，于是我就像艺徒歌里說的“它强有力

① 瑞士國家。——譯者

地把我拖出去”，跟着他們走。我向我的朋友約定三天內追他們，並且希望趕上他們，只要他們不是過於加快前進。我所以敢於提出這個約會，是因為在那時走起路來，沒有超過我的人。

我一向極不想望游歷萊比錫和薩克森，如果由我自己來決定，我當時不會看到那兩個地方。可是，這次旅行却在好幾方面決定了我整個的將來。偶然的機會常常會決定人的命運的。

54 這裡我想插入一段話。我對於“人鑄造自己的命運”這句格言極不贊同。人始終只是依從他所處的和迫使他行動的環境和情況。因此，他的所謂行動自由也是極為空洞的。在大多數場合，人並不能預見到他一時行動的後果；事後他才明了這個行動把他引到哪裡。不向左一步而向右一步，或者反過來，就會把他帶到完全不同的情況中，這些情況比原來走的路上所遇到的可能更好一些，或者更壞一些。聰明的或是錯誤的步驟，照例是只有在看到結果後才能明白。但是，他的行動的性質究竟是正確的或者錯誤的，也常因為他不能比較而始終不了解。自力成功的人只存在於極受條件限制的程度之內。其餘上百的人，雖然較爬上高位的那個人有遠為優秀的品質，但因不利的境遇阻礙了他們的發達，就是說阻礙了他們正確地使用和利用他們個人的特性，他們就埋沒一生，沒齒無聞。“幸運的境遇”才給與個別人以生活中的優越地位。至於無量數得不到這種地位的人，生活沒有給他們預備筵席。但如果境遇順利，就必須具有必要的利用境遇的適應能力。這可以看作是個人的個人功績。

在三個友人到達屠林根以前，我追上了他們。我到得恰好，其中一人走傷了腳，我正好扶着他走，這樣，在漫遊經過的各地，常引起居民的歡笑。我們經過盧拉、愛森納赫、哥達，來到愛爾福特。在這裡，我們第一次住在一個基督教青年協會的宿舍里。但只此一次，不再住了。宿舍的主持人那種偽善的鬼鬼祟祟的態度，使我作



嘔。晚上，我們必須遵照命令一同就寢。我們上了二樓，一道通往小會堂的門開了，贊美詩的曲調迎面飄來，有一個淡黃頭髮梳得光亮的青年在彈風琴。我們驚异地走進門，好奇地看看那里要發生什麼事。宿舍主持人隨即走上講壇，把一本詩歌中的一段向我們一行一行地朗誦起來。我們在風琴伴奏中跟着唱所念的詩句。在一個天主教幫工協會中向來沒有這類現象。例如在慕尼黑在二人居住的小房間的牆上，貼着印就的新禱辭，是請求就寢前作祈禱之用的。絲毫沒有精神上的強迫。不過我要重復一句，天主教幫工協會後來變成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

在愛爾福特發生的上述情況，開始使我們感到好玩。我們獅子似地照所彈奏的調子吼出所念的詩句，然後上樓到寢室去。根據規定，我們這些外鄉來客的衬衣領子經過檢查後，上床睡覺。於是宿舍主持人攜去了燈，室內漆黑。現在這裡的幾十個年輕人，幾乎代表着德意志全國各地的鄉誼，爆發出我從未聽到過的嘲笑戲謔。當室內最遠一角一個從符騰堡來的睡伴用地道的斯瓦比亞語發出幽默的話語時，歡笑達到了頂點。到很晚的時候喧嘩方才停止。55  
次日我們向魏瑪前進。到魏瑪後，三個同伴都因腳跑傷了，不能繼續步行；他們要乘火車往萊比錫。我獨持異議，因為我的錢很不寬裕，如果到萊比錫找不到工作，怎麼辦？但我的抗議無效，我若不願獨行，就須一同搭車。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晚十一時，我們到達萊比錫，我們打聽着來到了大弗萊舍巷的旅館。當第二天我們趁着絕好的五月天氣，遊覽了城市和那春光明媚的散步場以後，我就非常喜愛萊比錫了。我也走運，在一個作坊找到了工作，我學會了製造一種後來賴以獨立營業的商品。假使我晚到萊比錫一天，這個位置就會被別人占去。所以，這裡又是“幸運的一瞬間”決定了我的將來。我第二次又在一個較大的作坊工作。五個同事和一個學徒同我一起干活。師傅和同事都合我的意，工作也合意，由

此还能学点东西。不合我意的，是早晨所得到的劣质咖啡和质量与数量都特别差的午餐。早餐、午后点心和晚饭我們都必须自理。住宿在师傅处；我們七个人睡在一間宽敞的閣樓里。我很快就起而反抗这样的伙食。几个星期內，我取得了同事的支持，我們共同向师傅提出意見，我們声明，若是我們的申訴无效，就要一致停工。我們这就是用罢工来威胁，不过我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詞。抵抗的形式正是来自事情本身。师傅异常惊惶，他說，他不了解这个訴状，他觉得伙食很好。这是当然的。他同他的家人比我們开飯晚些，吃的是另外的飯食。他不知道这种情形。經過多次談判，結果是我們从他那方面得到相当的津貼，由我們自办伙食，而他认为这在經濟上他还占得便宜。原来他为我們的伙食付給他妻子的錢，比我們所要求的还多些。后来我們以堅臥不起的方法，达到了早晨开工時間由五点延至六点的目的。再后来我們还贯彻了計件工資的办法，但师傅起初不同意，他生怕我們工作馬虎，后来他却承认是他弄錯了。最后我們也办到了在作坊外面住宿。

## 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兄弟——威廉亲王在普魯士的摄政，加以意大利战争，强有力地喚醒了人民。从一八四九年以来的反动时期所加于人民的压迫和緩了。特别是自由资产階級，它在反动时期曾尽力促进經濟的发展并大发其财，现在开始在政治上活动起来。不过它那时的发展，仍不能与它的經濟制度在一八七一年以后，特别是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所获得的发展相比拟。

资产階級現在要求参与国事；它不仅想用国会来統治普魯士，而且其中大多数还争取以普魯士为首的德意志的統一，以便使整

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一个受统一原则指导的国家机构，这个统一的国家机构是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和当时德意志国会所尝试而没有成功的。这种企图的表现就是一八五九年以鲁道夫·冯·本尼格森为主席的德意志民族联盟的成立。摄政亲王任命旧自由主义者奥尔斯瓦尔特-塞维林为首相，这就增长了自由主义的希望。摄政亲王所公布的政纲固然不足以唤起大希望，而且他的过去，尤其是他在革命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也使人不能对他怀这种希望。但是自由资产阶级却看到一个新纪元开始。

自由主义，尽管它数十年来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可是只要自由主义政权的一种假像向它一摆手，它总是满怀希望。因为自由主义缺乏勇气和毅力来做强硬的行动，而在每次真正的人民运动面前怀着恐惧，所以它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或假或真地对它有所让步的执政者身上。它把热情和盲目信赖奉献给这些人物，就希望他们因此而为它的利益服务。在上述具体情况下，它的希望之花立刻雕谢。摄政亲王彻头彻尾地是个军人，他首先感到有必要牺牲以往实行的后备军制度，来实现彻底的军事改革。在他看来，普鲁士实行的陆军编制在革命期间及其后以及在一八五九年动员的时候，都显见其无用。他的计划的实现不仅要用很多钱，而且也违反了一八一三年以来在民间形成的认为后备军有用的传统；此外，新编制把服役年限由二年延长为三年，预备役由二年延长为四年。

后备军在革命时期确是时常失效，它的感情同人民过于一致，不能随便拿它去进行反动的袭击；用以进行不得人心的战争，也同样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摄政亲王才尽可能在新编制中把它挤到后面去。但是当这种改组未经议会明白表示同意（议会很缺乏远见，首先临时赞同改组的经费）就正式筹备的时候，在下院占多数的自由派就开始表示反对。但是摄政亲王不为所动，继续进行改

編。这就引起了冲突。一八六一年十二月的选举加强了反对派。虽然政府企图以对自由派让步（部长責任法和一种新的行政区的地方条例）来争取議會，議會现在却把提出的陆军編制經費予以否决。于是在一八六二年三月解散議會，但结果是，在五月重新选举时議会的組成更加激进。保守派却减少到十一席了。

冲突越来越尖锐，国王束手无策，于是起用俾斯麦，这个人是以刚强和不顾一切著称的。他于一八四七年在各邦联合會議，一八四九年在普魯士下院和一八五〇年在爱尔福特議會中的表现证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这些會議上的态度，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得知他是一个滿身血腥的反动分子。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九年，俾斯麦充当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同盟議会的普魯士代表，他在那里认清了德意志政治情况不能持久。他在一八五九年往彼得堡任公使，一八六二年春季往巴黎任公使，当年九月即由巴黎調回，被任为現由保守派組成的內閣的首相。因此，政府与議院之間的冲突达到极点。

在德意志問題上，运动在这期間在全德意志範圍內同样越来越活跃，而且掀起了巨浪。民族联盟要求根据宪法和一八四九年选举法召集德意志国会。同时普魯士的竞争者——奥地利，因为它的非德意志居民占有很大部分，就应被摺弃于新国家之外。民族联盟的多数主张成立小德意志，而与之对立的是不願把德意志—奥地利分开因而自命为大德意志派的人們。这种对立支配着六十年代前半期解决德意志問題的斗争。同时又发生所謂三位一体思想，即在奥地利和普魯士之外，中、小諸邦也要有代表参与未来国家的领导，組成一个三头执政政府。

由于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和它还能取得的巨大意义，眼光较为远大的自由派及时地注意到工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来争取他們。最近十五年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发展、六月

战斗、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他煽惑性地利用工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使自由派认为应当尽可能预防类似事件在德意志发生。于是他们利用从一八六〇年起工人建立工人协会的热忱，鼓励这些协会，企图把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放在各协会的领袖地位上。

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固然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过德意志总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职业工人有四分之三以上属于手工业。除原系重工业的采矿业、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之外，工厂劳动是手工业帮工所轻视的。工厂产品固然被认为价格便宜，但也公认为质量很差，在十六年后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德意志代表樞密顾问雷勒还把这个烙印加在德意志的工厂出品上。在手工帮工看来，工厂工人是下贱的，很多人如果不被称为伙计或帮工，而被称为工人，就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加以大多数伙计和帮工还抱着有一天自己作师傅的信念，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萨克森和其他诸邦也实行营业自由的时候。这些工人的政治修养是很差的。他们是在五十年代长大起来的，那时是最黑暗的反动年代，所有的政治生活都被扼杀，他们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工人协会或通常所谓手工业协会，只是例外地存在着，只能做其他活动，就是不能做政治启蒙的活动。政治性的工人协会在德意志大多数邦中绝不容许，甚至根据一八五六年同盟议会的决议遭到禁止，因为据法兰克福同盟议会看来，工人协会是与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同样意义的。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对我们青年是完全陌生的概念，不可理解的事物。固然有时候，例如在莱比锡，也有个别属于魏特林的共产主义的人，如弗里茨舍、瓦尔特希、施奈德、谢林，读过魏特林的著作，但这究竟是例外。工人中也有人例如知道《共产党宣言》，晓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当革命年代在莱茵区的活动，可是这些事情我那时在莱比锡却一无所知。

上述一切的結果是，工人們从当时所站的立場出发，既不关心階級利益，也不知道还有像社会問題这类东西。所以工人們成群結队地涌向自由派代言人所协助創立的协会，自由派的代言人，在工人看来，好像是人民之友的模式。

六十年代初期，这种工人协会发展迅速，有如雨后春笋。在薩克森尤其是这样，但在德意志其他各地也是这样。有些地方成立了协会，以后在那里存在了多年，直到社会主义运动在那里取得一致的基础之时为止，虽然同时，原先的工人协会却关門了。

当时在萊比錫，政治生活是十分活跃的。萊比錫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重鎮之一。我当时訂閱一份民主派的《中德意志人民报》，它是已故著名女权运动先鋒路易斯·奥托—彼得士的丈夫，即一八四八年的战士彼得士博士編輯的，有一天我在这报上看到为創立一个教育协会而召集民众大会的消息。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这个大会在罗森塔尔附近一个花园里的維也納大厅內举行。当我进去的时候，会场已滿。我費了些力量才在走廊上找到个位置。这是我所参加的第一次公开集会。工艺学会主席希尔采尔教授在作报告，他說，因为根据一八五六年同盟議会的決議在薩克森不容有工人协会，所以要把职工教育协会創建为工艺学会的第二部分。这引起了反对。除罗斯梅斯勒教授（曾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議會議員并在塔兰特森林学院被馮·博伊斯特先生免去其教授职位）之外，还有瓦尔特希、弗里茨舍及其他演說人发了言，他們要求协会完全独立，而且协会必須是政治性的組織。至于追求教育的目的，那是学校的事情，不是一个成年人协会的事情。我虽然对这些发言人不同意，但对于工人們竟这样强烈地攻击学问淵博的先生，却感到佩服，暗地里盼望也能够这样发言。

协会成立了，反对派虽未达到目的，但也参加了协会。我也在那个夜晚成了会员。协会是一种模范学府。科学讲演相当多。除

了罗斯梅斯勒教授外，还有鲍克教授（《凉亭》杂志的鲍克，就是《健康和病人》一书的作者），还有烏特克、文克、馬尔巴赫諸教授，林德納博士、萊赫爾博士、布尔克哈特博士等等。以后继之而来的有比得曼教授、汉斯·布鲁姆博士（传说他在学生时代在名片上印着人权学生字样）、艾拉斯博士、一八六五年夏季到莱比錫来的李卜克内西以及罗伯特·施維舍尔。第一年讲演最多者之一是达麦尔博士，他后来第一个受拉薩尔委任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副主席。課程分为英文、法文、速記法、工商簿記、德語和算术。还設有体育和歌咏部門。瓦尔特希参加了体育部，他是并且始終是一个比教师还高明的大体育家，参加歌咏方面的有弗里茨舍和我。弗里茨舍的第二低音唱得极美，我是第一低音，不消說，这是沒有好歌喉也能唱的。

协会的領導是二十四人組成的委员会，为了主席位置爆发了竞争。罗斯梅斯勒被建筑师毛特斯打败，但反对派繼續着有計劃的活动。在一八六二年二月一周年紀念会上，瓦尔特希致祝詞，显然是政治性的。他要求普选权。在重新选举委员会委員的时候，我也当选了。我所渴望的公开发言，因协会中常有討論，就很快地如願以償了。后来一个朋友告訴我，当我为說明一个建議的理由第一次讲几分钟話的时候，他桌子上的人面面相覷地問：“这个人是谁，这样登台讲话？”在委员会中按不同管理单位分为不同部門，我被选入图书部和娱乐部。我是两个部門的領導。协会的主席仍由委员会选举，这次又引起了激烈斗争。經過四次选举，总沒有哪个候选人能够得到多数票。始終是票数相同。最后又是罗斯梅斯勒对建筑师毛特斯以一票之差而失败，因为后者自己选了自己一票。現在反对派把斗争轉到一八六二年耶穌受难节那天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协会当时的會員在五百人以上。反对派又提出他們以前的要求，要把协会弄成純粹政治性的团体，并把授課置于协会之

外。經過一番我也參加的數小時的激烈舌戰，反對派又被四分之三的多數票打敗了。反對派當時的作法如果巧妙一些，只要求偶爾對於時事作些政治報告，並舉行討論，他們就會獲得輝煌的勝利。至於想把教學擯於協會之外，由於大多數青年會員對課程深感興趣，那就只能引起反抗。我自己是參加簿記和速記的。在那個決定性的大會前幾天，弗里茨舍和瓦爾特希曾千方百計地想把我拉過去，但我不能下決心跟隨他們走。

反對派現在退出，另成立了前進社，在薩克塞飯店設立總部。這個飯店的主人是在反動時期受過處分的前牧師維克爾特。這個人有自己的方式去傳播啟蒙思想，連帶着做他的生意。他每星期舉行講演，自己主讲，講到各種各樣的主題，如名人的生日和忌辰，政治時事等等。在這樣的晚上，他的大廳里擁擠不堪。維克爾特適才還在賓客中活動，把一杯啤酒遞給這個和那個，忽然站在從飯店上面通到下面的可以看到一切的樓梯上，發表他的演講，這就給人別致的印象。另一個當時新建在低濕地上的大地下室美泉酒館，不與薩克塞飯店的集會相對立而可以相輔助，它的主人是一八四八年的戰士格倫。在這個酒館的一個角落放着一張大圓桌，名叫罪犯桌。這表示只有曾被判處過苦役或監禁，或是受過其他處分的光榮的民主領袖才准許在這裡坐。往往是兩種資格兼而有之的。這裡坐着羅斯梅斯勒和道爾格；道爾格因參加五月起義被判死刑，後遇赦改為終身苦役，隨後在瓦爾特亥姆關了八年。“罪犯”中還有擔任我們協會中速記課程的阿爾布萊希特博士、布爾克哈特博士、彼得博士、弗里德里希·歐爾克斯、弗里茨·霍夫曼博士（又叫做《涼亭》雜誌—霍夫曼），等等。我們青年認為能在這個桌上同老前輩對飲一杯啤酒，乃是非常的光榮。

前進社的領導人並不滿足於本社的集會，還在工人集會和民眾集會上進行鼓動，他們時時召集這樣的集會，講說工人問題和時



事問題。不过这种讲說还很不清楚。人們討論工人殘廢保險問題，討論在德意志举行世界博覽會問題，討論參加民族聯盟問題，不过为了便于工人參加，要求把必須交納的年費三馬克，分月征收。人們还要求邦議會选举的普选权和接受工人問題的德意志国会。此外，还討論召集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应在这个大会上討論所提出的各項要求。关于召集工人代表大会的問題，差不多同时也在柏林和紐伦堡的工人界中提了出来。

为了进行准备工作和召集以后的必要的工人集会起見，設立一个委员会，当选这个委员会的有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和其他不甚知名的工人，还有我。除由我們这方面召集的工人大会外，德意志民族聯盟的地方领导机关也常召集民众大会，并常約請外地演讲人，如舒尔采—德里奇、麦茨(达姆斯塔德)等，会中討論德意志問題、建立德意志舰队、这期间变得十分尖銳的普魯士宪法爭执、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等等。由上列这些問題可見，当时在萊比錫的政治生活异常活跃，使我們沒有喘息的机会。在自由派所召集的民众集会上有一个很受談的题目，就是討論各邦的，特别是薩克森、黑森—卡塞尔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宪法情况，其次是梅克林堡和巴伐利亚。馮·博伊斯特(薩克森)和达尔維克(黑森—达姆斯塔德)两位先生特别是猛烈攻击的对象。馮·俾斯麦先生在一八六二年九月担任普魯士政府的领导后，也成了对象之一。

不錯，在上述各中、小邦中，在革命被鎮压后，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破坏宪法和强制行为，但普魯士也不亚于它們。再說，中、小諸邦的罪惡行为也只有有在普魯士和奥地利(在这点上它們是同心同德的)庇护下才做得出来。各式各样的自由派在他們公开攻击中、小諸邦的时候，却比攻击，譬如說，普魯士厉害得多。但把革命鎮压下去的，在本国内除强制行为外还不乏对革命者的暴行的，正是普魯士。我只消提一提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被判終身徒刑，阿

道夫·馮·特律赤勒在曼海姆和麦克斯·多尔突在夫賴堡的被枪杀，拉斯塔特的暗堡里的枪杀案，普魯士军队镇压了德累斯頓五月起义后对被俘的革命者的可怕暴行。五十年代在曼托伊斐尔制度統治之下的普魯士的状况，也不能不激起每个稍具自由思想的人的憤怒，使普魯士在德意志和在国外声名狼藉。又如那时发生的宪法糾紛，在德意志也是唯一无二的。当时我还算是一个在政治上沒有經驗的青年人，对于这个用两种标准来衡量的作法，很快就  
65 感到詫异。而这种作法正是薩克森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干出来的。当然，像馮·博伊斯特先生在薩克森国王約翰同意之下所实行的那一套制度，由于各色各样的敵視人民的措施和压迫，尤其是对瓦尔特亥姆監獄內政治犯的虐待，是理所当然地特別令人憎恨的。关在瓦尔特亥姆監獄里的五月事件被捕者不下二百八十六人，其中一百四十八名是工人，到一八五四年已有三十四人即百分之十二死亡。有四十二人被判死刑，后来蒙“恩赦”减为終身徒刑。在茲維考監獄里拘押政治犯二百八十六人，其中有工人二百三十九人；在胡伯图斯堡国家監獄里关着政治犯七十人。

在瓦尔特亥姆監獄里，还关着德累斯頓的乐队指揮奥古斯特·勒克尔，他是理查·瓦格納和著名建筑师塞姆波尔的朋友，这两个人幸而逃脫了。勒克尔由于参加五月起义，被判終身徒刑。他坐了十一年半監牢而于一八六二年初被赦免以后（他和普劳恩的律師奇尔巴赫因拒絕填写赦免申請书，是最后才被赦免的），在一八六五年发表了关于瓦尔特亥姆監獄事件的一本书，名为《薩克森起义和瓦尔特亥姆監獄》。本书內容在薩克森和德意志引起了一阵惊惶的叫喊。我是这部书最热心的推銷員之一，推銷了三百多部，不消說沒有任何个人利益，但我仍不免在科堡的《工人总汇报》上被誣为博伊斯特的党羽。

在瓦尔特亥姆受虐待的，还有奇尔巴赫，二十年后我在薩克森

邦議會和他同事，因而相識，他的遭遇大概是最殘酷的。他在監獄中，不是在苦難面前卑躬屈節的人；監獄長克利斯特給他在兩腳之間帶上一根名叫跳棍的東西。這是一根長約一尺釘著腳鐐的铁棍，緊扣在兩腳踝骨之間。他要是想走動，就必須跳躍，所以名叫跳棍。這個辦法使踝骨上的皮肉磨得稀爛；奇爾巴赫不僅疼痛難忍，而且也因而病危，所以過了些時跳棍又被取下了。在他後來的政治發展上，這位先前的革命家於八十年代初加入自由黨，他長期任本選區該黨的理事。他在薩克森邦議會資產階級的議員中，是唯一贊成我們提出的實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選舉權的議案的。所以他同他的其他許多老同志一樣，並不否認是老民主主義者。

奇爾巴赫的獄友奧古斯特·勒克爾，取得完全不同的政治發展。當一八六六年在德意志發生了政治危機時，勒克爾卻倒向他原先的敵人馮·博伊斯特那方面，並且當博伊斯特任奧地利首相的時候，他隨往維也納，為他辦理新聞事務。他死在那裡，還是個窮人。

但是，不管普魯士處於什麼情勢下，自由派總認為只有這個國家能夠實現他們所想像的德意志的統一，能夠防止群眾取得政權。所以他們的策略是盡量貶低中、小諸邦，以便把負德意志使命的國家，即他們心目中的普魯士，顯得更加輝煌。俾斯麥時代固然是這種神話的障礙，可是他們說這是暫時現象，隨後普魯士才更要大放自由的光芒。但是馮·俾斯麥先生是頭等的現實政治家，並且他也認識自由派，關於他們，他說：“他們怕革命比恨我還厲害”，這話倒是完全正確的。這時，激昂的情緒愈來愈趨於熾熱。誰在大會上對俾斯麥攻擊得最凶猛和發出最嚴重的威脅，誰就會得到最熱烈的掌聲。甚至有些自由主義者舊有的革命熱情也復活了。約翰奈斯·米凱爾就是這樣。他在十年前同卡爾·馬克思曾有聯合，

到六十年代同他的关系还未完全断絕；他那时自命为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論者，并且表示願意协助組織农民起义。現在他却拿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来警告普魯士国王，他說霍亨索伦家族如果不顧听从理性，人們就会喚起工人反对他們。这是正当德意志民族联盟在萊比錫开代表大会时，他在私人圈子中发表的意見。将近三十年后，約翰奈斯·米凱尔一变而为霍亨索伦家族的財政大臣米凱尔先生，作为民族自由党的創始人之一的他，却认为这期间业已变得十分馴順的民族自由党太自由了。

这种威胁那时也可能传到俾斯麦耳朵里（用流血手段为恫吓的匿名信，大概在有社会民主党的領袖以前业已流行，社会民主党領袖有时成打地接到这种恫吓信），因为他后来曾公开承认，他不是不可能步斯特拉福特的后尘，大家都曉得这位英王查理一世的大臣是被处决的。因此，他作为谨慎的一家之主，就把家事安排妥貼，以应付任何情况。

但也发生了关于国王的謠言，說他因为这种接连不断的激动而精神失常，深恐遭遇到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那些謠言后来由已故的普魯士邦議會議員馮·艾乃尔发表的俾斯麦本人对他的通知证实了。据說，俾斯麦曾对他說，当一八六二年他被任命为大臣的时候，他往俞特伯格迎接国王，适遇国王陷于极端的沮丧中。国王是从巴登貴族那里回来的，原来他們认为他們同議会的冲突无法解决，才請国王亲調解。国王对俾斯麦說：“您做大臣了，但这只为的是要上断头台，这个台将为您設置在大剧院廣場上；在您之后，就輪到我本人了。”“国王无疑是希望我为他排除这种想法”，俾斯麦繼續說：“但我做得正相反，因为我認識我的高尚的、不怕任何危险的伙伴。我告訴他，我认为这两种情况目前大約都不是不可能的一一但是即使要发生，又有什么要紧，我們大家总要有死，稍微早一点或迟一点，不足介意。那末，臣死，正如臣的本分，为王、

为主尽忠而死；王死是为着保卫他的神圣权利，也是对于他自己和对于人民的义务。不要就想到路易十六，他死得不得其所，但是查理一世则死得极其适当，这样一死与死在战场上同样光荣。”

俾斯麦接着说，“当我这样把国王当作带刀的军人的时候，国王就更加严肃，随后他就镇定下来，于是我就陪着一位兴高采烈、斗志昂扬的武士驰回柏林。”

这件事情说明，假使自由派善于利用环境，就可能得到什么结果。但是他们早已害怕站在他们后面的工人。俾斯麦扬言，如果逼他过甚，他会把阿赫隆<sup>①</sup>发动起来，这就把他们吓坏了。

事实上，俾斯麦也用尽各种方法来控制局势；不管哪里有工具，他都拿来使用。只要对他有好处，他可以同妖魔鬼怪联合起来。他拉拢当时大德意志派的《北德意志总汇报》主笔奥古斯特·布拉斯为他服务，虽然此人从前曾经是红色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曾写过美好的诗句：

我们染得红，我们染得好，  
我们用暴君之血作染料！

布拉斯从伦敦请来李卜克内西，从洛桑请来罗伯特·施维舍尔做《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他也毫不反对。俾斯麦除布拉斯外，于一八六四年又收拢了抗拒捐税的老民主主义者洛塔尔·布赫尔，使他那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巧妙文笔供自己驱使。布赫尔还曾受俾斯麦的委托，于一八六五年设法罗致卡尔·马克思来共同编辑普鲁士官报，允许他完全随意写作，甚至宣传共产主义。

俾斯麦现在所试用的统治手段，是从路易·拿破仑学来的，这是个善于利用现存阶级矛盾来巩固他的制度的能手，即令在普选权控制之下也是如此。不久就看出来，俾斯麦也为着自己的利益，

<sup>①</sup> 在希腊传说中，阿赫隆系冥府的河名，人死后，他的灵魂为了到达冥府，必须渡过这条河。显然，这里是指工人阶级。——译者

設法利用工人运动去反对自由资产階級。他在这种勾当中的助手是高級樞密參議海爾曼·瓦蓋納，这个人对社会問題的知識和狡猾性格使他成为适当人选。

一八六二年八月底，柏林的工人大会也決議召开一个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地点定在柏林。这使得莱比錫委员会与柏林运动的領導人物进行联系，以便就代表大会的召开达成協議。他們希望把地理位置較好的莱比錫作为大会地点。十月初，柏林代表彩画匠艾希勒来到莱比錫洽商，我也以委员会委員資格参与其事。

这次会談在海茵街的“走向約阿希姆塔爾”<sup>①</sup>飯店举行。艾希勒立即談到整个情况。他說明工人們对于进步党和民族联盟不能有所期待。委员会的多数委員，基于本身的經驗，同意这种見解。艾希勒接着說，他确信（我們认为这样就暴露了他是俾斯麥的代理人的面目），俾斯麥是可以爭取来实施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的，并且他也願付出創立机器制造工人生产合作社所必需的資金（六万到八万塔勒）。

那时的机器制造工人是柏林工人的中堅分子，是进步党实际的近卫軍。艾希勒的讲话引起了数小时之久的辯論，最后結果，委员会中除弗里茨舍外，都对艾希勒表示反对。令人詫异的是，艾希勒所宣传的正是六个月后拉薩尔在他致莱比錫委员会的复信中所闡明的思想，只是拉薩尔要求由一个民主国家来创办受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

在那些日子里，我們不知道拉薩尔这个名字，虽然他在那年四月已經公开作过《論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級思想的特殊联系》的演讲，这个演讲到后来，而且一直到今天，仍以《工人綱領》这个题目出現。他在同年还作了些有关宪法本质的演讲。我們所以不曉

① 約阿希姆塔爾，系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名。——譯者

得这些情形，大概是因为我們沒有人閱讀柏林報紙的緣故。我們只从萊比錫的报刊，主要是从民主党的《中德意志人民报》，得些時事知識，凡是这家報紙沒有登載的，對我們都是陌生的。那還正是落后的時代。

艾希勒說，俾斯麥是可以爭取來實施普遍、平等和直接選舉制的，他只是把當時已由高級樞密參議海爾曼·瓦蓋納所公開宣傳的一種思想加以表明罷了。並且，人們也把它認為是一種強制行為，其出發點是：既然能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強制施行三級選舉制，當然也可以用國王的命令又把那個選舉制取消，然後強制施行一種新的選舉制。自由派的絕大多數不熱中於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的選舉制，他們非常討厭這種前景，他們的主要領袖之一馮·翁魯先生也曾公開表示他們的憂慮。自由派用一種聲明遮蓋他們對於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選舉制的厭惡心情，他們聲明說，這個要求在進行憲法鬥爭的時候是不適時的，先要把同俾斯麥內閣的鬥爭進行到底，才能考慮選舉制的改革。至於保守派的鼓動家們所以那時竭力贊成實施最民主的選舉制，而現今反倒成為這種選舉制最堅決的敵人，那是有其充分理由的。拿破侖第三就出色地運用過這個手法。六月起義失敗以後，光榮的共和國以惡劣的選舉制代替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的選舉制，而拿破侖第三在政變後却在法國恢復了原來的選舉制<sup>①</sup>。自然是通過國家權力對選民施行強制作用的結果。六百個代表中最初只有反對派七人，其餘都是皇帝的奴才。直到一八六三年反對派才增加到三十八人，一八六九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人。

① 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勝利後，建立共和國，公布新憲法，規定每三年舉行普選一次。但至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為了壓制革命，又取消普選權，而代之以新選舉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侖第三政變後，又恢復了前一年廢除的普選權，企圖以此掩飾他政變的反革命性質。——譯者

反过来，普魯士三級選舉制之設立，原想造成一個百依百順的  
71 議院，現在倒弄成一個激烈的反對派議院；因此，人們就想依照拿破  
破倫的先例行事。

另一個問題是：由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怎麼會跑到保守派人士中間？好像在一八六二年，拉薩爾的頭腦里已經醞釀着這種思想，他把這個思想告訴了他的親信女友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拉薩爾還沒有公開宣布，她就將這種思想傳達到保守派人士中間。後來瓦爾特希擔任拉薩爾的秘書的時候，他發現拉薩爾周圍是些態度多么曖昧的分子。李卜克內西也覺察到這種情形，他勸拉薩爾對於他的周圍的人，特別是對於俾斯麥要加小心。拉薩爾回答說：“呸，我與馮·俾斯麥先生同吃櫻桃，但是他得到的是櫻桃核。”十分可能，樞密參議瓦蓋納還在俾斯麥親自考慮生產合作社計劃以前，就向艾希勒暗示這個計劃是俾斯麥的計劃<sup>①</sup>。在一八七八年九月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討論中，當我談到那件事的時候，才弄清楚艾希勒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俾斯麥對拉薩爾的關係。我那時指責俾斯麥侯爵，說他曾一度為個人政治目的企圖利用社會民主黨，而今竟努力來消滅它。我首先提到艾希勒事件以及艾希勒用俾斯麥的名義在萊比錫委員會對我們所作的提議；我繼續指出，經由一個霍亨索倫家族的親王（大約是國王的弟弟阿爾伯萊希特親王）和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介紹，拉薩爾跟俾斯麥取得聯繫，他與拉薩爾的談話常常連續數小時之久，有一天竟因拉薩爾在座，俾斯麥拒絕接見來晤談的巴伐利亞公使。

俾斯麥侯爵接着於次日，九月十七日，在國會發言。我錯誤地

<sup>①</sup> 後來我看到高級樞密參議海爾曼·瓦蓋納的回憶錄《經歷的事情》，其中提到他同拉薩爾和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及其他社會黨的主要人物（施甫澤？）發生過關係。所以很可能他是從拉薩爾本人那裏獲悉他的竊取思想並且用到艾希勒身上。



把艾希勒和萊比錫委員會的談判說成已在九月舉行，而不是在十月才舉行。俾斯麥抓住這一點，說他是九月二十三日才入閣，來證明他不能夠作這種委託。他很記得，艾希勒後來向他提出要求，要他為艾希勒沒有替他做的工作支付報酬。他接着承認，艾希勒曾在警察局服務，並交過有一些為他所知的報告；不過這些報告與社會民主黨無關，而是與進步黨和——如果他没有搞錯——民族聯盟的內部商討有關的東西。

72

由此可以證明，我們委員會對艾希勒的懷疑是多麼有根有據。此外，俾斯麥侯爵否認他願意供給一個生產合作社六萬至八萬塔勒。他沒有秘密資金，從哪里去籌這筆款項呢？說這話的人，曾在一八六三年四月在國會里說過，政府認為必要時，不論國會許可與否，將進行戰爭，並將動用一切所能找到的款項——而且巴庫的支出好多年來是不經國會同意的。關於我指摘他的對拉薩爾的關係，他說不是他希望同拉薩爾談話，而是拉薩爾希望同他談話，他不過對於滿足這種希望不會為難罷了。他對這件事也并不後悔。他們並沒有舉行過會談，拉薩爾一個窮光蛋還能幫他什麼忙？不過拉薩爾對他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大概是與他來往的一個最有才智、最可愛的人，他也並非共和派；他所追求的理想乃是德意志帝制。這就是他們的接觸點。而且拉薩爾懷有高度的野心，德意志帝制究竟是完成於霍亨索倫皇朝或是完成於拉薩爾皇朝，大概在他還有疑問，不過他確是徹頭徹尾地擁護君主政體的。這種解釋在國會中引起了哄堂大笑。

俾斯麥給拉薩爾蓋上君主派的印記，他這種胆大妄為的作風不消駁斥，拉薩爾的著作和書信就把它駁倒了。不過拉薩爾在俾斯麥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是極其特殊的。倚仗着他的高度自信和他的獨立的社会地位，他認為在他有權力為后盾以前，他同俾斯麥就能夠像權力對權力那樣談判。至於這場戲最後怎樣結局，我們

73

不必为之大伤脑筋，因为一八六四年八月底拉薩尔之死把这个对手去掉了。

此外，俾斯麦在那次发言中，否认他和拉薩尔曾討論过强制施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选举制的思想。我不能给他提出反证，但是我不相信俾斯麦的話。这里 應該以拉薩尔的話为准绳。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二日，拉薩尔在柏林最高法院所发表的辯护詞里公开地說：“那么，在这个庄严的地方我向您們宣布，恐怕不要再过一年，馮·俾斯麦先生就要扮演罗伯特·皮尔<sup>①</sup>这个角色，并强迫施行普遍和直接选举制。”拉薩尔如果在同俾斯麦談話时沒有考虑过强制施行普遍、直接选举制，他决不能发表这个談話。如上所述，这种思想曾在保守派中間反复地、而且十分认真地討論过，并且在自由派的陣营里被人完全相信了。此外，俾斯麦反对国会的決議，违反宪法地处理政务，在一八六三年六月违反法制公布了臭名远揚的出版条例，只要他认为有利可图，他决不是那种对于强制施行一个选举制度畏縮不前的人。而且一向在政治上被剝夺了权利的普魯士群众，不会因为他这样强制施行选举制而怪罪他。

至于拉薩尔同俾斯麦的談話的性质，可于拉薩尔的两封信中看出，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公开的，但放在这里最为恰当。

拉薩尔写給俾斯麦：

“閣下！

首先我应当責备自己，昨天忘記再一次請您注意，被选举权必須絕對地分配給一切德意志人。这是一种取得莫大权力的手段！这是真正以‘道义’征服德国！关于选举技术，我昨晚把全部法国的立法史翻閱一遍，但很少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也考虑过，現在确能向閣下呈献所願望的仙方，来防范选举弃权 and 废票。对于这些

<sup>①</sup> 皮尔（一七八八——一八五〇年），历任英国內政大臣、首相等职，于一八三二年接受改革法案，施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新选举制。——譯者

方法的十分有效，是不必絲毫懷疑的！

因此我恭候由閣下指定一个夜晚。但懇請選擇一个我們不会被干擾的夜晚。我有關於選舉技術的許多話和關於其他問題的更多話向閣下陳述；鑒於形勢的迫切，一次不被擾亂的詳盡的談話，实在是十分需要的。

恭候閣下指示，謹致崇高的敬礼！

斐·拉薩爾

柏林，星期三，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波茨坦街十三號。”

另一封：

“閣下！

并非我迫不及待，而是外部事变催逼甚紧，故請原諒我的迫切。星期三致函奉陈，我已把所願望的‘仙方’——十分有效的仙方——找到了。我相信，我們下一次的談話，最后会作出决定性的結論，同时我也相信，这些决定性的結論不能再拖延下去，因此拟于明日（星期日）晚八時半趨謁面陈。这时如果閣下有所不便，敬祈另示尽可能近的时间。謹致崇高的敬礼！

斐·拉薩爾

星期六晚（一八六四年一月十六日），波茨坦街十三號。”

馮·考得尔先生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知道俾斯麦同拉薩爾的交往情形，他认为俾斯麦同拉薩爾之所以断絕交往，是因拉薩爾越逼越紧的緣故。上列第二封催逼的信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总之，拉薩爾同俾斯麦的往来，同他在一八六四年的許多其他行为一样，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敢于冒险。可惜在他生命將終之时，这番交际以及他的其他行徑，給那些与拉薩爾毫不相似的人們一个鼓励人走入歧途的榜样。这是后話。

75

意味深长的是，俾斯麦在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发言里，对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持妥协态度，这使得自由派大吃一惊。他承认常常和拉薩尔一谈就是几小时，而且每当谈话结束时，他总有点惋惜，接着他又说，他承认还同拉薩尔谈了有关许可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事，他直到今天还确信这是有益的事。这种思想，他后来加以进一步的发挥。由国王私庫撥給萊欣巴赫—紐罗德区織工代表团六千塔勒，作为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之用，这也说明了，为了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来保持自己的权力，任何离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手段在他都是正当的。

我在叙述中跑到事件过程的前头去了。

艾希勒来到莱比錫不久以后，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以代表身份到柏林去，同柏林工人领袖以及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领袖谈判上述各点。关于德意志工人代表大会延至一八六三年初在莱比錫召开，大家很快就取得了一致，大会議程也沒有爭执，不过其中“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覽会”一項取消了。一八六二年夏季，艾希勒曾和其他工人往伦敦参观世界博覽会，民族联盟和一些地方自治团体也派有工人前往。总共約五十名工人在麦克斯·維尔特率領下参观伦敦博覽会。举行柏林世界博覽会的念头就是这样产生的。

76 萊比錫代表感到同自由派領袖的談判很不滿意，這在他們回來后就坦白地在他們的報告中說了出來。一八六三年初，民族聯盟在萊比錫召開全體大會。雖然他們是為普魯士的首腦工作，他們却不敢在一個普魯士城市召開大會。舒爾采—德里奇一月三日在提佛利（現今萊比錫工人的大眾會場）一個大會上講話，這是一個當時沒有人認為可能的轉變。在這裡，達麥爾博士請求舒爾采—德里奇說明民族聯盟同工人的關係。舒爾采作了回答，其中說：工人當然應該關心政治，但是，他接着說，工人的處境這樣壞，過着吃這頓沒那頓的生活，怎麼能有時間和心思去關心公眾事情

呢？不能，实在不能！摆脱这种生活上的贫困，对于每个人民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德意志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民族任务。正当的工人拿他们省吃俭用的钱来改善他们的地位，“我谨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他们致敬，认为他们是民族联盟的精神上的会员，是民族联盟的名誉会员。”

这个演讲在激进的工人当中引起憎恨，它表明民族联盟不要工人会员，所以也拒收每月的会费。那个会议开过后不久，一个新的代表团——达麦尔博士、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去到柏林，他们再也不怀疑那些权威人物对工人的看法了。年轻的路德维希·勒维，就是著名的兵工厂路德维希·勒维公司的创始人，把代表团领到拉萨那里。他们三个人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对他们的要求的谅解和热心迎合。他们同拉萨商妥，把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继续推迟到他（拉萨）在一个单行小册子里写出他对于工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意见的时候，这本小册子要由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来担任推销。

在这里我想提到，莱比锡运动中权威人物的转变，表面上是相当突然的，所以敌人方面指责他们不坚定和暧昧。本来在一八六二年十一月的工人大会上，还根据弗里茨舍的建议，通过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筹办一个消费合作社。一八六三年二月初，就是已经同拉萨有了联系的时候，弗里茨舍报告他到哥达和爱尔福特去的旅行以及那里的消费合作社，并建议在莱比锡也建立一个消费合作社。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被瓦尔特希阻止了。瓦尔特希说明，中央委员会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件事他处理得很聪明，因为这时候拉萨正在写他的复信，而谁都知道他在复信中认为消费合作社对于提高工人地位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这时在莱比锡建立消费合作社，那就很离奇了。

当时瓦尔特希也还持着比较和平的论调。一八六二年底，他

在莱比錫《中德意志人民報》上发表一篇辯駁性的長文，反駁別人對中央委員會的攻擊，他在文中說，對工人所追求的未來，我們的職責是保持最大的克制。另一方面，瓦爾特希在聲明中已超過了拉薩爾，拉薩爾當時還只講工人等級，而瓦爾特希卻提出這樣的命題：工人並不是一個特殊等級，而是一個由實際情況創造出來的階級。不過隨着拉薩爾的復信的發表，領導人就來了個陣綫轉變。要因此去指摘他們，那是不對的。在動蕩時代會發生迅速的思想轉變。思想過程加速了。三年以後，當德意志遭到一八六六年的大難時<sup>①</sup>，我的情形同許多我當時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十分相似。由一個掃羅一下變成保羅<sup>②</sup>這種急劇轉變，沒有奇蹟也可以重新出現。

我於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初退出了中央委員會。我在職工教育協會的職位極大量地占去了我的時間、我的力量和我的興趣。如果沒有工人會議或委員會會議妨礙我，我就每晚在協會里渡過，比協會主席們更了解會員們的希望和需要。這樣，我不久就成為委員會會議上和月會上動議最多的人。我的動議幾乎經常可以預計被接受的。因此，我的影響就大起來了。那時，我還是一個工人，就是說，我必須由早六點到晚七點站在旋床旁邊，中間總共有兩小時吃飯的間歇。這樣，我在各方面過大的活動，也就成了錢的問題。此外，委員會和大會上所舉行的辯論，在我看來，是很模糊而且無益的，從而使我對於脫離委員會感到輕鬆。

一八六三年二月六日，我還同瓦爾特希有一次辯論。他代表前進社，我代表職工教育協會參加德累斯頓工人教育協會成立紀念會。在會餐時，瓦爾特希作了一個挑撥性的講話，他還是照老樣子發議論，他說，工人固然應當受政治教育和人文教育，但不必也

① 指普奧戰爭。——譯者

② 意即由一種見解的反對者一變而為這種見解的擁護者。——譯者

受基础教育。对工人实施基础教育，乃是国家的事情。他建議为前两种教育干杯。这就把我逼上戰場。我駁斥他，并且高呼普通教育万岁。我們的辯論自然不会产生愉快的印象，但对于瓦尔特希的挑畔，我实在难于緘默，而因为德累斯頓协会所追求的目的是与我們相同的，我更难于緘默。

## 拉薩尔的登場及其后果

一八六三年五月初，拉薩尔的《給筹备莱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发表了。在这封信发表的前几天，我在职工教育协会成立二周年紀念会上致祝詞，說明我是反对普遍、平等、不記名和直接选举制的，因为工人对此尚未成熟。我的这种見解甚至触犯了协会中我的几个朋友。相反地，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我的未来的妻子同她的哥哥，却非常喜欢我的演讲。但我有理由推測，她所欢喜的多半是講話的本人而不是講話的內容，因为內容如何当时对她也許是无所謂的。

拉薩尔的复信在工人中所造成的印象，远不像首先是拉薩尔、其次是他的一小批追隨者所期望的那样。我亲自在职工教育协会散发了二十多份这个文件，以便使反对方面也发表意見。为什么这个文件会給当时参加运动的多数工人造成那么微薄的印象，今天有些人或許认为难以理解。而这却是不能不如此的。不仅經濟状况还非常落后，就是政治状况也非常落后。营业自由、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废除护照和旅行自由、結社和集会自由的要求，对当时工人來說，要比生产合作社迫切得多，工人对由国家資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还不能有正确的观念。組合思想或者我們叫做合作社思想还剛在萌芽。就是普遍选举权，大多数人也认为不是必不可

少的权利。第一，如一再提过的，政治修养还差；其次，大多数人认为普鲁士议会对于俾斯麦内阁的斗争是一种英勇行为，值得支持和赞扬，而不应当加以谴责和蔑视。谁像我这样在政治上活动，谁就如饥如渴地听取议会的讨论，把它看做政治智慧的流露。而当时支配舆论的力量远比现今大得多的自由派报刊，也尽力使人保持这种信念。自由派报纸现在还是用前所未闻的冷嘲热讽来攻击拉萨尔的登场。人身的毁谤和轻蔑像雨点似的向他打来；而主要是保守派的机关报，例如《十字报》，才客观地对待拉萨爾（因为拉萨爾对自由主义的斗争对他们非常有利），这在我們眼里并未提高拉萨爾和他的追随者的声望。如果我们最后设想一下，时至今日，在做了四十五年多的紧张的启蒙工作以后，还有上百万工人跟着各种资产阶级政党走，那么，在六十年代，大多数工人对新运动抱着怀疑的态度，也就不足怪了。而且那时还看不到社会政策的功效，这种功效是很久以后才由社会主义运动争取来的。拓荒者总是只有少数人。

拉萨爾的登场，对于莱比錫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是委员会陷于分裂，委员会的主要支柱前进社也陷于分裂。罗斯梅斯勒教授、翻砂場主歌茨（林得璠—莱比錫体育家歌茨的弟兄）、道尔格和社中相当大一批工人都声明反对拉萨爾。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和达麦尔博士带着少数人成为新运动的实际支持者。新运动在莱比錫的拥护者，比较起来，还是最多。柏林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新运动逐渐在汉堡—阿尔托那觉得基地，从这里向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发展，而后到汉諾威、卡塞尔、巴門—爱北斐特、索林根、容斯多夫、杜塞尔多夫、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美因茨，到屠林根的爱尔福特和阿波尔达等几个城市，除莱比錫以外的薩克森，还有德累斯頓（这里的德累斯頓工人教育协会的首領福尔斯特林在一八六四年初率领一小群随从者拥护拉萨爾），此外还有奥格斯堡。



但是这种发展，如上所述，是逐步的、薄弱的发展，很不符合拉薩尔及其追随者所抱的希望。他在公开复信中預計他所提議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可以拥有他当作一支巨大政治势力的十万會員，希望不久就可以达到这个数目。但是大家知道，社会主义运动要获得这个数目的有組織的信徒，还要經過很长的时间。

三月底，萊比錫委员会在一个工人大会上宣布辭职，提議选举一个新委员会来从事拉薩尔所拟定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事宜。在經過异常激烈的辯論以后，大会多数宣布同意这个計劃，委托达麦尔博士、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担任这项新任务。

四月十六日，拉薩尔终于亲自到萊比錫，并在一个大会上讲话，这次大会同当时其他多数大会一样，是在艾尔斯特街音乐厅举行的。讲題是《論工人問題》。大会約有四千人参加，但其中一大部分在閉会前就离开會場。自由派在商人考乃尔领导之下占据了讲坛对面的走廊，时常大声喊叫来打断演讲。給演讲人作的部署也有点特殊。拉薩尔的讲坛上堆着許多书，其中有些是很重的大对开本，好像要来一个路德对埃克的辯論<sup>①</sup>。

81

拉薩尔好像感到，他要遭遇一个必須駁倒的严重反对派，但事实并不如此。他的亲自登台并没有引起每一个人的好感。他的瘦长的、但有力的体格站在讲坛上，充滿了挑战的神情，屡次时而把一只手，时而把两只手插入背心的臂孔里。他讲话流利，有时語調动人，但我总觉得他好像有点吞吞吐吐似的。他讲完后，會場中大部分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另一部分则回答以嘘嘘之声。

继拉薩尔之后由罗斯梅斯勒教授发言，他宣讀了一篇較长的宣言，他在宣言里說，他知道同意他的見解的在这个會場中不是多数，但他希望将来还会有了解的。他抗議拉薩尔对德意志进步党

<sup>①</sup> 一五一九年馬丁·路德和埃克在萊比錫作关于教皇制的辯論。——譯者

所进行的攻击，其次他反对把工人与进步党分开而另组一个特别的工人党的企图。拉薩尔的答复是简短而非常迁就的。他认为罗斯梅斯勒和他的分歧是策略性的较多于原则性的。拉薩尔阵营的人显然还希望把罗斯梅斯勒拉过去。此外，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因为罗斯梅斯勒对教堂和僧侣进行斗争，所以都热诚地尊敬他。他们二人同罗斯梅斯勒同属于莱比錫的德意志一天主教教会，二人对于罗斯梅斯勒的分离都感到痛惜。

拉薩尔并不以群众的喝采为满足，他很看重把有名望有势力的人物由资产阶级阵营拉到他自己方面来，他大力争取这样的人。固然在莱比錫有烏特克教授转到他这方面，但是这件事与这个人已往的政治立场是不容易协调的。烏特克是大德意志派，很倾向奥地利。他就以这个身份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议会议员。他与罗斯梅斯勒在政治上和个人方面都互相敌对。此外，烏特克猛烈反对小德意志的进步党和民族联盟，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差不多是由同一群人组成的。现在拉薩尔既然反对进步党，自然得到烏特克的热烈喝采。烏特克对社会没有较深刻的理解，但是，  
82 附帶說一句，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并具有优美的声音。他那矮小的、弯曲的、一头黑发的形像，有点像地灵鬼。烏特克写给拉薩尔的信，在上述的莱比錫大会上宣读，证实了我对烏特克的立场的见解。无疑地，拉薩尔对烏特克也有正确的估计，不过烏特克只要外表上站在他那方面，他就于愿已足了。

我在这里声明，我并不是在写整个运动的历史，而只是记述我个人在这运动中的见闻和关系。如果有人愿意钻研整个运动的历史，我介绍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伯恩施坦的《柏林工人运动史》。

随着拉薩尔的登场和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全德工人联合

会在莱比錫的建立，发出了工人世界内部激烈斗争的信号，这种斗争从这时起一直进行了许多年，共同时常发生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事件。双方的怨恨与时俱增，工人们由于不习惯于文雅的语调（附带说说，即使平常以这种派头自豪的人，一旦彼此之间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也就置之不顾了），以致常常用最野蛮的暴行和辱骂相互投报。会场中的斗殴和暴行也屡见不鲜，双方互相冲突的结果，常常使会场主人拒绝租用会场。在集会中，每一方的主要意图，都是夺取会场的领导权，所以斗争的开端照例是为了主席。有一次在开姆尼茨工人大会上，我发现拉萨尔分子为了取得多数竟将双手一齐高举，我就要两派都举双手。在哄堂大笑中这个建议通过了。于是拉萨尔分子遭到失败。

自然，运动中的斗争和存在的对立，尤其是在莱比錫，充塞我们整个的感情和思想。我们在协会、在大会和在私人圈子里所进行的争论，到夜晚回家时还在街上继续进行。这种争吵通常都是高声大喊，往往闹得守夜人前来干涉，并警告说再不安静下去，就要以扰乱公共治安之罪把我们带到甜食市上（警察局）去。但警告只是暂时生效。

这种意见斗争的唯一好处，是使双方都尽最大努力去发展党徒。这特别发生在我所属的那一方面，几年以后，它也归于社会主义，不过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斗争，而该联合会则自一八六七年起分裂为大小不同的两个派别。但是力量、金钱和时间都空前地消耗在差不多十年之久的互相斗争中，徒使敌人快意。

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在莱比錫引起的结果，是消除了职工教育协会和前进社之间的旧有分歧，两个团体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合并起来，名为工人教育协会。工艺学会早已放弃了徒劳无益的对职工教育协会的监督。此外，萨克森政府也认清一八五六年同盟

会的旧決議不再能实行；它不管好坏只有放松管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倾向虽然与同盟議会的決議相抵触，可是早就选择莱比錫为它的会址。政府最后作出結論，并于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宣布废止那个同盟議会的決議。

84 我們从此以后常常得到一种經驗：所有用以阻遏或压制一个运动的法律和鎮压手段，一俟运动表现为天然必要的、因而是不可战胜的时候，这些法律和手段就不灵了，它們的实际效用便消失了。政府机关最后甚至失去对自己的权力的信心，放弃这已成为无望的斗争。那时薩克森有关結社法的规定是如此，而且不久以后普魯士及其他各邦对工人結社的禁令也是如此，大家对这些法令就干脆置之不理。

工资斗争不顾一切結社禁令，以停工开始，而政府中那些聪明老爷們还在考虑是全部撤消禁令或是撤消到某种程度。后来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統治下也取得这种經驗，官厅最后也认定，要把禁止集会結社和取締书籍报刊仍照頒布非常法初期那样执行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更后，妇女运动在那些禁止妇女組織政治团体或参加政治集会的德意志諸邦中，也取得了同样的經驗。实际上，在各邦政府终于决定把不顾原先禁令而存在的事实用法律批准以前，这些禁令早已被排除了。法律始終是跟在需要的后面姗姗来迟的，从未走在需要的前面。

莱比錫的工人教育协会到了不得不重新改組的时候，我当选为第二主席，这职位早在职工教育协会的后期就是由我担任的。不久以后，第一主席医学博士萊赫尔（鮑克教授的学生）辞职，我接替了他的职位，一直担任到一八七二年，即到我以所謂图謀背叛德意志帝国的罪名被关进要塞监狱为止。

自一八六五年起，工人教育协会每年由市政府津貼五百塔勒，該款主要用途为购买較好会址和維持教学。但后来几年随着协会

主席在政治上的脱胎换骨，协会自己也越来越左倾，市政府代表先把津贴减为二百塔勒。至一八六九年，协会在我的领导下，经过三个夜晚的论战，大多数通过了宣布赞成爱森纳赫新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于是在次年失去了市政府津贴的尾数。自由党只津贴政治上老实驯顺的儿童，因为协会的学目的并未因它的政治转变而受丝毫影响。协会继续存在着，发展着，直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强暴地割断了它的生命为止。

## 各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的联合大会

工人协会的数目大量增加，在萨克森尤其如此。除了我们之外，在莱比锡从事于这项工作的还有尤利乌斯·莫特勒，他是我在一八六三年在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上认识的；还有克里米朝的威廉·司滔莱，以及还没有变为拉萨尔分子的铜匠福尔斯特林、德累斯顿的鞋匠克瑞菲尔、弗兰肯堡的纺织工人皮尔斯、格劳绍的纺织工人李波特和弗兰茨、里希登斯坦—卡尔恩堡的订书工人魏尔纳、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的纺织工人包奈等。我们的影响还扩大到屠林根。在厄尔士山脉深处，在编工和织工居民中间成立了几十个工人读书会，会里弥漫着活泼的精神生活。德国其他各地也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在符腾堡成立了许多工人协会，它们在一八六五年就已合并为一个全州的组织，并且以后不久就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在巴登和汉诺威王国也产生了许多工人组织，大多数是教育协会。

拉萨尔分子一方工作的勤勉与一致，也引起对方联合的必要。但是这种联合只能是松弛的联合，因为像拉萨尔分子所有的那种共同的固定目的，并为此目的而斗争的热情和牺牲精神，是各协会

所沒有的。我們唯一同心一致的，是對拉薩爾派的敵意，而且表面上協會是不願過問政治的。但事實上，大多數協會的領導人或者幕後人，都設法爭取他們所影響的協會來擁護他們的黨派政策。在這些協會中，當時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政黨，自共和派民主主義者到右翼民族聯盟分子，都有代表。後來（一八六七年）民族自由黨便是從民族聯盟中形成的；而傾向大德意志派的激進分子在一八六五年脫離了民族聯盟，另組織民主主義的人民黨，它的機關報是埃克哈特教授在曼海姆出版的《德意志周刊》。

人們暫時在各協會也盡量和好相處。政治形勢還沒有逼人採取鮮明的決定，因為對普魯士俾斯麥內閣的憲法鬥爭有全體一致行動的必要。與民族聯盟對峙建立起來的德意志改革協會，主張在德意志帝國中保持全部奧地利，它是一個由南德意志分離主義者和奧地利分子所組成的混合體，並帶有擁護羅馬教皇的強烈臭味。它對工人運動無關重要。它支持奧地利的同盟改革（主要由各邦議會選舉產生一個德意志議會），沒有在任何地方引起民眾的同情。總之，在工人協會中人們對於德意志問題沒有表示明白的態度，對於從一八六四年起就十分尖銳化的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也是這樣。

工人運動也在德國西部，特別是在美因部取得了基地。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由法蘭克福工人教育協會召開的工人協會會議上，關於工人的政治態度發生激烈的辯論。約·巴·馮·施韋澤律師（他後來在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主張工人應有一個特別的政治組織，這顯然是受了拉薩爾（論目前歷史時期同工人等級思想的特殊聯繫）演講的影響。自此以後，在美因部意見上的衝突也迄未停止。拉薩爾的復信的發表更是火上加油。在法蘭克福，現在伯恩哈特·貝克爾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年後，我認識了他這個資質平庸而自命不凡的人物，

他在演讲上也是笨拙的。路易·华希纳教授在雷台尔海姆工人会议上（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九日）作了有关拉薩尔政綱的演讲，想通过一个反对拉薩尔的声明，但这个企图失败了。反之，拉薩尔于五月十七日亲自来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为他自己的事业作辩护。舒尔采—德里奇同样接到邀請，但他因工作繁忙，謝絕参加。他这样做是好的。如我后来对舒尔采—德里奇本人所認識的，在拉薩尔面前，他在任何方面都会处于劣势。宗納曼曾在拉薩尔面前发言，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

对于美因部上述情况的回答是五月十九日的通告，邀請德意志的各工人协会于一八六三年六月七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在这个通告上签名的是美因部工人中央委员会，柏林、卡塞尔、开姆尼茨和紐伦堡各地的工人协会，杜塞尔多夫的手工艺工人协会。

在通告中，把工人代表大会长久不能召开的过错归咎于莱比錫中央委员会。但运动本身却具有“一个这样重要的、有益的思想，其长远意义在于为我们全体人民和祖国的幸福打下和平的、有利的发展基础，决不应因个别人的错误而妨碍其健康进程。凡是关心这个事业的人，都有責任以全力防范，不要使一个应由个别人負責的错误尝试的結局成为整个运动的不幸的四分五裂的开端。”

但是这种分裂业已存在，如我后来所認識到的，那是一种內在的必然性。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合会議上，有来自四十八个城市的五十四个协会和一个自由的工人集会（莱比錫）的共一百一十个代表参加。會議的召开若不是手忙脚乱地像举行奇襲似的，如同预备会上对召集人所指責的那样，則参加者会更加踊跃。莱比錫职工教育协会以一百二十七票中的一百一十二票选我为該会代表。此外，在莱比錫工人集会上罗斯梅斯勒教授和比特尔工长也当选为代表。

我到法兰克福后，在预备会上被介绍给当地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勒克尔，他向我招呼说：“你们萨克森人到底睡醒了没有？是时候了！”我颇为不快地回答道：“我们比许多人要起得早些！”勒克尔笑了，他说他并无恶意。

代表中有海尔曼·贝克尔，绰号红色贝克尔，他曾在科伦的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判处长期监禁；欧仁·李希特尔，他不久以前因为当陪审员的政治活动而受了责罚；此外还有由慕尼黑来的尤利乌斯·克瑞尔，他是《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的主人，该报当时是一个小型报，但是给它的主人赚来一份大财产。

红色贝克尔的绰号是来自他那硕大头部上仅有的稀稀几根红发和他那剪得短短的鬃，还是来自他早年的红色思想，我不得而知。贝克尔是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兴高采烈的先生，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享受美酒佳节的快乐的。他也是爱说话的健谈的人，与欧仁·李希特尔相反，李希特尔的冷酷、矜持的神情当时已令我惊讶；他给我的印象是好像他是至尊，没有把我们大家放在眼里。偶有一次在午饭后休息时间，我同贝克尔、欧仁·李希特尔和另外几位代表在市内人行道上闲逛，于是谈到拉萨尔。贝克尔表示，拉萨尔只因进步党没有推他为领袖，没有给他一张邦议会委任状，触伤了他的虚荣心，所以他就宣布反对它。照基多·威斯的说法，老瓦尔德克曾说过，对拉萨尔加以排斥，是一个错误。此外，贝克尔还暗示说，拉萨尔也曾因种种男女关系问题在进步党中引起“道德上的顾虑”，但就“道德过失”而论，当时进步党的其他领袖也曾犯过，这样说有点像是伪善。我要着重指出，贝克尔的谈话对拉萨尔并不含有敌意，他从来不让自己卷入对过去本党同志的攻击；米凯尔就与他相反，这个人后来竟赞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公推商业学校校长吕里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为第一主席，狄特曼（柏林）为第二主席。议事日程第一项是罗斯梅斯勒的提



案，差不多全体一致通过，其内容如下：

“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工人教育协会的第一次联合大会把下列声明摆在讨论和决议的首位：它认为出席大会的和所有的工人协会以至全体工人等级的第一个责任，就在于为努力争取工人等级的精神的、政治的、公民的和经济的提高而团结一致，同所有为德意志祖国的自由和强大而努力的人们团结一致，同所有致力于提高人类品质的人们团结一致并互相合作。”

这个决议把会议的立场表现得比长篇大论还要清楚。虽然这个决议同联合会整个讨论一样，是针对着拉萨尔主义的，但就我的记忆所及，拉萨尔的名字只有一个演讲的人提到过。这种回避并非预先商定；这可以认为是人们还不相信拉萨尔所倡导的运动的前途，或者也因为人们不愿提起他的名字来提高他的声誉。关于议事日程第二项“工人教育协会的本质和目的”，由大会的左派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报告。我也参加辩论。值得注意的是，狄特曼要求协会设法延请讲授国民经济学和各种立法知识的教师的修正案，竟以二十五票对二十五票否决了。对今天的工人说，这种落后性是几乎不可想像的。

议事日程的另一项由狄特曼报告，是要求排除劳动自由的障碍。他的议案要求营业自由、迁徙自由和消除结婚的困难。议程的再下一项是工人对于储蓄和信贷协会、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的态度。会议提倡工人建立这样的合作社。同样，会议还提倡设立合作社，以便共同使用有动力的作坊，认为这是促进工人的全国福利和公民独立性的最好方法。在这个决议中特别指出，这一切都应该按照舒尔采—德里奇的建议去执行。这样的合作社的建立，还应该由工人和雇主共同促进——这种观念只有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会议才能赞同。最后，会议表示同意创设老年和残废保险金库，这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除许多忧虑”。这里至少对于这种金

庫沒有估計過高。在組織問題上，建議設立专区联合会，按月召集代表會議，以便促進新協會的建立和保持現有協會間的聯繫。對於這一項，我第二次發言，反對准許自由的工人集會的代表參加組織。根據我當時的經驗，我說明這樣的集會一直沒有使我佩服的地方。在協會中做得到的有準備的教育工作，參加自由集會的人是得不到的，因而他們就會跟着一個熟練演說家所喚起的一時印象跑。我當時並不畏懼結社法的圈套，至少在薩克森對我們一直是放任的，但某種反動還可能到來。专区联合会我認為是有用的。這些話使我的萊比錫對頭比特爾走上讲坛，他對我的關於工人集會的估價提出抗議。他說，自由集會要比我所形容的好得多，並且考慮到人們有用結社法再來嚴厲反對我們的可能，我們就必須借自由的工人集會來掩護我們的代表機關。

最後通過的制度是：

一、應定期舉行德意志工人協會代表的自由聯席會議，尋常每  
91 年一次，以便通過活潑的親自交換意見和經驗，在工人中間擴大對於他們真正利益的理解，並使這種認識在日益擴大的範圍內取得承認。

二、一切對於勞動階級福利發生影響的事項都是討論的對象。

三、德意志工人協會的代表在聯合大會上以全權委任狀證明身份，始得參加會議。但自由工人集會的代表，如取得負責審查代表資格的常務委員會的許可，也可以例外准許參加。如果常務委員會不准許參加，則可以向聯合大會提出申訴。每一協會可派一至五個代表參加，但在表決時只有一個表決權。每一代表只准代表一個協會。凡參加過一次聯合大會的協會，在每次開會時都應得到書面的邀請。同時，邀請啟事要在盡量多的報紙上刊登，無論如何必須在科堡的《德意志工人總匯報》和法蘭克福的《雇主報》上公布。每一個出席聯合大會的協會，每次須納費二塔勒。未派代表

但仍願索閱各項報告和印刷品的協會，亦應照繳費用。

四、每次聯合大會選舉十二個會員組成常務委員會，處理下列各項事務：1. 下次聯合大會的地点和時間，如未經上次集會明白決定，委員會應予規定，並在會議地点作必要的準備。2. 公布請柬和通知，辦理登記，備妥入場券，收支款項並登記賬目。3. 提出臨時議程並根據議程約定報告人，在聯合大會批准或修改決議的條件下組成審查小組。4. 負責在下次會議以前促進聯合大會的目的和實行聯合大會的決議。5. 推舉委員會主席並將業務分配給各委員；提出收支報告，請聯合大會審查和核准。委員會會議限在該屆主席居住地舉行。對全體會員發出邀請，至少有委員七人出席會議並由簡單多數通過，決議方為有效。議案也可以書面表決。如果有了空缺由委員會來補足，如果委員會不足法定人數，由主席決定。

五、聯合大會的議事規程由聯合大會自行規定。

六、委員會主席主持聯合大會的討論，至聯合大會會議選出它的主席為止。

七、聯合大會的開會是公開的。

當選的常務委員會中有：宗納曼、麥克斯·維爾特（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艾希爾斯多夫爾（曼海姆）、狄特曼（柏林）等。新機構的靈魂是宗納曼，他擔任書記工作和實際上的領導。

組織方面撥給委員會的經費為數極少，甚至每年二塔勒的區區會費，有許多協會也不繳納。為一個共同目標而犧牲，是那时候反社會主義的工人協會不贊成的，這也是它与拉薩爾分子中間很不利的差別。由於缺乏經費，委員會在當年夏季向民族聯盟商洽，得到五百塔勒，以後二年也仍照給。宗納曼私人也向一系列的大企業家請求。但是在那時候，我們的資產者就已經本能地憎惡以工人協會命名的一切，所以由這方面來的捐助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里我想谈一件事情，这件事虽是在两年后（一八六五年夏季）才发生的，可是四十年后有人在《科伦日报》上试图以不利于我的方式加以利用。

- 93 在萨克森，反对拉萨儿党徒的斗争特别激烈。那时萨克森高度发展的工业状况似乎给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适当的园地。但是要进行反鼓动，我们却缺少经费。不管我们筹集多少鼓动费，总是不够用，虽则演讲人的报酬异常菲薄。于是有一天艾拉斯博士和著作家魏特曼（一个过着流浪生活的符腾堡人）坐下来，共同写了一封非常稳当的信给民族联盟的理事会，请求资助反对拉萨儿分子的鼓动费。他们写好信以后才告诉我，我也就应他们的请求签了名，此外艾拉斯和魏特曼也签了名。《科伦日报》把这封信和我收到二百塔勒（不是像它所說的三百塔勒）的一封谢函在前几年发表了，推测说三个签署都是由我而来的。对于这个诬蔑我必须坚决自卫。在谢函中我曾提到，打算为协会购买书籍，请民族联盟的理事会在这方面运用它的威信商请书商以廉价售给。理事会给了支持，这表明，它对于运动的兴趣并不像各方面所指责它的那样缺乏。在这期间，这笔款项特别用于鼓动旅行，但是花得非常节省，至一八六六年底和一八六七年初为北德意志议会选举作鼓动时，那二百塔勒还存有一百二十塔勒，供当时使用。这项使用确实是预计不到的。但从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六六年，局势恰好改变，到处都发生了迅速的思想转变，只有极少数还站在旧有的立场上。民族联盟在这次转变中所遭受的损失最大，从那时起很快地趋于解散，但实际上在一八六七年秋季正式解散以前早已死亡了。我们收到那二百塔勒，惹得许多人生气。尤其汉斯·布鲁姆博士怒不可遏。他
- 94 认为特别有责任在选举鼓动中反对我，并且指责我们接受那笔款项。但是，他必然会发现，他那一切想陷害我的努力都是枉费心机。

借这机会，我可以确认，我从未如人们屡次断言的那样，是民族联盟会员。那时我虽没有对它表示敌意，但除了我当时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活动所负担的大量物质牺牲之外，如果再加上民族联盟的盟费，对于我来说就过份了，因为我的收入是很少的。引用舒尔采—德里奇的话，我满足于充当民族联盟的“精神上的名誉盟员”。

在莱比锡感到一种需要，作为对抗拉萨尔的登场和他的追随者的鼓动，要进行一个大反击。因此，我受委托与舒尔采—德里奇联系，来商定一个集会。关于这事，他表示愿意。在他的回信中，他给我分析说，我们在萨克森必须特别小心，因为萨克森的工人早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就已倾向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一八六四年一月间，舒尔采—德里奇来到莱比锡。

大家一致同意，我以欢迎舒尔采—德里奇作为大会开幕词，随后可以当选为主席。但我运气不好。大会参加者约有四、五千人，我在致开幕词（我已背诵得很熟）时，到中间不幸讲不下去了。我的热情把我的思想带走了。我羞得恨不能钻入地下。其结果，不是我而是道尔格当选为主席。从此以后，我誓不再背诵讲词，于是经过良好。舒尔采—德里奇嗓音不好，他的演讲也枯燥无味，其内容不适于鼓舞热情。许多人都为他感到失望。他没有阻止住向左的发展。

法兰克福联合大会决议从事建立专区联合会，我们企图在萨克森加以实行。但因碍于现行法律，我们向博伊斯特内閣请求批准。在一八六四年夏季由我主持的地方集会上宣读了馮·博伊斯特先生的来信，说：大臣可以批准专区联合会，如果协会约定不从事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一切公开的事。我为此建议下列议案，由全体一致通过，

“薩克森工人協會感謝馮·博伊斯特先生的恩賜，寧願放棄專區聯合會的總立。”第二個議案是：“出席的代表要求薩克森工人以全付精力來廢除現行的結社法”，監視的警官認為這是政治性行為，不准付表決。我因此同他發生激烈的爭論，但當他以解散會議相威脅時，我只好在抗議條件下順從了。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斐迪南·拉薩爾在日內瓦因與人決鬥而逝世的消息由電報傳遍世界。這個消息所引起的印象是深刻的。他的絕大部分敵人都鬆一口氣，如釋重負；希望拉薩爾所發起的運動就此完結。事實上，起初也像是這樣。不但他那聯合會盡管費了他九牛二虎之力在他死時卻只有區區幾千會員，而且這些會員還立刻陷於互相爭吵。拉薩爾莫明其妙地推薦著作家伯恩哈特·貝克爾為他在聯合會主席團中的繼任人，他所選擇的這個人是在各方面都不能勝任的。

拉薩爾有許多敵人對於他的重要性持公平的論調，這有一八六二年底創刊的科堡《工人總匯報》上的一篇文章為證，這報是由律師史特萊特博士（科堡民族聯盟的事務主任）創办的。這家報紙一向攻擊拉薩爾，雖則是很有分寸地攻擊，但這并不妨礙它獻給他一篇推崇備至的悼詞，在結尾時說道：

90 “一部分自由黨和自由主義報紙，就是攻擊他最因而最沒有權利攻擊他的一部分，也正是最應該受他打擊的那一部分，現在將因他的死亡而暗自歡喜。我們悲悼一個敵人的死亡，只有不公平和褊狹性才准許用尋常的標準來衡量這個人。”

大家知道，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拉薩爾多年的親密女友，為了對友人的遺體表示隆重的崇敬，要想運遺體通過德意志全境來舉行追悼會，這個計劃因拉薩爾的親屬的干涉，被官方打消了。聽到拉薩爾的靈柩經過曼海姆的消息，艾希爾斯多夫爾寫給宗納曼

一封信，我引用他的下列一段，因为它表明了我們这方面个别人已經对于这种情况抱怎样的看法。

信上说：

“亲爱的朋友宗納曼！

頃接頓謝由日内瓦来电，說拉薩尔的灵柩将于星期五抵此并轉运到汽船上。在他生前我們虽然与他对立，但大体上我們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拯救我們的人民群众。我相信，我們在这期間业已認識到，如果没有普选权和由此导致的现今国家情勢的轉变，就不能期望有彻底的补救法。现今或許就是适当的时机，由我們这方面来做点什么，以便使两股潮流在一个相应的綱領的基础上汇合为一，并以此为已成过去的战斗作一紀念。对方稍加节制而我方稍加果斷，这事就能办到，并且对于事业只会有益，因为現在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性，如果它要向目标前进，就必须加以推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应当告訴你并願听取你的見解，以便随后或可促使我們的朋友采取一个有时会有远大后果的步驟，另一方面也不至有什么害处。

我也模糊地感觉到，我們在萊比錫<sup>①</sup>将导致有力的決議，因为一切如果一下子逼到原則上，我們就不便反对。冷淡和曖昧都毫无用处，也不足以作出正确的解决……我不能逃避为拉薩尔送葬的义务。有几个朋友也将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应否邀請联合会参加，因为这会引起誤会，因为許多人并不懂得，更多的人也不願懂得，对于拉薩尔，虽則不能同他完全一致行动，也可以佩服他。”最后他請宗納曼把意見告訴他。

他在附言上写道：“难道你到这里来向敌人致敬，与你作为工人协会主席的身份不合適嗎？如果你願这样办，請来电告知，随后

<sup>①</sup> 萊比錫已决定为下次联合大会地点。

我一知道灵柩到达的时间，即刻告诉你。”

宗納曼对这封信如何答复，我不知道，不过艾希尔斯多夫尔的建议沒有受到考虑。必須再經過許多事变，像艾希尔斯多夫尔那样的願望才能得到滿足。

在常务委员会根据萊比錫职工教育协会的建议决定在萊比錫召开下一次联合大会以后，科堡《工人总汇报》加以反对。要在博伊斯特先生所管辖的薩克森举行一个联合大会是不可能的，該报对于这项决议展开爭論。唯一贊成科堡《工人总汇报》的是巴登的一些协会，在它們的联合大会上就是按这意思表决的。对于在薩克森举行會議抱着一定的顧慮，是有理由的，因为會議的举行是根据薩克森的結社法，而这个法律完全操在能够反云复雨的馮·博伊斯特先生之手。

98 为了不致下雨，我們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环境，就是說，常务委员会已应我們的請求，声明把作为一个特别的政治性問題的国防問題不列入联合大会的議程。办理筹备事宜的当地委员会是由前进社、职工教育协会和印书业的进修协会的會員各二人，此外还有比得曼教授和工艺学会委员会委員一人組成的。主席由我担任。馮·博伊斯特先生对于我們的申請迟迟不作决定，最后还是批准了。會議于是訂在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召开，規定議程如下：  
1. 迁徙自由。2. 合作社制度，就是：(甲)消費合作社，(乙)生产合作社。3. 教育协会的統一教学計劃。4. 流动工补助基金，这是应各协会中很多青年工人的要求而設立的。5. 老年保險。6. 人寿保險。7. 劳工市場的調节，即工作介紹。8. 工人住宿。9. 选举常务委员会。

这是供两天討論很丰富的議程，要完成这个議程，只有由报告人預先发表意見和議案并縮短报告和演講，才有可能。但是这两者通常都做得不够彻底。



出席的有四十七个协会，其中单是莱比錫的就有八个，另有巴登高地、符騰堡和美因部等三个专区联合会。当时莱比錫除印刷工人专业协会外，还有一个泥水匠和木匠专业协会。此外，拉薩尔派在弗里茨舍领导下迅速成立另外三个专业协会，即卷烟工人、裁縫和鍛工协会。在代表中第一次看到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博士（杜伊斯堡消费合作社的代表）和馬格德堡工人教育协会代表麦克斯·希尔施博士。还有抱合作社思想的保守派代表胡貝尔教授以来宾身份参加。

會議选举班多（柏林）为第一主席，选道尔格和我为他的代理人。市长科赫博士以全市名义向會議致賀。在討論議程第一項迁徙自由时，就和弗里茨舍发生爭論，并由他那强硬地占据会场（射击大厦）讲坛的党徒大鬧一場。弗里茨舍用拉薩尔思想宣称，关于迁徙自由，不要再加討論，只要加以規定，相反地，必須要求普选权。他的講話极尽挑撥之能事，并引起他的追隨者的示威性的喝采。对于这种方式，代表們提出强烈的抗議。这时我佩服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居間調解的天才。他取得了效果。我这方面以当地委员会主席身份的有力干涉，使楼上也安靜下来。次日，当討論已告結束的时候，弗里茨舍又要求发言，于是又出現了一次激烈的場面。当他的发言不起作用后，他抗議說會議为恐怖主义所控制，并放弃代表权。會議的決議沒有多么大的重要性。弗·阿尔伯特·朗格作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报告，表现为一个出色的演說家。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員的有：班多、倍倍尔、希尔施博士、拉赫曼（欧芬巴赫）、朗格、馬尔頓斯（汉堡，原先的魏特林分子，但是他的共产主义已經无迹可寻了）、賴恩哈特（科堡，以前梅克林堡的国會議員）、宗納曼、斯陶丁格尔（紐伦堡）、史图特曼（呂色斯海姆）、魏特曼（斯图加特）和麦克斯·維尔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由于我是常务委员会委员，我同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有较亲密的个人交际和书信往来。朗格身材矮胖而强壮，相貌非常可亲。他有一双出色的眼睛，是我所认识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之一，令人相见如故。同时他是一位个性坚强、一生正直、遭惩罚而不屈的人。而当他公然支持工人的时候，他就不免受到处罚。他很快就成为工业城市杜伊斯堡的“被褫夺公民权者”和“被管制者”之一。在我们和拉萨儿派之间，他处于居间调解的地位，这表现在他一八六五年一月出版的《工人问题》一书中。如果说他在这书后来的版本中立场较为右倾，也像批评家背地里说他的唯物主义更有形而上学倾向那样，我把这些看做是他长期身患重病的结果，不幸他因此过早去世。

朗格在常务委员会中总是站在左翼方面，并且继续向左靠攏。当时由于纯粹客观的原因，他给我个人帮了很大的忙。我们在莱比锡，如上文所指出，同《德意志工人总汇报》发生冲突。不难理解，该报反对在莱比锡举行会议的态度激起我们的愤怒。

《工人总汇报》的编辑部，似乎是由于从莱比锡来的暗中煽动，认为我们要搞垮该报，并认为我是博伊斯特分子。这是个粗暴的举动。正相反，我始终支持该报，并促进它的传播。我在有科堡《工人总汇报》的敌人的常务委员会里，也为该报辩护，并提议与发行者订立一个适当的协定。但当该报继续对我进行攻击时，我寄给它一篇辛辣的解释，但从中它只登载说，我自认是博伊斯特弊政的一个无情的反对者。

这场争论促使常务委员会委托朗格撰写一个报告，他热情地

为我作辩护，并认为我的行为是正当的。《工人总汇报》还是达到如下目的：当我们于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日在格劳绍召开地方会议，选举斯图加特联合大会代表时，我以一票之差为对手所败。到了后来，在我说明了我的有关《工人总汇报》事件的立场以后，一些代表表示从此改变对于该事件的看法。就是《工人总汇报》在后来也向我赔罪，说它是报道错误。斯特莱特本人在斯图加特联合大会上已亲自向我道歉。

一八六六年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我以后再加以叙述)和朗格对这个事件所持的态度，使他不能留在他充当商会秘书的杜伊斯堡。他把他的《下莱茵通讯》停刊，应友人布劳莱尔的邀请移居瑞士的温特图尔。在那里他参加布劳莱尔的报纸《温特图尔州报》的编辑部。布劳莱尔是苏黎世州的激进民主党领袖之一。那时开始鼓吹改革本州的落后宪法。布劳莱尔、朗格和年轻的赖恩侯特·吕格(他后来与人合办《苏黎世邮报》)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广泛地鼓吹民主主义的宪法改革，并且在一八六八年见到他们工作获得成功。由于朗格的影响，新宪法采纳了下列的第二十三条：国家在立法的过程中支持并促进工人阶级在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福利和合作社事业的发展。

此后在一八六八年夏季，我以工人协会中央理事会名义(这期间我已担任该会主席)，同他用书信联系一次，邀请他参加纽伦堡大会，作有关国防问题的报告，关于这事我另作报道。朗格谢绝邀请，纽伦堡联合大会开会时他没有参加。此后再也没有再同他见面，书信往来也停止了。一八七〇年十月底，朗格被聘为苏黎世大学教授。至一八七二年自由派教育部长法尔克聘请他到马尔堡担任教授，苏黎世拟挽留他而无效。他的夫人很欢喜的重返祖国之行成功了。但是早在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才四十七岁，就死于多年来的疾病。朗格，我们中间一个最优秀的人，竟与世长辞了。

## 新的社会现象

一八六五年春季，在路易斯·奥托—彼得士和奥古斯特·施米特领导下，在莱比锡举行第一次德意志妇女代表大会，结果成立了全德妇女协会。这是走出资产阶级妇女界而把妇女组织起来的第一步。一位退职上尉科尔恩那时编的《妇女报》成为协会的机关报，除科尔恩外，路易斯·奥托—彼得士夫人和燕妮·汉里希斯小姐也参加编辑部。我以来宾身份参与商讨。后来，以路易斯·奥托—彼得士为主席的莱比锡妇女教育协会商请工人教育协会，在星期天让出它的大厅来设立女子星期日学校，我们欣然同意。

一八六五年是个繁荣的年头，各城市中爆发了许多工资斗争。其中有：汉堡大罢工、马格德堡的城内织布工人罢工、莱比锡印刷工人罢工，接着是莱比锡制鞋工人、订书工人和其他各业工人的罢工。莱比锡印刷工人的罢工是工资低和工作时间过长引起的。最高的工资是每周五又四分之一塔勒。每一千大张二十五萨克森芬尼，帮工们要求三十芬尼，并缩短工作时间。三月二十四日，在八百人中解雇了五百四十五人，八天后罢工开始。支持罢工的组织是没有的。以理查·海尔特尔为主席的印刷工人进修协会，在解散处分威胁之下，不得不保持中立。海尔特尔本人在科尔底申印刷所工作，该所已承认新的工资标准。印刷工人联合会到一八六六年才成立；这就是由莱比锡罢工激起的。德意志的第一流法学家、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曾试图调解，没有结果。

宗纳曼作为印刷业主，对于这个事件特别关心，写信给我，要我请求常务委员会为双方调解，为了这种企图他给我寄来了各种

規章。我同他关于这事的通信，至今似乎还有趣味，我把它发表在这里：

“萊比錫，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一日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列奥波特·宗納曼先生：

因久感不适，所以本月一日的尊函至今始克奉复。您的试图为此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作调解的计划，我应完全同意。我先和这里的印刷工人协会主席通信，听取他对这件事的意见。据复信，他是在一家承认工资标准的印刷所工作，因此他同这整个事件没有关系。他建议我向工资委员会接洽。

星期二下午我与工资委员会商谈，他们欣然接受我的建议，使我感到快慰。他们还告诉我几个业主的名字，要我先到他们那里打听一下，看他们方面是否也倾向于调解。这就是基色克与德佛林特和阿克尔曼(托布乃尔公司)的主人。我昨天到他们那里去。

德佛林特旅行在外，基色克不反对，阿克尔曼答复说，我最好去向市参议员海尔特尔(布莱特考卜夫与海尔特尔公司)或者布罗克好斯接洽，他们是合作社主席。我在这里必须说明，我曾经立意不到上述两个人那里去，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工人最凶狠的敌人闻名的。虽然如此，这个指点使我还是到海尔特尔那里去了。我遇到两兄弟全在家，同他们谈话将近一小时，后来的结论是，在排字工人的工资委员会对于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的调解尝试表示那样不稍让步以后，业主不再进行疏通了。我回答说，自那时以来(十四天)见解也会有所改变，那方面的人们将乐于接受调解。

但我这方面这样的和类似的解释是毫无用处的。我从这些先生的表示很清楚地注意到，他们非常恼恨工资委员会，根本不願和解。

于是有人认为，工资委员会并没有受到委托以排字工人名义

104 进行谈判，而是假冒委任的。这种言论与事实非常不符。又有人说，即使委员会愿意同业主取得和解，而其余的却不愿意，那有什么用处。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接受另外的调解，因为上述秘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在谈判破裂时还声明说，谈判随时可以恢复，如果工人对于建议确具诚意，他们可以为此采取行动。

在这个声明以后，我当然看出了，继续谈判不会有多少效果，于是离开了。

那时罢工的排字工人正在大剧院开会，我把这个消息立刻通知他们，决议如何，到目前我还不知道。

未能获得较好的结果，至感抱歉。

虽然如此，我仍当密切注意这件事，如果这事万一变得对我们有利，当立即奉告。

我确信，工资委员会方面是真心诚意要和解，因为人们渐渐体会到，使事情走向极端是多么危险，而一个光荣的和解乃是最上之策。但另一方面，我也同样确信，所说的那位海尔特尔先生绝不是按全体业主的意向来同我协商，因为大家知道，大多数人怎样愿意为和解而伸过手来。可是又不可与个别人商谈，因为一切这类的建议都要海尔特尔以合作社主席身份提出来。我有意把整个事件在报纸上公布，并且等候着，看是否有个别人愿意不关照海尔特尔、布罗克好斯等最趋极端的领袖而为和解伸过手来。我还听说，有六家印刷所大体上已同意工人的要求……”

宗纳曼接到这封信后，马上于五月十二日答复：

105 “这样长久没有消息，我感到诧异。我在本月一日关于印刷工人的询问只是初步的。我的意见明白说来说是请您与希尔施博士和班多共同进行，他俩也已向我表示同意。这绝不是对您不完全信任，这事情您单独也是能够做的；我的意思是，常务委员会由三个委员代表来出面形式上完备些，因而较有力量。在这方面，我特别

倚靠班多，他是萊比錫代表大會主席，在那里留有好的印象。同时您已尽了一切可能，只可惜您的辛勤努力未能获得更为有利的效果。在您要公布点什么之前，我以为，我若再写封信給布罗克好斯和海尔特尔，再次表明願由常务委员会方面派个代表团到这些先生那里，是合适的。我要提出的理由是，工人们对于自己推选的代表总是最信賴的。或者这样办，由印刷工人授給我們的代表以全权。业主方面可以委派他們的樞密參議馮·韦希特尔和另外几位先生，然后由这个委员会作一个对一切方面都有約束力的裁判。我要写一封信給那些先生，您是否同意，請馬上回信。您写几行就够了。我对您不敢隱瞞，我的意見是，印刷帮工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太过份。我猜想这是拉薩尔分子煽动起来的。如果不是，那末，他們的要求就会达到目的，因为努力提高工資的时机，沒有比现在更有利的；这就表明，从各方面来看，在适当限度內的和正当提出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宗納曼以为拉薩尔分子插手在这次罢工中，这个推测完全錯誤。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固然对萊比錫印刷工人的罢工表示非常热烈的关心，但是对于这次罢工却沒有影响。

我于次日复信如下：

“对于本月十二日的尊函，我的回答是，我对于本月一日信里您的見解理解得完全正确。但是按照这个理解就自然要先探詢和听取双方是否喜欢接受常务委员会的調解。至于我沒有其他行动，想已由昨天的《德意志总汇报》上海尔特尔的声明中看到。这里我只須辯白一下，在这位先生的私人声明以后，我不可能把这类的建議正式提出。”

106

他的声明好像主要是由业主对各报短評所提的种种质問所引起的，短評說，在人們要調解而沒有問当地印刷工人合作社全体的时候，当地印刷工人合作社就拒絕了調解。

关于这事我要說清楚，各公开报刊中甚至矛盾百出的消息，并不是由我发出的。但这些消息倒有好处，輿論又重新发动起来，昨天早晨，樞密參議馮·韦希特尔通知我和其他的人到他那里去，以便同他商討这件事。他告訴我，他随时都准备重任調解，并請我在此事上予以协助。他向我建議，首先再向工資委员会詢問一下，看它是否願意出面，并在何种基础上出面。同时他告訴我，他认为使帮工方面肯让步是絕對必要的。后面这个見解，我不得不完全同意，并且您所說开始时采取的方式不适当的話，也完全正确。

又向工資委员会詢問了一次，它声明准备到韦希特尔那里去，先同他協商。我于是又一次声明，常务委员会立即准备同韦希特尔共同担任調解。他們感謝地接受了，答应在同韦希特尔商談后答复我。可惜昨天下午当代表团來訪时我不在家。今晨接到来信后，立即往工資委员会会所，但沒有遇到一个人。因此，晚一些我再回去。这时是上午十点半。

107 午后一点。工資委员会的一位委員从我这里离开，他来通知我，該委员会主席昨天根据我的願望往訪韦希特尔，把該委员会同意在加請常务委员会条件之下再行談判的話告訴他。关于应在何种基础上进行談判的問題，建議訂立另一計算方式，即不按每一千大张計算而按每扎<sup>①</sup>計算。韦希特尔对此表示同意，答应同几个业主商討后把結果告訴我。到現在为止还无音信，我认为現在我們只有等候回音，别无他法；一有消息，当立即奉告。

您的意見，要給布罗克好斯和海尔特尔写信，我不能同意，因為他們正是工人以至工人协会最大的敌人，而您将会通过您信中所說的动机而博取寵信，这是最恶劣的。傳聞海尔特尔曾企图促使本地警察管理局解散本地工人协会，因为它支持了部分罢工

<sup>①</sup> 印刷业以二十三张为一扎，作为計算单位。每一千大张是指印后还未装订的大张。——譯者



工人。我也曾听他亲口说过，如果工人和工人协会停止捐款支持印刷工人，这事就会最好地结束了。

最后对于尊函的指責，好像我要单独进行調解似的，我必須加以申辯。我絕沒有这样想过，不管是在工資委员会或者在海尔特尔那里，我都明明以常务委员会代表团身份說話，并且明确地說出名义。当然，班多和希尔施如果为商談我們自己的事情，我欢迎他們前来。”

三天后，五月十六日，我又給宗納曼一封信說道：

“我現在可以把印刷工人事件确实地向您报告了。

如我在信里所陈述的，工資委员会应我的动議与韦希特尔进行談判，并建議以新計算方式为基础。韦希特尔表示同意，并召集从前的业主調解委员会，传达工資委员会的这个建議。他們計算又計算，最后却发现結果相同，因為他們虽然常常只付出二十七到二十八芬尼，但也同样常常付出三十二到三十三芬尼。工資委员会委員向我保证，按照这个計算法，价格与另一算法仍然相同，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业主方面現在所以拒絕調解，是因為他們只願在帮工的条件有所让步的情况下才同意和解。

108

昨晨接到尊函后<sup>①</sup>，立即与工資委员会重行商討，提出法兰克福的工資标准以及您的計算法作为与业主方面調解的基础，并再一次強調指出（我自己认为有此必要），不要頑固地坚持这些要求而使事情趋于极端。当事人表示同意这种見解，并允將建議轉达他的同事而后向我报告。

昨晚接到答复。答复表示拒絕。答复所持的理由是，人們对于为什么希图实现要求，抱有各不相同的期望。莱比錫是印刷业的主要地区，最注重的是达到尽量提高工資，因为这会給其他城市

① 該件墨色过淡，不能辨識。

以巨大影响。您所拟的草案中也包含有許多能使和想使业主让步的規定。

这个答复使我大吃一惊。我原料定这个建議必被接受。今既被拒絕，我就沒有理由在这事上再进一步，除非那一方面这样要求我。

我觉得，正如业主們受了海尔特尔和布罗克好斯的影响，工資委员会中有几个人也控制着所有其他的人。現在最后要看双方誰能够以它的倔强性来取得胜利。

109 帮工方面在期待着现今正开业的书商交易所能对他们的要求发生有利的影响；这个正确到什么程度，将来可見分曉。事实上也还不断由外面寄到大量的信件和汇款，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您可能已經知道，警察方面的人士用惩罚来对付罢工的帮工，这是我絕不贊同的。由此在星期一已有十九人离开这个城市。又有一个人开始上工。人們如果为这个目的而如所猜测的那样施行惩罚，无论如何是一个悲惨的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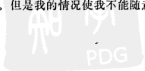
我另一封在五月二十八日給宗納曼的信，在附言中簡單扼要地說：“印刷工人事件一切照旧。”

六月二十日宗納曼又来信說：

“我至感詫异，我本月十七日的信竟被完全忽視”（也是关于印刷工人事件的，同上述原因一样，不能辨識）。“如果我們的机构不能更好地互相連絡，那么我出版传单就很成困难了。”

这事应加說明：常务委员会因与科堡《工人总汇报》发行人經常发生冲突，所以决定出版传单，尽可能每星期出版一次。这些传单的内容应当是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通告，常务委员会的委員首先应该投稿。对于宗納曼的来信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答复說：

“您最近于本月二十日来信指責我冷淡，我不能接受。若是您了解我的情况，就不会作这种指責。但是我的情况使我不能随意



支配我的時間。既然我也有一個獨立的職業，那末為貧窮所迫，我被迫以勞動掙得每天的生計；再加上（工人教育）協會的大部分事務也由我負擔，不得已，除了晚上完全用來處理協會的事情外還要犧牲許多小時。雖然如此，我仍盡量設法應付對我提出的要求，如果我所寫的東西還值得費力的話，我也早就會對於您的第一封信作答復……

尤其是關於工人和工資問題，處於一個形式上風平浪靜的狀態，在過去幾星期的騷動和吵鬧以後，這是在意料中的。

關於印刷工人事件，我於星期二訪問了《通訊》報的主筆海因克（該報於一八六三年創刊）。“海因克願意由七月一日起把該報按期包封寄上，來交換傳單和其他通告……此外，他答應將有關印刷工人事件的重要消息，不論是當地的或是外來的，通知我，屆時我就儘快報告給您。

關於這裡的印刷工人罷工事件，他告訴我說，工資委員會以及印刷工人進修協會理事會的極大部分都還沒有合同，也不會很快就得到。雖然如此，他相信，人們不會接受我們這方面的接濟，因為第一，還有存錢，第二，上工的幫工每星期為沒有工作的人捐助，最後第三，他們隨後遇到其他行業罷工時，同樣要捐助，這只使他們現在已經供應浩繁的錢袋負擔更重而已；人們從最初以來就決定，絕不接受非印刷工人的接濟或僅在非常情形下接受。”<sup>①</sup>

① 古斯達夫·耶克在他的《國際》（萊比錫一九〇四年）一書中曾斷言，德意志印刷工人曾由他們的聯合會主席請求國際總委員會，以使國際，首先是印刷工人聯合會，對萊比錫兄弟們的罷工表示關切。（參閱耶克，《第一國際史》，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21—22頁。——譯者）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第一，在那時還沒有印刷工人的聯合會，所以也沒有聯合會主席；第二，印刷工人拒絕接受政治組織的款項。我所能確定的是，罷工者為取得倫敦印刷工人聯合會的調解，曾請求總委員會，總委員會順從了這種願望，由一個代表團（卡·馬克思、克里默和福克斯）把萊比錫的求助要求轉告倫敦印刷工人。

111 印刷工人深恐被其他行业的罢工牵连进去，当那年春季裁缝和订书工人以及市自来水建设工人举行罢工，制鞋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的时候，他们的恐惧是有理由的。

关于制鞋工人，我于六月二十八日写信给宗纳曼：

“昨日制鞋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在德·萨克塞饭店开大会。因我们有紧急会议，我晚些才到会，所以不能作一个完整的报告。艾拉斯博士则自始至终在场，他将把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报告给您一份，您可以在传单上使用。

根据那个会议的主导精神来判断，工人的非常公允的要求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他们中间的态度暧昧和意见分歧使目的不能达到，虽然他们较任何其他工人更为需要实现这个目的，因为一个好工人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作，每星期应得到二塔勒二十新格罗申到三塔勒。我们局外人不准参加讨论，所以艾拉斯和我后来在私人交际场中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那是没有用的。”

七月一日宗纳曼回信说：

“我接到您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的来信。我给您忠告确实没有像您所可能体会的那种恶意。我深知您如何忙碌，而且您如何难于为我们的事情牺牲更多的时间；我也不要求长信，每次有两行就足够简短地通告一件事了。如果您马上给我写信说，印刷工人不需要我们接济，在那时这样就够了。”

关于方才提到的事，我欣慰的是，那里的人们暂时不缺钱。我只请求您，再告诉他们一遍，常务委员会准备在必要时来支持他们，我也已经在我们的传单上发表了相应的意见。”

112 我们关于印刷工人罢工的通信就此结束。印刷工人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们的领导人多数遭到处分。八月间，印刷工人协会决议将捐款增为四倍，为了把以往的借款一次还清，并给予还在受处分的人以相当的接济。工资委员会因违犯萨克森工商业条例

的罢工条款，被判处十四天监禁。经过上诉，判决被撤消。制鞋工人较为幸运，意外地得到提高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对他们有利的是，师傅们没有组织，而且多为小师傅，不能实行抵抗。

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对莱比锡罢工的态度使我在常务委员会的第八期传单上发表意见说，事实是，正是从那些向人民眉目传情、装做工人之友的人们那里，工人的要求遭到最坚决的抵抗。所以即使在与拉萨尔主义没有关系的工人界中，我们所听到的对于部分进步党人的姿态的评论，绝不是赞美的，那也就无足怪了。这决不能增加对该党的同情。

在这个夏季(七月)，我们召集了工人大会，为了反对德累斯顿和齐滔的工商业公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决定不遵守工商业条例，把新实行的工作簿不交给工人而交给雇主保存，而且他们也可以不经工人同意而把有关工人品行的证据记入工作簿中。我们号召萨克森工人来拥护我们的抗议，结果很好。拉萨尔派在这个场合与我们采取共同的行动。

## 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工人协会第三次联合大会，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三日和五日在斯图加特召开。出席的有六十个协会和一个专区联合会，共计代表六十人。有名望的代表有：海尔曼·格罗伊里希(雷特林根)、埃克哈特教授(曼海姆)、银行家爱德华·普发佛(斯图加特)、尤利乌斯·莫特勒(克里米朝，他在一八六四年已在莱比锡)、史特莱特(科堡)、斯陶丁格尔(纽伦堡)、翁特教授(海得尔堡，他后来成为很有名的生理学家，现任莱比锡大学生理心理学教授)。其中海尔曼·格罗伊里希在斯图加特会议后不久，由雷特林

113

根到苏黎世去，差不多与我同时在那里，而且做了卡尔·比尔克里和約·菲·貝克尔的門徒，成为社会主义者。尤利烏斯·莫特勒在同时也經過了同样的发展。埃克哈特教授担任在曼海姆創刊的《德意志周刊》的編輯。他站在民主党的最左翼。

在当地委员会中，除銀行家普发佛外，还有律师霍尔德（他后来充任符騰堡的内务部部长），霍尔德以当地委员会和本市的名义致賀詞。班多担任主席。議程仍嫌过于繁重。其中“养老基金”一項照宗納曼的意思刪去了；他想先为这个出版一本小册子。我作了有关合作食堂的报告，如当时在瑞士許多德語工人协会为单身会员所設的那种合作食堂。我的被允許印行的报告很不充分，所以我的讲话也是最短的。麦克斯·希尔施作了关于爭取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报告。他在他所建議的議案中倡議，工人协会应傾全力爭取选举权。这个議案引起翁特教授的反对，他以鄂尔敦堡和除曼海姆以外的巴登各协会的名义，提議轉到議程上去，这就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憤怒。后来希尔施把他的議案中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字样改为德意志工人，遂获得一致通过。希尔采尔（紐伦堡）作关于結社权的报告；他提議扫除一切有碍实施这项权利的限制。这个建議一致通过。班多建議取消漫游簿和强迫身份证一案也一致通过了。

114 摩里茨·穆勒（普佛尔茨海姆），一个有点别致但很热心并且对人亲切的珠宝匠，作有关妇女问题的报告，这是他当作特殊爱好来研究的问题。他在他的书面报告中要求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完全平等，設立女工进修学校和成立女工协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討論占了最多的时间。埃克哈特教授明确地解释说，妇女的社会解放正像联合大会为男子所要求的那样，也包括賦与妇女选举权在內。經这一解释，穆勒的議案以极大多数通过。

斯图加特联合大会的決議，整个看来，表明断然向左迈了一

步。在一切內政的实际問題上，那些所謂自助者和拉薩尔派現在站在一个相同的立場上。組織方面也稍微有点改善。每个协会每年繳費二塔勒，这就意味着常务委员会在財政上軟弱无力。所以我在常务委员会的传单上建議，先向协会会员征收每人每年一格罗申的会費，并給与常务委员会主席三百塔勒的薪水，以便使經濟上不能自立的人或許也能担任主席职位；主席也应由联合大会直接选举。最后我建議，因为會議花費很大，嗣后可每二年召开一次(这恰好不是我的高明建議)，这样，专区联合会才能有較好的发展。在热烈辯論后，一格罗申会費案(也是組織委员会所提議的)通过了，其他建議則被否決。會議同样以三十票对二十二票认为协会机关报沒有必要。通过这个決議，就避免了与科堡《工人(总汇)报》出版人的冲突，該报在會議中的信徒相当多。我应当在这里說明，現存的有关历次联合大会的报告非常簡略而且缺点甚多。

选入常务委员会的有：班多、倍倍尔、艾希尔斯多夫尔、麦·希尔施、侯赫伯尔格(艾斯林根)、科尼希(汉璠)、弗·阿·朗格、李波特(格劳紹)、李希特尔(汉堡)、曹尔太格(哥达)、宗納曼、斯陶丁格尔(紐伦堡)。宗納曼仍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但謝辞不就。他的位置由斯陶丁格尔接替，但經驗证明，他不胜任这个职务。斯陶丁格尔这个老年人是一位裁縫师傅，工程师希尔采尔(紐伦堡)以秘书身份来协助他。

115

沒有哪一次联合大会能像斯图加特大会那样清楚地表现出各资产階級党派領袖要在联合大会中获得絕對优势的努力。大家都感觉到，德意志問題已将近解决。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爭論越来越热烈激昂。一边是普魯士，另一边是奥地利和大多数中、小邦，二者之間的敌对日益猛烈。在丹麦人被打敗和撤出现在为普魯士所有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二公国以后，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军队共同占領这两个公国，这就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冲突。德意志人

民渐渐进入高度兴奋状态。

116 这种情绪在大会的宴会上举杯祝福声中也可以觉察到。宴会是在星期六晚上在联合大会的会场，即歌咏厅中举行，正是四十二年后，即一九〇七年八月，第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德意志境内开会的地方。当霍尔德及其党羽以花言巧语为普鲁士的霸权欢欣鼓舞的时候，民主党人，特别是他们的发言人卡尔·麦耶尔（斯图加特），赞成来个激进的解决，话虽没有明说，我们青年人把这看做是拥护德意志共和国。卡尔·麦耶尔是当时符腾堡最受欢迎的民众演说家，天生的声音宏亮，坐在我的斜对面。他站起来用肺部的全部力量和动人的比喻对法兰克福的反动的同盟议会发出怒吼说，这个同盟议会必须让位，德国的民主统一才有可能。在用力演讲时，他把上衣和衬衫的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一双肌肉发达的臂膀，用臂膀的姿势为他的讲话助势。有时他用拳头捶桌子，玻璃杯和盘子都跳起来。他为自由、民主的德意志高呼万岁，自然博得掌声雷动。斯图加特城也大为破费，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们在当时的射击厅散步的时候，它用斯瓦比亚酒和午后点心招待我们。

在争执期间，科堡出版了一个名为《把德意志从最深的耻辱中解放出来》的作品，它公开地宣传德意志共和国，这当然非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革命思想在当时并不可怕。革命年代的回忆通过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演讲和文章复活了。除易北河以东，几乎整个德国都深信革命是可以胜利的。我已讲过，俾斯麦和米凯尔如何容忍这种可能。但米凯尔的朋友馮·本尼格森先生已经在一八五〇年写信给他的母亲，在阐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当时的情势以后接着说：

“只要民族党还没有在普鲁士执政（而在这时刻，领袖们还在犹豫，不能决定应否为下次邦议会给现政府造成一个严厉的、打算推翻它的反对派！），德意志国家的英勇斗争是枉然的。我确定地



担心的只是，为了要使耻辱和忿怒充盈洋溢，我們至少要经历几年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斯坦的完全屈服。但是我們欧洲的王室在这么多废墟上安息，不会只因恶劣的回忆和噩梦而受惊扰。最多再过十二年，就会又来一阵暴风雨和混战，并且在我們青年人中有很多人每天在暗暗起誓，人們不管是立宪派的或者激进派的都是一样，不要在恐怖时刻再被可怜的諾言所迷惑了。要把整个这一伙打发到美洲去，而后設法协商，我們是要設立一个国王还是要設立一个总统。这事加岡和达尔曼<sup>①</sup>的信徒不能再加以阻撓，也沒有兴趣加以緩和……”

十二年后，写这封信的人作为德意志民族联盟的主席，居于德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列，甚至也許是最有影响者。但是馮·本尼格森先生現在所执行的政策正是他曾对加岡和达尔曼所批判的。对俾斯麦的普魯士发动革命的思想，对他來說，已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他在他的晚年对于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如何想法，就表现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的三·一八<sup>②</sup>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激烈爭辯中，这爭辯是我故意在德国国会中引起的，那时馮·本尼格森先生是我的主要敌人。

拉薩尔、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意志行将降临的革命怎样想法，可在他們的书信往来中看到，这些书信已由梅林在斯图加特的迪茨出版社出版。还有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的胜利进军（一八六〇年），使它的首倡者得到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巨大声望，这一胜利进军巩固了对革命群众力量的信心。

甚至南德意志的上流社会也想到了一场为德意志統一而进行革命的可能性，这在霍亨卢恩侯爵的备忘录中昭然可見，在他叙述

① 加岡（一七九九——一八〇年）和达尔曼（一七八五——一八六〇年）都是一八四八年的法蘭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拥护小德意志的宪法。——譯者

② 指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柏林革命。——譯者

德意志的长期分裂难以忍受之后，說道：“由此可以說明，在德意志就是最和平的、最保守的人也要宣布說：我們必須經由革命来达到統一，因为由合法的途徑已不能达到目的。”并且在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巴伐利亚的卡尔亲王写給霍亨卢恩的信中說：“我觉得，似乎有一个更为有利的机会，不經由革命（原文也有着重点）而达成同盟的改革……”等等。

上层人物若这样想，下层人民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斯图加特联合大会对于劳动者結社自由的討論和決議是对普魯士下議院同一討論的答复。舒尔采—德里奇和佛赫尔（后者还是一位所謂国民經济学者，曾于一八六四年在一个莱比錫民众大会上试图认真地证明社会問題是能够最好地解决的，如果每个人都懂得复式簿記和有一只走得准确的钟表来計算時間）提議取消一八四五年的工商业条例中有关禁止劳动者結社的一八一和一八二两条。奇怪的是他們竟沒有建議也取消一八三和一八四两条。一八三条的規定是凡未經警察許可而在工厂工人、伙計、帮工或学徒中成立結社，得予以处罰，对于結社的发起者和为首者得科以五十塔勒以下的罰金或四个星期以下的禁閉，对于會員处以二十塔勒以下的罰金或十四天以下的禁閉。一八四条是对于擅自离开工作或拒絕工作，或悍然不听命令，或經常抗拒的工人得科以二十塔勒以下的罰金或十四天以下的禁閉。在約·巴·馮·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大会上，曾有人加以指責，动議者加以解釋說，一八三条已由普魯士宪法在十五年前取消了，而一八四条则与劳动者結社权无关。这种理解也在我們的队伍中間引起憤怒，越来越坚决的科堡《工人（总汇）报》，也为此向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进行最猛烈的攻击。

保守派的大煽动家樞密參議瓦盖納巧妙地力图利用自由主义

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态度，并且战胜了自由主义者。他提议，拒绝关于自由主义者建议的委员会建议（因为它的理解有疑问），并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不仅废止工商业条例中一切限制工人的结社权的特别规定，而且连带着还为这样的组织开辟道路以至予以实施，这组织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国内取得应有的地位，并能独立地处理和代表自己的利益。这样，就是借着法律来设立强制的职工会。

保守派在那时就尽量阻碍自由主义者的行动。

两个工人党携手同行的另一件事，是科伦的国会议员庆祝会及其发展。科伦进步党党员邀请进步党的普鲁士国会议员，也就是下院的绝对多数的议员，到科伦参加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改革庆祝会，这个盛会的高潮是在句尔采尼希举行的宴会。俾斯麦大人下令禁止举行庆祝会，而科伦市长巴海姆很软弱，竟收回借用句尔采尼希大厅的诺言。这事情激起了巨大的震惊。当国会议员来到科伦，而且只有极小一部分来到那里的时候，俾斯麦大人就叫警察和军队驱散他们的集会。人们于是乘汽船跑到上兰施太因<sup>①</sup>，以为在负德意志使命的国家，即在普鲁士境内所不能做的事情，可以在小邦拿骚的土地上办理。但是在这里，军队也进行干涉，使会议不能举行。对于俾斯麦的这种暴行，到处提起抗议。在柏林、在莱比锡和其他各处，拉萨尔派和工人协会派联合起来对科伦事件作最强硬的抗议，要求结社和集会的完全自由。而科堡《工人（总汇）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样，用讽刺和嘲笑攻击进步党的国会议员，说他们在这次事件上行动毫无勇气。

这事件使宗纳曼和弗·阿·朗格互相通信。朗格正好参加了科伦的庆祝会。宗纳曼埋怨朗格没有寄科伦事件的报告给他，并

<sup>①</sup> 城市名，属于当时的拿骚公国。——译者

且以为社会民主党人在作孤注一擲，但他們将会失败。他把班多关于科伦事件的一封信附寄給他(班多不幸在这紧要关头生了病)，要他看后把信寄給我，再由我寄回給他(宗納曼)。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我已不能记忆。朗格在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回信說：

“关于兰池集会”(科伦的工人集会)“我以为不当多所談論。情緒本身是很好的。我同您一样不願負責在现在这时候自动地給騷动发出口号，而这是作一个有关这个集会及其有趣的結果的报告时所必不可少的……”

120

我对于时代的估計和您完全相同，认为十分严重。此外，我不相信，施韦泽完全孤注一擲。如果这样，这个行动就失败了。工人，尤其是莱茵区的工人，现在絕沒有想到为原则而奋起。我认为，人們想要让《社会民主党人报》受到光荣的致命打击，而后凭借着公开創設的組織，实行秘密公社的教义。”(?!——奧·倍·)“我不会为議員庆祝会的光芒所迷惑。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今天的进步党已經完了，但是我們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注视着并拿住綫索，扩大联系，聚集朋友；但不要发出口号。至于如果时候到来，我們能否同行，将来就見分曉。讓我們目前保持联系……

再說到我們的报(传单)的态度和政治—社会的危机，我再建議一次，社会部分要詳細和有趣，但要保持客观；政治部分却要尖銳，尽可能率直地反对所有的公侯們。对待这些人要不偏袒任何人，要一律予以反对，而且坚持不变，尤其对于那些目前吹嘘自由的更要严厉。”

在附言中朗格写道：“我刚才才知道我的信的开头是些空洞廢話。关于兰池集会，所有自由派报刊的报道全是捕风捉影。那里除了安格尔施太因外并无其他記者。在会后，組織了在城內游行的志願隊伍向議員致敬。在警卫总部門前高呼結社权万岁等等。这

个运动完全脱离了拉萨尔派的掌握，也与自由派的计划背道而驰。人民寻找的是领袖。他们在安格尔施太因和我指点之下做了我们所希望的事……此外，整个事件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人领导。但是人们已看到，如果政府这样继续做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在所引的信中朗格也曾指出，将来在常务委员会中和各协会之间会发生分裂。关于此点，他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给宗纳曼的一封信里说得还更清楚些。其中说道：

“关于我对于工人问题的立场，我起初的计划是，我是否停留在委员会中，要看我的书（《工人问题》）所受的待遇为转移；然而现在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我同多数派处在更尖锐的对立中，保持我的立场也是较为妥当的。才子们定会互相冲突的。”

在一八六五年和一八六六年初，似乎有个时期这些互相争吵的弟兄们会在工人运动中聚在一起。除了上述拉萨尔派和工人协会派实行合作并提出共同要求之外，在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七日美因部的集会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劳艾尔和韦尔凯尔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发言人也出席这次集会，这次会的宣言如下：

工人会议声明，它认为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损害工人阶级的大好事业的利益的，并且由美因部工人教育协会人员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人员所组成的集会宣布，他们准备为一切走向联合的步骤伸出援助的手。那次集会主要发言人是埃克哈特教授，他的发言以《国家资助和自助》为题目。一八六六年一月间在莱比锡所作的类似的团结尝试归于失败；相反地，他们却取得一致，要共同为争取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权而斗争。这个集会的主要发言人是乌特克教授。

此后不久，德累斯頓的另一次民众集会在召开时，两个工人党又都参加，会上继续要求在普选基础上的制宪议会，并为保护和支  
持它而实施全民武装。柏林在班多领导下举行的民众大会提出同

样的要求。

122 一八六五年圣诞节，由于弗里茨舍的号召，在莱比锡召开了一个全德烟草工人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一个全德联合会。次年春季，联合会的机关报《新闻报》出版了，弗里茨舍任编辑。于是德意志第一个有中央组织的工会成立了。领导是一个三人理事会，由弗里茨舍任主席。这时，无论在莱比锡和其他各地，成立了很多地方工会。早在一八六四年夏季，在兹维考已创立一个矿工协会，它的会员遍布兹维考—卢森—司透耳堡煤矿区域。这是德意志第一个现代的矿工组织。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是一个受过处分的矿工，名叫丁台尔，对于他的努力，莫特勒、威·司滔莱和我，嗣后还有李卜克内西，都曾加以热烈的支持。我在萨克森矿工中间曾举行多次赞助这个组织的集会。

七月间在格劳绍一个地方集会上，我建议不顾内阁而建立专区联合会，试行冒联合会被封闭和我们受处分的危险。但这个建议无人附议，于是由我撤回。代替我的建议，集会决定，建立一个联合会来促进并支持工人协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由我任主席。还决定，每一会员每年纳费一格罗申。参加新组织的有二十九个协会，会员四千六百人。对于这个组织官方未加阻挠。

二十年后，当我充当萨克森邦议会議員的时候，因为馮·博伊斯特先生的继任者諾司提茨—瓦尔維茨以无耻的解释认为我們违反了萨克森的結社和集会法，所以我以极尖锐的方式攻击他，我说，与他的统治相对比，馮·博伊斯特先生的统治倒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模范；馮·博伊斯特先生把这話作为对他的辯白赶快記入笔记本中。在一定限度內，他是有这种权利的。后来萨克森十数年之久根据結社和集会法所作的那些詭計和狂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无论馮·諾司提茨—瓦尔維茨先生和他的继任者馮·麦奇先生，都在內閣會議上一再声明，对于社会民主党，必須用与任何共

他政党不同的尺度来衡量。那就是說，官方可以用横行霸道代替法律。他們也誠然尽人类横行霸道之能事。

123

一八六五年八月間，俾斯麦禁止科堡《工人（总汇）报》在普魯士銷售。在那些反抗他的政策并向工人揭发其政策的真实性质因而一同成为他的統治的牺牲者的人們中間，李卜克内西居于第一位。

## 威廉·李卜克内西

李卜克内西同伯恩哈特·貝克尔一样，是在一八六五年七月被驅逐出普魯士的。李卜克内西在外流亡十三年后，于一八六二年夏季返回柏林。一八六〇年的大赦使他能够回来。他应老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拉斯的聘請而来。他同恩格斯一样，在瑞士認識了布拉斯。如前所述，布拉斯于一八六二年在柏林创办了一种大德意志民主派的报纸《北德意志总汇报》。除罗伯特·施維舍尔外，李卜克内西也被邀来担任編輯，而且李卜克内西担任对外政策方面的編輯。关于布拉斯的人品，二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他在最急进的革命家之列。但是，到一八六二年九月底俾斯麦就任首相后，二人立刻发现有点不对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施維舍尔接到首相派人送給布拉斯的一封信，据送信人说，信的内容应立即发表，于是这怀疑被证实了。二人都递了辞职书，离开了編輯部。李卜克内西曾偶然公开地說过，拉薩尔在他脱离《北德意志总汇报》一年后还責备他的辞职。当时李卜克内西已有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叫他們由伦敦来到柏林，現在他为各报写通訊稿来維持生活。当我認識他的时候，他給写稿的报刊中有巴登州夫賴堡的《上萊茵快报》、格拉茨市雷希包尔民主派的《每日邮报》和曼海姆的《德意志

124 周刊》，但从这些报刊大概得到很少薪金。嗣后他还给《法兰克福日报》写了几年稿。他特别在柏林印刷工人和裁缝协会、但也在工人集会和民众集会上作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攻击俾斯麦的政策，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约·巴·冯·施韦泽是这种政策的卫士。

李卜克内西在被逐后，先往汉诺威，施维舍尔在那里获得《通报》的一个编辑职位。但是李卜克内西在那里一无所得而后来来到莱比锡。在这里于八月初由《中德意志人民报》编辑艾拉斯博士把他介绍给我。李卜克内西的活动和被逐，我由报纸上已经知道，他自然使我很感兴趣。当时他已四十岁，但是他具有二十岁人的热情和活力。在寒暄后，我们立即谈起政治，他对进步党，尤其对它的领袖予以猛烈的、毫无顾忌的攻击和刻划，我当时虽对该党不再视为神圣，也为之大吃一惊。但他是个第一流的人物，他的粗率举动并不妨碍我们马上结交。

李卜克内西到我们萨克森来得很凑巧。七月间我们在格劳绍开地方会议，议决派人巡回宣传。但是议决容易，执行困难，因为缺少有做这种活动的社会地位的合适人选。李卜克内西自願被派作演讲旅行。工人教育协会也欢迎他作演讲员，不久，他的演讲就吸引了最多的听众。此外，他还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英文和法文课程。于是他渐渐能够维持当然很清苦的生活了。虽然如此，据我事后得悉，他仍被迫把许多好书送往旧书店。并且因为他的（第一个）妻子患肺病，需要好好疗养，他的景况更为恶劣。李卜克内西的烦恼在外表上看起来不出来，见到他和听他讲话的人，定会认为他处在满意的境况中。

他到下厄尔茨山脉，特别是在穆尔森格伦德的工人村庄里，作  
125 第一次鼓动旅行，因此为他后来作北德意志议会的候选人开辟了道路。因为我也常作鼓动旅行，并且从此以后我们在一切政治间



題上多半是共同處理，我們的名字在公眾中越來越多地連在一起，到後來在公眾面前似乎是兩個不可分離的名字。這樣下去，到七十年代下半期，有一個本黨黨員與我合夥做生意，有時來的業務信竟將姓名伊斯萊勃與倍倍爾寫成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這事每次都引起我們歡笑。

關於李卜克內西，在這些篇章里還要常常提到，不過在這裡不能闡述他的生平經歷。誰對他的生平經歷有興趣，就可以在《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和赫普納的萊比錫叛國案》和庫爾特·艾斯納所著的《威廉·李卜克內西》中得知其詳。兩部書都是前進書店出版。

李卜克內西的真正的戰鬥性格是從不可動搖的樂觀主義產生出來的，沒有這種樂觀主義，就不能達到偉大的目標。不管有怎樣嚴重的打擊，不論這打擊是對個人或者對於黨，只能使他一瞬間沮喪或失常。什麼也嚇不住他，他總能找到出路。對敵人的攻擊他的口號是：以惡棍之道還治惡棍之身。他對於敵人嚴厲無情，但對於朋友和同志却無論何時都是一個謀求和解現存對立的好伙伴。

在私人生活方面，李卜克內西是一個體貼入微的丈夫和家長，對於家屬具有深厚的愛情。他也是一個自然界之友。在一個其他方面平淡無奇的地方，一、兩棵長得很好的樹就能使他狂喜，使他誤認為好地方。他在需要方面簡單節儉。一八六六年春季，我結婚後不久，有一天，我的年輕妻子給他做了一種美味的湯，竟使他非常歡喜，終生念念不忘。一杯好啤酒或葡萄酒和一支好雪茄煙他也愛好，但不願為這些多所破費。如果他穿上一件新衣服（這在他是不常見的），而我沒有立即發現並加以稱贊，那麼，我就可以確定，他等不到幾分鐘，就會促使我來注意並要求我提意見。他是一個有赤子之心的鐵漢。李卜克內西於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逝世，

126

他逝世的那天正是我們初次認識的三十五周年。

在党的工作方面，当李卜克内西假定他的計劃將遭到反对时，他往往喜欢造成既成事实。我起初大吃他的这种特性的苦头，因为我照例必須吞下他所造成的恶果。由于他缺少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他所采取的措施就不得不由别人来完成。但最后我鼓起勇气，摆脱他那绝对性的影响，于是我們有时发生激烈的爭执，但不使外面觉察到，而我們的关系也并未因此受到长久的扰乱。

李卜克内西对于我的影响是人們常在书刊中提到的；比如說，人們认为，我只有在他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一九〇八年慕尼黑的郎根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曾进一步提到，我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在紐伦堡联合大会上，自认是李卜克内西把我变成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种說法，李卜克内西用了整整三年才把扫罗变成保罗。

李卜克内西比我大十四岁，因而当我們認識的时候，他在长时期的政治經驗上已超过我。他是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人，而且学习勤奇；这种科学教育我没有受过。最后，他在英国十二年之久，与馬克思和恩格斯等許多人有密切往来，并因此学到許多东西，这种交游我也沒有。在这种情况下，李卜克内西給我以高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否則，他若不会施行这种影响，那就是他丢臉，或者我没有从与他往来上得到益处，也就是我丢臉。几年前，一个当时的熟人在《萊比錫人民报》上写道，他（一八六五年）曾听到我在熟人中間談到李卜克内西，他还記得我說：“在这个人身上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这或許符合事实。不过，就是沒有他，我也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在我和他認識的时候，我已走上了那条路。在对拉薩尔派的持久斗争中，我必須閱讀拉薩尔的著作，以便得知他們想干什么，因此我本身不久就有个转变。

我終生所奉行的原则是，我一旦認識到我以往对一个問題所

抱的观点毫无根据，我就立即把它放弃，并且毫无顾虑地追随新获得的信念，并且公开地、坚决地拥护它。在当前情况下，自由主义发言人在政治方面和特别对于工人问题的态度，使我易于放弃旧观点并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这个转变并没有费我多大的思想斗争，如果说因此必须牺牲些老的和亲爱的私人关系，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结果。我相信，我无论何时都是把事业放在个人之上，不使我因亲戚或者朋友的关系而有所变更，只要我认清为了我所拥护的事业的利益是必不可免的事情，我就去做。

在当前情况下，我与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地加速了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这个功劳是他的。关于李卜克内西把我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是这样。在那些年，我倾听过他许多非常好的演说和谈话。他谈到英国的职工会制度、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德意志的民众运动、政治时事等。他一谈到马克思和拉萨尔总是用争辩的方式，就我的记忆所及，我没有听到他作过较长的理论分析。至于私人指教，不论是他或是我都没有时间，仅日常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事项就使我们不能作私人的理论商讨。并且按李卜克内西的全部天赋来说，他是个豪爽的政治家，而不是个理论家。伟大的政治是他所喜爱的工作。

更正确地說，我同当时差不多一切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一样，已经越过拉萨尔而走向马克思。我们得到拉萨尔的著作还在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先。我如何受到拉萨尔的影响，还明显地表现在我一八六九年年底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目的》中。一八六九年将终的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间和安静来彻底阅读一八六七年夏末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而这是在监狱里。五年以前，我曾试图研究一八五九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止于尝试而已。工作已经过多，还要进行生活斗争，使我没有必需的空闲在精神上去消化这艰深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和

128

馬克思与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才为党所知。我所得到的和爱讀的第一个馬克思著作，是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我在一八六五年讀到这个文件。一八六六年底我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

## 工人协会中日益高涨的憤慨

不如意的社会情况使工人越来越觉悟，这自然也影响了他們的情緒。大家都要求来个改变。但是因为缺少人所信賴的、清楚而有目的的領導，也沒有能够团結这些力量的强大組織，这种情緒就銷沉下去。一个具有极好核心的运动决不会沒有結果地过去。一切集会都是人滿，誰講話最激烈就是当时的好汉。这种情緒首先充滿了萊比錫工人教育协会。将近十月底，我約曼海姆的埃克哈特教授（当时最出色的演說家之一）于他在萊比錫一个民众集会講話后，也到工人教育协会作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讲述当时实际情况中工人的地位，尤其关于工人的社会要求。关于后者他坚决主张干涉国政。他对于拉薩尔的国家資助思想认为，如果資助是出于一个民主国家，也无可非議。演讲人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沒有遭到任何反对。

129 为要确定一下，在这样演讲以后协会中的情緒如何，我常常以主席身份在演讲后发言，对演讲作短評性的說明，并发表我自己的意見。如果有意見分歧，則分歧結合着我的說明必定表现出来。如果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就会提出問題达到澄清。我使用的这种为听众利益充分利用演讲的方法，为各方面所欢迎。但是其他方法如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也必须使用。因为我們在各协会之間不能得到合法的联系，我們的努力很受阻撓。因为我們缺少一个

机关报，所以更有必要常常在口头上对宗旨和目的交换意见。因此，我們不顾屢次的拒絕，到一八六五年底又決議請求薩克森政府許可設立专区联合会。內閣仍然提出我們不能接受的条件。我們还是在协会理事会上決議，关于促进各工人协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让各协会自行决定，并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茲維考召开邦會議。我們决定了那會議的議事日程，它好像沒有法律上的阻碍。按照議程，在会务报告以后將討論內閣的答复。此外还要討論：請求完全的营业自由和迁徙自由，要求来一个开明的結社法，取消职工身份证和服务证以及一切护照限制。随后討論各协会的建議，并选举理事会。关于爭取普选权，我們想在私人談話中来洽商。

萊比錫警察局认为我們的議程太过份。它传訊我們的秘书格  
尔曼和我，并要求改变議程，否則會議不准举行，并且宣布协会为  
政治性組織，这就使各协会之間的联系成为不可能。萊比錫警察  
局长当时是一个以往的一八四八年民主战士吕得尔博士，但是在  
执行結社和集会法的方式上，就是保守党人也不比他更为严厉。  
現在我們只把討論內閣命令列入議程，但秘密通知各协会，让它们  
好好派代表參加，我們將設法使所有可能的都在會議上来完成。  
出席的計有二十四個协会，三十一个代表。會議在星期日上午开  
始。当維尔道的一位代表建議將依法縮短工作時間一項列入議程  
时，遭到出席的警務长的反对。对于內閣（博伊斯特）的批示我在  
會議上建議作以下声明：

130

“关于內务部指示薩克森工人协会只准在下列条件之下設立  
专区联合会，即联合会不得从事于政治的、社会的或公众的事情，  
但由于这种限制，协会的活动就将化为无有，因此，會議決議，不再  
提設立专区联合会的事，而让各协会随意去完成它的任务。”

这次茲維考事件的后果是，萊比錫警察总局把工人教育协会

置于結社法之下，這就是說，自此以後將按政治性團體對待它。

長久以來，《柏林人民報》的態度在萊比錫工人教育協會中激起很大的不快，這種報擺在閱覽室中，它的態度既不民主，而且還以敵對情緒來反對工人的進一步要求。在協會的全體大會上（一八六六年三月），我受理事會的委託建議停訂《柏林人民報》，而另訂閱科倫的《萊茵報》。建議引起了熱烈的爭論，但終於以一百六十對十七票通過。這個決議導致自由派報刊上對協會和我個人猛烈的攻擊。但人們並不是不正確地把我當作這個建議的發起人。

一八六三年在薩克森實施的營業自由的條件是，誰要獨立經營，他就必須先取得當地公民權。但這是花錢很多的，在各大城市尤其如此。一八六五年冬季，在萊比錫開始一種運動，目的在於取消或酌予減低公民權規費，並徹底改革薩克森的城市法規。自由派領袖當時領導這一運動。我同樣也參加了各有關的集會，並且多次有人向我證實，我作的發言最為精彩。在基本要求達成協議後，成立一個委員會指導全薩克森的鼓動工作，我也在內。但是我們的工作不久即證明為徒勞無益。當一八六六年春季我們準備就緒，能夠開始鼓動的時候，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尖銳對立和解決德意志問題的商討已發展到把任何其他興趣都擠到次要地位。我們為改革薩克森的工商業條例的鼓動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反之，政治性要求現在成為當前急務。

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德累斯頓為此舉行了多次會議，我代表萊比錫前往參加，聯合問題也列入會議議程。我以萊比錫代表身份表示擁護共同行動，而瓦爾特希卻犯了錯誤，他尖銳地攻擊全德工人聯合會成員，並百般加以譴責，致激起一陣暴風雨般的憤怒。瓦爾特希不能忘懷於他以往充任拉薩爾的秘書時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所受的待遇（拉薩爾不容分辯，建議把他趕出協會），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對該協會進行攻擊。雖然如此，在那個集會結束

后，开了一个联席會議，参加的有：莱比錫、德累斯頓、开姆尼茨、格劳紹和哥尔里茨的工人教育协会，德累斯頓、普劳恩峡谷、开姆尼茨和格劳紹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分会，德累斯頓的工长协会和印刷业，共計出席代表二十人。決議为下列各项共同进行鼓动：普遍选举权，民主的結社和集会权，迁徙自由，营业自由，取消各种护照限制，实行学校改革，由国家維持学校，調整工資問題，疾病保险和救济基金問題和联合問題。由出席者組成委员会，福尔斯台林任主席。

在举行集会时，現在所有在德累斯頓的工人組織，包括印刷业 132  
帮工联合会，都参加了。这样行动，好像不再有禁止各协会为政治目的而联合的薩克森結社法。各方面还要求工人組織永久的共同行动。議會問題从現在起成为工人界最热烈的宣传对象。我們要求一个全德意志的制宪議會，并实行全民武装来保护这个議會。全民武装这个要求当时在民主主义者的圈子里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若沒有这种保护，議會可能成为政变的对象。而且早在一八六二年七月，舒尔采—德里奇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射手宴会上就說过：“自由而合乎宪法的局势的持久发展問題，面对着現存的政权，除非有武装人民的国民軍作議會的后盾，是不会解决的。”以往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至于五月七日在德累斯頓召开的、有二千人参加的集会的決議，則有点奇怪。其內容如下：

1. 我們声討任何一个麻醉人民力量而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福利的政策。
2. 我們声明，把德意志領土割让，哪怕只是尺土寸地，就是背叛祖国。
3. 我們要求国王陛下和政府履行其对于祖国和人民的責任，所以应把违背这种責任去麻醉反抗力量的人們，更換为能堅毅地、按照人民意志来办事的人們。
4. 我們要求恢复普遍、平等、直接和用不記名投票的选举权和无限制的被选举权来代

替私利集团的统治，这种统治的贻害国家的結果現在已昭然若揭了。5. 我們要求陛下的政府宣布一个决定：根据一八四八年三月三十日和四月九日的同盟決議案召集議會，并保证按一八四九年二月德意志国民議會所宜示的那种意向的精神来解决德意志宪法問題。6. 我們要求立即恢复德意志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全民武装。

随后选举一个代表团，其中有福尔斯特林、克瑞菲尔和施拉普斯律师，由該团把會議的願望轉达国王。这个代表团当然被拒絕接見。

最后薩克森政府迫于国内輿情和共同所召开的邦議會，也不管好歹地必須表示对于同盟改革問題的态度。馮·博伊斯特先生一向拥护那荒唐的奥地利改革計劃，并且也热烈为三位一体思想作辯护，現在陷入窘境。邦議會下院的代表团質問政府現在对于奥地利改革計劃持什么态度，他声明，政府无意再提代表方案；政府准备致力于同盟改革，和根据一八四九年选举法来选举議會。对于普魯士的改革草案，他作了种种模糊的保留。下院代表团提議与上院代表团联合向政府作以下建議：

“政府应用全副力量在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安排德意志的議會选举，并且尽可能遵照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帝国选举法，在全德境内，而且在本(六)月内实现这个选举，并在尽可能短期内召开議會。”

球已在轉动，但不是滾向人們所希望的方向。

## 一八六六年的灾禍

为判断我和我的朋友对于一八六六年事件的态度，有必要先把引起战禍的过程概括地叙述一下。这些过程的結果是普魯士和



奥地利之間爭奪德意志霸權的長期外交鬥爭，在戰場上得到解決。因此，德意志問題得到了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希望或追求過的一種解決。此後特別是那些充當資本主義政治代表的絕大部分自由主義者，因為看到新秩序基本上促進他們的物質利益，遂同新秩序妥協，並且也與他們曾經苦鬥過的當權者媾和，這種情況沒有改變我們對於那些過程的理解。

由於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丹麥國王弗里德里希七世的逝世，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又出現，因為這個國王一死，鄂爾敦堡血統就斷絕了。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人不承認新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是有繼承權的公爵，而決定擁護弗里德里希·馮·奧古斯騰堡親王，於是他以公爵弗里德里希八世的稱號宣告即位。這樣一來，就表示兩個公國隸屬於德意志，人們對這事非常滿意。丹麥反對這個解決辦法。因此，同盟議會必須決定同盟對丹麥來個強制執行，並交由薩克森和漢諾威辦理。但是這與俾斯麥計劃不合。他使他的王室法律家證明奧古斯騰堡沒有繼承權，這個決定激起輿論界極力地反對俾斯麥的政策。人們認為俾斯麥，這個普魯士的破壞憲法的人，不是按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居民的意思來解決問題的，人們又還記得，一八五一年對丹麥的第一次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戰爭的可恥結局，主要應由普魯士負其咎。

民族聯盟的理事會因此博得熱烈贊成，它早在一八六三年秋末即已號召人民自助，宣言由魯道夫·馮·本尼格森以主席身份簽署。在那個宣言里說道：“民族聯盟要求所有的教會、團體、協會、合作社，要求所有願意為偉大事業而同它聯合的愛國人士，立刻籌集款項——並且準備好為解放我們的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兄弟們所必需的人員、武器和一切資料。”

這個宣言無疑是違犯各邦一系列的法令的，但是沒有一個檢察官來過問。民意是同情這一行動的。

此后不久，民族联盟常务委员会为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发出了一个宣言，其中說道：

“努力吧！把我們武装起来，以便行动的时刻一到，德意志的青年就能拿起武器作好战斗准备……他們可以利用也許只是极短的空隙来操练武器和战术演习。”

可見当时自由派发言人如何认为人民武装是可能在短时期内实行的。时至今日，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发表类似的宣言，就会遭殃了。这是从那时候以来的“进步”！——

这里我想夹叙一下，在六十年代初期，除大量創設工人协会外，同时也大量創設体育协会和射击协会，这些协会在那时的民族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俾斯麦对于这种活动很不满意。那些全国性的社团所轮流举办的大庆祝会，就是群众性集会，主要討論德意志問題。一八六三年八月在萊比錫举行全德体育运动大会，馮·博伊斯特先生竟也向它致敬。但足以表示特征的是，当他在运动場上作爱国发言的时候，萊比錫警察竟禁止在公众場所出售一八四九年的德国宪法文件。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因为我在弗里茨舍脱离后领导我們的歌咏队，同萊比錫其他歌咏团体在集会大厅中表演歌唱。同年十月，又举行萊比錫战役五十周年紀念会。这个紀念会具有比运动会更大得多的規模。这个会也同样被利用来举行巨大的政治示威运动。我还是作为我們歌咏队的一分子参加这个会的。

136 自此以后，在全德意志都为贊助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独立而举行集会。在萊比錫一个有一切派别的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上決議，“大会认为德意志工人的責任是，为祖国的荣誉、权利和自由，在它們受到威胁的一切情况下，献出力量，听候命令。”其他城市也作了同样意义的决定。一八六三年底，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議員會議，有議員五百人参加，声明反对任何一个德意志邦

吞并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決議是針對普魯士和俾斯麥的，當時即令內心贊同與普魯士合併的自由派，也不敢表示贊成俾斯麥的政策。

俾斯麥對於給他的政策造成的障礙自然是极为震怒。他要求法蘭克福的參議會解散議員會議的三十六人委員會，委員會的主席是法蘭克福市參議員西格蒙特·穆勒。此外，他还要求參議會禁止法蘭克福青年的防禦演習。他這兩個建議都被拒絕。但是他不會忘記這個法蘭克福。一八六六年，這個“民主主義者巢穴”受到報復，他起初壓迫它，繼而吞并它。最後，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還是照俾斯麥的計劃解決了。他竟徹底欺騙了奧地利政治領袖雷希貝克伯爵，並博得他對於下一步計劃的擁護。普魯士和奧地利現在代替當時已進入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同盟軍隊來對丹麥作戰，丹麥不久就被它們打敗了，被迫在媾和時把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和勞恩堡割讓給普魯士和奧地利。最後，奧地利又同普魯士做了一筆生意，把它在勞恩堡中應得部分以二百五十萬塔勒賣給普魯士。這次戰爭是俾斯麥違反眾議院的意志進行的，眾議院曾以二百七十五票對八十票把所要求的戰時公債否決了。當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經過長期交涉後，在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四日公布加斯泰因條約，根據條約，由普魯士管轄什列斯維希而奧地利管轄霍尔斯坦，人們可以想像，這樣治理，鼓舞不了普魯士的情緒，而在德意志其他部分，情緒還更為惡化了。這是俾斯麥的第二個傑作。這樣一來，俾斯麥把奧地利和同盟中間的楔子錘得越來越深。現在對世界表現的是這麼一幕喜劇，普魯士方面由曼托伊費爾在什列斯維希肆無忌憚地鎮壓一切贊助奧古斯騰堡家族的示威運動，而且完全施行十分嚴酷的統治。相反地，奧地利方面由馮·加布侖茨將軍在霍尔斯坦一切聽其自然。加布侖茨怎樣理解他的任務，表現在他的談話中：“我要注意到現行的地方法，以便

137

让霍尔斯坦人在我或许离开此地后不說我的治理违法。我不願像土耳其的巴沙那样治理这个地方。”这是給馮·曼托伊費尔先生和他的主人一个道义性的打击。

显而易见，在这两个公国中的新秩序只能是暂时性质的。这并不是解决。最后，普魯士和奥地利中間必然发生爭执，在剔除了<sup>138</sup>一切其他因素之后，照俾斯麦的看法，只有战争一途。他現在有步驟地致力于战争。一方面他設法用拖延談判的办法（像他后来所称呼的），以可能把德意志領土割让給法国的諾言来取得拿破侖的中立（萊茵普法尔茨和普魯士的薩尔河地区是談判中的問題所在），另一方面他与意大利締結协定，約定一旦遇有机会，普魯士从北方开始攻击奥地利，意大利就从南方进攻。俾斯麦怎样設法贯彻他的“民族”政策，表现在他与意大利政治家的协商，这种协商，后来意大利首相拉·馬尔莫拉在他的《进一步的說明》一书中公之于世。俾斯麦在三月間对柏林的意大利軍事全权特使这样說，国王已放弃了过分胆怯的正統派的犹豫态度。他曾对于与借篋位和吞并而龐大起来的意大利联合有所顧虑，他又因正統的顧虑不願对奥地利作战。俾斯麦又說，在几个月內他将要把用議會裝飾起来的德意志改革問題提出来，他将用这个建議引起使奥地利与普魯士相敌对的紛爭，这就将引起两国之間的战争。

这个計劃迅速見于实行。

六月三日，意大利駐柏林公使哥弗尼向他的政府报告說，俾斯麦曾对他說：“我可以說是普魯士人而不是德意志人，所以如果把萊茵河岸和摩塞尔河之間的全部土地；普法尔茨、鄂尔敦堡、一部分普魯士領土割让給法国，我将毫不迟疑地签字……使他忧虑的是国王，国王有宗教的，簡直就是迷信的顧虑，不敢負起欧洲战争的责任。”

俾斯麦和意大利进行阴谋，要在匈牙利和克罗提亚煽起革命

起事来削弱奥地利，并且使該两地的部队背叛奥地利军，对于这些我不再逐一細述。这些过程表明了，謀反和叛国恰好足以使俾斯麦达到目的，只是謀反和叛国来自下面才算犯罪。普魯士和意大利商妥，所有革命起事的費用应由双方共同負担。不消說，奥地利現在认清了它的处境并筹划对策。将近三月底时，开始了热烈的外交活动。双方互相責备，并且——备战。四月九日，普魯士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提出它的同盟改革建議。它建議，由同盟會議決議在一个再行規定的日子召开一个由全民族以直接选举和普遍投票权所产生的會議，在會議召开以前，各国政府应把关于同盟宪法改革的提案互相确定一下。

显而易见，奥地利根据它迄今对于德意志问题的态度，会不贊成这个看来含有陷阱的建議。但其他各邦政府和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俾斯麦的建議也都十分怀疑。人們說：“俾斯麦违反宪法的明文規定来治理普魯士，臭名远揚的新聞条例，违反議會意志去进行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战争，刚才发生的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第八四条的决定（关于議員的言論自由）和其他許許多多，都是他一心一意干的，他怎末会表示贊成以普遍、直接选举权为基础的德意志議會，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彻底的改革家呢？”普魯士的改革建議遭到了反对，所以《十字报》在四月間声明說，現在只有在同盟改組或者革命二者之中择其一。实际上俾斯麦对于他的全德議会的建議并无誠意，这在他后来給同盟會議的議會建議中表現出来了。但是他也从沒有想到把西南德意志各邦包括在內，这見于他后来建立北德意志同盟的时候。

这个事实可由霍亨卢恩侯爵的傳記来充分证明。当时俾斯麦把南德意志的大多数都看作是會扰乱他的計劃的异族成分。后来关稅議会的选举和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战争在南德意志所受的欢迎，才消除了他的疑惧。

俾斯麦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和德意志問題的措施，使自由派陷于分裂；他們分成两个陣营。一个陣营同情他的措施，另一个則对于他的普魯士內部冲突<sup>①</sup>不原諒并加以反对。一八六五年十月初，特維斯頓写信給三十六人委员会的领导說：“我們”（那么他是以許多人的名义說話）“宁願作任何选择，也不要普魯士失敗。”这就是說：普魯士在爭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即使是借外国援助、用德意志領土作代价而取得胜利，我們还是站在普魯士方面。这是俾斯麦式的語言：“我与其說是德意志人，不如說是普魯士人！”蒙森认为，人們所以不支持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因为自由問題上的分歧。还有齐格勒尔，他是一八四八年的抗稅者，曾被控叛逆而判处監禁，并且在任勃兰登堡市长时曾受处分，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对他的布勒斯劳选民宣称：“普魯士民主主义的心臟就在国旗飄揚的地方。”齐格勒尔是个非凡的先生。数月以前他在普魯士众議院里引用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临时政府人員馬拉斯特的話对他同党的人喝道：你們的乖僻已經从下腹升到腦子，所以你們不再会思想了。

民族联盟试图通过定于一八六五年十月底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全体大会，也来帮助俾斯麦的政策。它当然得不到感謝。俾斯麦对这个意图十分憤慨，乃唆使奥地利政府同他共同通知法兰克福的市政府，要求禁止召开大会，这一措施只有神經失去主宰的人才去执行。市政府也拒絕了这个要求，大会照开。決議說：民族联盟追认它以前的決議，根据決議，它把中央集权和一个具有一八四九年的国家宪法的議會作为努力目标，并且要把中央政权授与普魯士。它为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要求有限制的自决权，在德意志中央政权还不存在的时候，它应把中央政权的必要属

<sup>①</sup> 指一八六二——一八六六年間普魯士的議會与政府之間的冲突。——譯者

性归之于普魯士。此外还应召集各公国的邦代表會議。經過激烈辯論，这些建議以大多数通过。無論如何，这些決議是对普魯士很大的迁就。民族聯盟目前还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办法。

到后来，当奥地利和普魯士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自由派竭力使中、小各邦守中立，因為他們說，如果战争发生，它們大多数将会站在奥地利方面。

自由派在薩克森竟調轉枪头，要使薩克森政府負战争万一爆发的責任；他們要求縮減軍备和联合普魯士。萊比錫的市政当局以五月五日的決議附和这个意見。有一个由五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則反对这个決議，大会是在五月八日由烏特克教授和他的亲密政友，在拉薩尔派弗里茨舍等支持下所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在我的推动下也公开参加。拉薩尔派的斯坦諾尔任主席。烏特克第一个发言。他反对市參議會和市議員的行动，并決議要求政府扩充防御措施和实行全民武装来保卫国土，此外，政府应立即保证对同盟各国的援助和坚决反对普魯士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以及在德意志其余各邦的特殊地位。

141

这个議案我們觉得过于軟弱。于是由我发言并申述下列議案：

1. 現今德意志的危急局势是由普魯士政府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的态度和措施所激起的，同时也是民族聯盟和哥达派拥护普魯士霸权的政策的当然結果。
2. 直接或間接支持这种非德意志的政策，我們都看做是損害德意志人民的利益。
3. 这种利益，只有用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以不記名投票产生出来的，由人民自卫軍支持的議會能加以保护。
4. 我們期望，德意志人民只选举那些否认一切世襲中央政权的人来充当代表。
5. 我們期望，如果德意志发生自相屠杀的战争，这个战争的作用只能是把德意志領土偷偷送給外国，那么，德意志人民将一心一德地起来，拿起武

器来保卫自己的财产和荣誉。

市議會議長約瑟夫博士企图为市參議會和市議員作辯护，但李卜克內西和弗里茨舍严厉地答复了他。烏特克的提案只有少数反对，我的提案則一致通过。

关于那个大会，萊比錫自由派報紙作了最虛偽的报道，竟使基色克与德佛林特印刷所工人异常憤怒，把有关的这一期《中德意志人民報》断然加以焚毀。萊比錫的榜样有多处仿效。其中有美因部联合会的工人會議（五月十三日由路易·毕希納教授任主席所召开）作了同样意义的表示。

142

在这种形势下，議員會議的三十六人委员会认为必須援助普魯士。它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一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議員會議。法兰克福民主党决定在同日举行一个反示威，从薩克森邀請烏特克和我参加。参加議員會議的議員約二百五十人，由三十六人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馮·本尼格森先生担任主席。出席的有布隆赤里，他因为四十年代在瑞士反对魏特林而声名狼藉。此外，出席的还有老樞密參議韦尔凯尔，他虽然热心于普魯士霸权，却非常恼恨俾斯麦的政策，像当时報紙所报道，他提出稀奇的悬赏征求答案的問題：如何能不經過革命手段而把一个有害的政府废除？即著名的問題：“怎样去洗皮肤而能不把它弄湿？”

在會議的旁听席中有一八四八年战士阿曼德·歌格、奥古斯特·拉頓道夫和古斯达夫·史特魯維。史特魯維身体精瘦細长，嗓音尖銳，鼻子特別紅，虽然他是个反对喝酒的人。我所想像的以往巴登革命領袖不是这样，但不久就发现，别人对于我也像我对于史特魯維那样，他們想像中的我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斐尔克博士（奥格斯堡，他因曾在关税議會上欢呼道：“春天要到德意志了”，所以得了个綽号：春天的百灵鳥）作报告。他为三十六人委员会多数派的下列議案申述理由說：



軍事勝利又把我們的北疆還給我們了。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里，这样的胜利都足以提高民族观念。但在德意志由于蔑視新收回的二邦的權利，由于普魯士政府力图用暴力吞并和由于两个强大政权間不幸的猜忌，胜利却引起了规模远远超过原先的爭執对象的紛爭。

我們譴責即將到來的戰爭，說它是一個為王朝的目的服務的內戰。它與文明民族毫不相稱，危害我們在五十年和平歲月中辛苦得來的一切資產而飽外國的貪欲。那些應當對這個傷天害理的戰爭負責的或是為了特殊利益而把危險擴大的君主和大臣們，對民族犯了重大的罪過。 143

誰在同外國政權談判時犧牲了德意志的領土，誰就將遭到國民的咒罵和叛國的懲處。

即使人民在最後一刻還一致表示阻止戰爭的願望沒有成效，那麼至少可以期望，戰爭沒有把整個德意志分為兩大陣營，而是局限於最狹小的範圍。

我們認為這裡加速恢復和平和阻止外國干涉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由不參戰的各邦用兵力保護邊境，萬一戰爭是全歐性質的，就用生力軍迎擊外來的敵人。

各邦的責任是，只要它們的地位受到重視，沒有必要就不投入兩個強大政權的戰爭中。特別是西南德意志諸邦，要從事於保存實力，以便在這種情況下負責保護德意志領土的完整。

各邦議會的事情是，如果它們要決定為軍事目的的征發，就要求它們的政府保證照上述方針和為祖國的真正利益來使用這種征發。只有這樣，才可以挽救危局，才可以由現在的混亂局面中湧出一個使全德意志恢復舊觀的新紀元。

正如只有德意志議會是能決定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的德意志利益的機關，所以也只有通過自由選舉的德意志人民代表大會

来解决德意志宪法问题，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不幸情况的再度出现。因此，所有邦议会和全国必须要求从速召开按照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日的国家选举法所选出的议会。

这个提案的重点在第五、第六和第七节，人们根据这几条要使中、小各邦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中负有守中立的义务。普鲁士议员尤利乌斯·弗雷塞用一个很有力的发言驳斥了该委员会的提案和代该提案辩护的发言人，这个发言屡次被会场中少数派和旁听席上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关于指望中、小各邦所充当的角色，他说：

“若是这两国现在扭打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两个牡鹿为一个牝鹿争斗起来，牝鹿赤手空拳，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那样，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就会这样来互相争斗，而第三个德意志就会成为驯良温柔的牝鹿，它等着斗争的结果把它交给哪一个胜利者……”他结束时说：“普鲁士只有为德国服务而后才成为自由的；但是如果您使德意志化为大普鲁士，那么愿上帝保佑那些看到普鲁士和德意志所忍受的统治的人们。”

这些话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但是除悲剧以外，喜剧也得到应得的权利。在斐尔克发言中间，许多爆竹声震全场，大家都惊愕地跳起来看天花板，惟恐它塌下来。斐尔克本人大约认为这是要暗杀他，他用力一跃由讲坛跳到后面墙壁旁，惹得楼上的人一阵拍手大叫。原来是法兰克福和欧芬巴赫的拉萨儿分子在奥伯温德领导下大放爆竹，想要用这种方式向议会会议投送名帖。惊惶之后，全场大笑。

委员会的决议案（反对穆勒—巴沙万特的建议）当然以大多数通过。

当天下午，在马戏场举行由民主党方面召开的约有三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我同许多讲演人都讲了话。我所讲的大致如下：

“在今天上午，会堂中许多人以人民代表身份说明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之后，我认为，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員；我也应当说出我的意见，尤其是当我来自一个首先受到目前危机威胁的地方。今天在会堂中有许多人拥护中、小各邦中立，大会最后通过三十六人委员会多数派的建議。我不想重述那里所列举的理由。但有一点必須着重指出，中、小各邦尤其是薩克森的中立，是不可能的。每个稍微研究过德意志地图的人必須承认，要把一个像普魯士和奥地利之間所进行的那样規模的战争，局限在西里西亞—摩拉維亞的狹窄边境上，是完全难以相信的。一七五六年的历史也可以加以证明。当七年战争爆发时，普魯士国王得到有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的消息以后，突然侵入薩克森，用八万人冲击这个邦，俘虏了薩克森军队，继而搶去所有的全部軍事物資，并且在他把薩克森兵編入他自己军队以后，仍須由該邦負担整个军队的給养。后来普魯士对薩克森的心思在維也納會議上表現出来了，它想吞并薩克森，当时被奥地利和其余列强所阻止。

会堂上一位发言人——舒尔采—德里奇說，早在維也納會議时奥地利就阻撓了德意志的統一。这是完全对的。但他必須补充說一句，那时普魯士也不想到德意志的統一，它所图謀的只是尽量扩张自己的国土。人民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走上戰場，牺牲了无数的财产和生命，而普魯士却不給予在解放战争中答应給人民的宪法。宪法是一八四八年普魯士人民用威胁态度获得的。人民当时强迫政府来頒布宪法。总之，人們究竟能不能給我們指出，普魯士为德意志所立的特殊功勋在哪里？也許在二十和三十年代追捕在野党領袖和压制每次自由发表意見上，它都同奥地利那么一致地行动嗎？誰是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血腥鎮压那光荣起义的禍首？普魯士！是誰在巴登槍杀解放战士数百人之多，还使人把别的解放战士，譬如阿道夫·馮·特律赤勒和麦克斯·多尔突，按戒

严法执行枪决？普魯士！还有，是誰在德累斯頓鎮壓五月起义，屠杀拥护国家宪法的战士，并援助已經絕望的薩克森政府再掌政权？普魯士！無論是已往曼托伊費爾大人的普魯士，或者是現在俾斯麥大人的普魯士，以其蔑視法权和宪法，是能使德意志人民信賴的国家嗎？必定不是！現在想把這個普魯士放在德意志的領導地位，这个国家，除开一八〇七到一八一〇年被粉碎被打倒时期以外，按它的全部历史，从来不是、以后也永不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誰若是抱另外的意見，誰就是不認識普魯士。

关于現今的危机，无人否认它是普魯士所引起的，并且只有德意志其余各邦一致起来，表示决不作內战的一个靜默旁观者，才能防止危机，并使普魯士退守它的本分。現在已經表明，其余各邦的坚决态度已使普魯士惊慌失措，使它迄今一直不敢宣战。但如果战事还是爆发了，那么，全体人民就應該起来，向普魯士这个破坏和平者进攻。”

从那时到現今已过了三十四年，但是我在那个发言里所讲的有关自由的普魯士的話，越来越真实了。自由的普魯士直到今天还是个神話。

在結束辯論后，下列我們所建議的決議經全体一致通过：

1. 武装反抗普魯士的破坏和平的政策，中立是懦弱或者是叛逆。
2. 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应在現行法律的基础上获得它的独立。
3. 坚决拒絕普魯士的議會建議，相反地，应由一个制宪的、具有各种必要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来决定全德意志的宪法。
4. 施行公民基本权利，并按法律实行全民武装。
5. 人民在任何城市和乡間都可結成政治性团体。

这个建議通过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綱領，并要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代表會議，以便对于綱領作最后的商討。委员会根据豪斯曼(斯图加特，国會議員康拉德·豪斯曼的父亲)的建議选举

了，倍倍尔、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歌格(歌芬堡)、卡·格律恩(海得尔堡)、科尔布(斯派尔)、卡·麦耶尔(斯图加特)、莫尔根施太因博士(佛尔特)、馮·涅尔加特(基尔)、奥·勒克尔和古斯塔夫·史特鲁維(法兰克福)、特拉伯特(哈瑙)、克索麦·馮·都斯(巴伐利亚)。这十二个人只有我还活着，誠然我也是听众的本杰明<sup>①</sup>。

委员会拟訂的綱領如下：

甲、1. 德意志各邦的宪法和行政以民主为基础。2. 各邦在自决的基础上作联邦的結合。3. 建立一个超越各邦政府之上的同盟政权和人民代表机构。不要普魯士，也不要奥地利作盟主。

乙、1. 我們要求維持德意志的和平。战争的危險是由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事件而起；这个危險只有根据法律和民意把这两个公国立即組成独立的国家，才能消灭。霍尔斯坦在同盟中的投票必須立刻生效，它的防御力量也必須提高。关于公国的任何規定不能违背居民的意志；不得分割什列斯維希。2. 全德意志对普魯士的战争政策表示反抗。中立是懦弱或者是叛逆。3. 不准把德意志的尺土寸地割让給外国。只有同盟各国在战争中不进行王朝政策而进行民族政策，既依靠整个国防力量，也依靠人民的議會合作来支持它們的同盟，而后我們才能避免德意志損失領土的危險和外国干涉德意志事务的耻辱，而后反抗才能有效，而后才能消除奥地利方面胜利的危險。合法实施国民軍制度，是其中最迫切的要求。4. 拒絕普魯士的議會建議，只有一个从人民中产生的、完全自由选出来的、具有决定票并具备必要的权力的国民會議才能够对祖國的宪法作最后决定。

143

布隆赤里情不自禁地在六月七日向巴登下院告发說，法兰克福有一个福利委员会，史特鲁維和他的同党都属于这个委员会，并

<sup>①</sup> 《旧約》中說：本杰明是雅可布的儿子，生后母死，父亲很寵愛他，常用作最受寵愛的幼子的代称。——譯者

在海得尔堡有一个分会（卡尔·格律恩）。这个委员会追求战争，也曾在法兰克福燃放爆竹。为此，勒克尔代表十二人委员会，用一个公告来答复他：布隆赤里先生的这个说法是谎话，而且因为是在议院会议上借言论自由为掩护提出的，所以是一个卑怯的谎话。一八六八年，我在关税议会上认识了布隆赤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肥胖的传教师，满脸奸诈。

至于要为核定纲领而召集的代表会议，却不得不中止，因为中间战争爆发。委员会现在发出以下宣言：

### 告德意志人民

德意志自相残杀的战火燃烧起来了。德意志倒退回野蛮的强权时代。这个对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应由普鲁士那个政党负其咎，那个党肆无忌惮，既侵犯普鲁士的人民权利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国家权利，又想强制全德意志来完成它的侵犯。当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国家前途，终于根据德意志公理和荣誉而和平解决的时候，这个党却趋于极端，它破坏德意志各族人民的永久同盟，并且以个体的强权命令代替公众的正义和全体的意志。它像侵入敌国似的侵入汉诺威、黑森选侯国、萨克森等德意志各邦，一切德意志国家，凡不顺从它的，它就以同样暴力相威胁。在普鲁士本邦内，这个党却挑拨人民对德意志怀恨，向人民谈论所捏造的危

149

险，说普鲁士有被德意志侮辱、轻视、分割之势。被轻视的危险还没有像它藏在内部的危险那样威胁着普鲁士。这个好战党的崩溃将是普鲁士自身最辉煌的胜利。被分割的危险正是由这个党给整个德意志带来的。在南方，由于它同意大利的同盟，危害了德意志同盟。在西方，它引起了每次德意志不统一时必来威胁的旧危险。

柏林的强权政治唤起德意志各族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它自己，他们不对普鲁士人民作战，也不为哈布斯堡皇室政策而战；国

民既不願為奧地利，也不願為普魯士服務。他們要自由，要在自己家里做主人。違反他們的意志而使他們陷入現今的災難，他們不應當，也不願意懶洋洋地等待災難的後果。正如他們以正確的愛國心拒絕了使他們在同室操戈的戰爭中採取中立的要求，他們現在的責任就是用全付的力量和一致的決心，通過全民武裝和全民議會來保證在決定自己的命運上得到協作。

德意志人民要根據這兩個要求立刻和到處活動起來。必須最快地組織在公開民眾集會中進行普遍鼓動。只有德意志人民還能拯救德意志祖國。

法蘭克福，一八六六年七月一日

五月二十日的法蘭克福民眾大會委員會  
科爾布 奧·勒克爾

這個宣言用意雖好，但是來得太晚了。而且缺少唯一可能給它重量的東西，即一個大的、嚴密的組織。

在上述的法蘭克福事件的次日，聖靈降臨節的第二天，西格蒙特·穆勒邀請我同幾位先生赴宴會。飯後，我們走到大開著的窗子前邊，欣賞美麗的五月風光。我們不約而同地大笑起來。原來由穆勒的住宅可以看到美因河和古老的美因橋，橋上有成群的穿白制服的奧地利士兵往來散步，幾乎每人臂上都挽著一個少女。這個景象引得我們大笑不止。我們的主人把這事看得嚴重些；用他那法蘭克福的南德高地德語說道：“我的先生們！您們笑得好，少女們都要生小孩，這將來又須由本市來收養！”我們的回答是第二陣大笑。此後不久，到六月十日，屬於法蘭克福的同盟軍戒嚴的普魯士人“吹吹打打地”離市而去，到十一日，奧地利人也同樣跟著走了。奧地利軍一去不復返。聖靈降臨節在美因橋上歡樂散步的那些小伙子們，可能有很多人後來用他們的鮮血為戰場施肥了。

六月十日，工人協會常務委員會也在曼海姆開會，以便對當前

的政治性冲突表示态度。除麦·希尔施外，委员会全体出席，还特别邀请史特莱特(科堡)参加。

在德意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个普鲁士的委员认为说普鲁士人民对于吞并表同情是不正确的，但是结果证实，他根本错误了。委员会的大多数反对中部各邦守中立。这一方面强调指出，普鲁士称霸可以促进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驳斥了认为普鲁士盟主对此是必需的说法。最后一致决议，参加已成立的人民党和接受法兰克福委员会所拟订的纲领。并提议将下列的和解建议加入人民党的纲领中：每个富于人民性的政府必须在不违背个体自由和全体人民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设法促使各阶级的对立逐渐消除。工人阶级物质和文化方面的提高是一切阶级的共同利益，是资产阶级自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柱。

151 因为政治混乱已造成大批失业的结果，决定向企业家要求，在工作停滞期间可相应缩短工作时间而不解雇工人；此外，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也应把已开始的建筑工程继续进行，并将已经列入计划的也予施工。会计报告令人不愉快，史特莱特关于《工人(总汇)报》的处境的报告，也同样令人不愉快。这家报纸在普鲁士被禁止，许多协会中政见分歧，书业公会对报纸加以仇视和阻碍，因而报纸的销路大大减少，委员会中个别委员对于史特莱特和他的报纸所持的消极抵抗态度，阻碍了由我们这方面予以相应的帮助。史特莱特不得已，乃在八月八日把报纸停刊。

我重新提出的改组建议又被否决，但是议决给主席每年二百塔勒的工作报酬。也曾商榷下次联合大会的地点，预计在开姆尼茨或在格拉。但世事的推移使一八六六年的联合大会不得不作罢。随后，因举行民众集会来处理大家都感兴趣的政事件，辩论中断了数小时。

自此以后，事件纷至沓来，向灾难赶去。五月九日，俾斯麦把



邦議會解散，以免它的反对阻碍了他的政治措施。他完全同一八六四年一样，不經議會同意就进行战争，并发行紙币来取得作战款項。与普魯士相反，中部各邦召开邦議會。六月一日，奥地利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事件移交同盟會議。它发现自己在这个事件中被普魯士牽着走是犯了錯誤，但已嫌太晚。两天后，六月三日，普魯士声明，由于奥地利的行动，加斯泰因协定失效。六月十一日，普魯士用武力驅散在伊采合召开的霍尔斯坦各界大会。因此，在六月十二日，奥地利军队撤出霍尔斯坦。同日，奥地利由柏林召回公使，并送护照給維也納的普魯士公使。六月十四日，同盟會議決定反对普魯士，普魯士公使把一个新同盟的宪章草案交給同盟會議，这个草案第一章說：

同盟的范围包括原来各邦，但奥地利帝国和尼德兰王国的領土(卢森堡和灵堡)除外。

所以这是小德意志的同盟。战争于是宣布了。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战争进行得对普魯士非常有利。在几星期內，奥地利在波希米亚的军队全被赶出陣地，普魯士兵临維也納城下。中部各邦的军队，除了在波希米亚作战的薩克森军队，和在頑强抵抗后被普魯士打败的汉諾威军队而外，都扮演了可怜的角色。它們的抵抗沒有經過实际战斗就被摧毁。战争在意大利发展得稍有不同。俾斯麦起初怀疑意大利会对奥地利認真作战。他在六月十三日給普魯士公使馮·烏塞多姆的公文中，要他堅決要求意大利政府同匈牙利委员会和睦相处。如果拉·馬尔莫拉拒絕，就会引起普魯士的猜疑，认为意大利无意对奥地利認真作战。烏塞多姆要轉告，普魯士将于下星期开始敌对行动。但是意大利在四角要塞的无結果的战斗惹起猜忌。六月十七日，烏塞多姆送給拉·馬尔莫拉一件长篇公文，他說他代表他的政府建議进行战争。战争要进行到消灭敌人而后已。两强不要顾及将来領土的形势，必須設法使战争成

为最后的、决定的、彻底的和不可更改的。意大利不能进到威尼斯的北界就自满；意大利必须与普鲁士在帝国的中心会师。为保证持久占领威尼斯，就必须击中奥地利帝国的心脏。

153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直捣心臟通牒，当一八六八年为人所知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但是事情却另有发展。胜利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陆地上在库斯多查战役，海上在利萨岛附近海战中都失败了。尽管有这些胜利，奥地利仍把威尼斯割让给拿破仑，却不给意大利。它希望拿破仑起而干涉。这种新形势现在使俾斯麦不顾司令部关于这事的大怒而允许与奥地利停战。在尼科尔斯堡缔结了停战协定，在七月二十七日停战期满后，又订了预备和约。根据在布拉格缔结的正式和约，承认普鲁士得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汉诺威、拿骚、黑森选侯国和法兰克福。奥地利自己出一笔不大的战争赔款了事。基于政治原因，俾斯麦宽大地对待奥地利。西南德意志诸邦另成立一个特别同盟。威尼斯由拿破仑交与意大利。

奥地利把威尼斯割让给拿破仑，激起了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勃然大怒，说这简直是背叛祖国。这个控诉用在普鲁士至少同用在奥地利一样恰当。但是，对于普鲁士勾结意大利，也就是勾结外国，来消灭一个德意志国家，却尽可能隐瞒起来；对于俾斯麦勾结克拉普卡，唆使匈牙利叛变，也是秘而不宣。克拉普卡曾为这事发表了下列的号召：

匈牙利的士兵们！

因为同胞们的委托，我担任全部匈牙利战斗力量的司令；所以我以领导人的身份来同你们谈谈。

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强大国王是我们的同盟者。加里波第由意大利疾进，图尔从多瑙河，白特伦从席本布尔根为解放祖国而来。我从这里率领英勇的匈牙利军队进入国境。路德维希·科苏特将

同我們一起；我們就这样團結起來把搶劫我國生命和財產的奧地利人驅逐出去。我們要奪回屬於我們的阿爾帕特<sup>①</sup>的土地；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我們獲得了永久的光榮，現在如果我們解放了祖國，桂冠和和平冠在等候着我們。因此，前進吧，跟隨匈牙利人的旗幟走！我們祖國的神聖土地離這裡不過幾日的路程了，我願你們往那裡去；那麼，回家吧，母親、姐妹和新娘都在那裡張開雙臂等着你們呢。

選擇一下吧！你們是願意坐待當可憐的俘虜，還是願做光榮的祖國保衛者？

祖國萬歲！

匈牙利將軍 克拉普卡

人們也不願提起，當普魯士軍司令部進入波希米亞時，公布了一個《給光榮的波希米亞王國的居民》的公告，公告的內容是：

“我們的正義事業若是得到勝利，波希米亞人和摩拉維亞人大概就可以有個時機，能像匈牙利人那樣實現你們的民族希望，那末但願幸運之星來建立你們的永久幸福！”

這還是用兩種尺度來衡量的老調。即使二者行為相同，而對待卻不相同。普魯士做下了最大的卑鄙行為（確乎不能把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事件看作一個正義的戰爭），那些行為倒被原諒，甚至被認為正當的了。但是它那仿效它的榜樣的敵人，却大倒其霉。比如，今天如果有外來勢力進入波森省，對波蘭人發出類似普魯士人在波希米亞的公告，那就該怎麼說呢？

德意志的小叛國者附和在奧地利各地得到庇護的大叛國者。一八六六年八月初，薩克森的自由主義者在比得曼教授、漢斯·布魯姆博士等人領導下，在萊比錫的一個地方集會上通過一個決議，

<sup>①</sup> 阿爾帕特（八九〇——九〇七年）率領匈牙利民族由俄羅斯南部遷移到現今的居留地。——譯者

其中說道：我們認為維護德意志和薩克森的利益的最好辦法是把薩克森合併於普魯士。一個生在薩克森的人，馮·特頓奇克先生，受俾斯麥約請做《普魯士年鑑》的編輯，他更強調地說，要把那些敵對的國家（薩克森、漢諾威、黑森選侯國）消滅掉。

“那三個王朝已經成熟，甚至過於成熟，應被消滅，它們的復原對於新德意志同盟的安全是個危殆，是在民族道德上犯了罪……除哈布斯堡家族外，數百年來沒有別的君主家族比阿爾柏丁家族<sup>①</sup>對德意志民族犯下更重的罪了……國王約翰無疑是被逐的德意志君主中最可敬的人，但他雖有豐富的學識，却仍是一個平凡的人，胸襟狹隘，他對世界和時代的意見是庸俗的、拘泥的。太子是個不無誠摯好心的人，但是粗魯而無任何政治見識，素來是奧地利黨的支柱；佐治親王的傲慢和固執甚至在馴順的德累斯頓也惹起了反感，對他更少希望……最重要的是，我們擔心從復辟當中由於說謊的精神、虛偽的忠義會重使人民道德淪喪，而這種虛偽的忠義和說謊的精神在夏季的某些事件以後至少在年輕人中已不再存在了。人們想像一下這個場面：國王約翰如何進入他的首都，德累斯頓的永矢忠誠的市參議會如何用感謝和尊敬的話語迎接那貽害國家的人，戴着芸香花的白衣和綠衣女郎向被侮辱的、被廢黜的國王鞠躬——的確，想想就會令人作嘔。”

他結束時說：“在這種日子裡應該有勇氣蔑視阿爾柏丁的刑事法典……我們不願一個已由上帝和人類判決了的家族重回王位。”

我所以提起這些事，主要是因為那時按現行叛國法是有罪的自由主義者，到了一八七〇年，却對於李卜克內西和我，千方百計把所謂叛國罪加到我們身上，還以為不夠。

俾斯麥盡力照顧他的熱烈崇拜者，不使他們受絲毫的損害。根

① 一八〇六——一八一八年的薩克森王室。——譯者

据和約第十九条，薩克森国王必須保证，“他的臣民或其他服从薩克森法律的人，凡由于有关普魯士和薩克森的关系在战争状态中对国王陛下本人所犯的过失或罪恶，或由于国事罪、叛国罪，最后或由于他在那个时期的政治态度，整个来說在刑事法律上、警察章程上或軍事紀律上均不得拿他問罪或侵犯他的公权。”

后来常有人向李卜克內西和我提出問題說，如果不是普魯士而是奥地利胜利了，那就会怎么样呢？很可悲，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在二者之中择其一，反对这一个就被看做是拥护另一个。但是事情就是如此。我的意見是，对于一个处在不自由情况下的民族，打一次败仗，对于它内部的发展却是推动而不是阻碍。胜利使一个与人民对立的政府驕傲和貪婪，失败则迫使它与人民接近和爭取他們的同情。这个道理是我們由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的普魯士，一八六六年的奥地利，一八七〇年的法兰西，一九〇四年俄罗斯对日本的失败学来的。如果没有那次的失败，俄罗斯的革命也許不会到来，的确，革命会因沙皇政权的胜利在多年内成为不可能。但即使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旧俄罗斯也不再存在，就如同一八四七年的旧普魯士在一八四九年以后不再存在一样。历史所表現的正相反，普魯士人民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财产，推翻了拿破侖的外来統治并把王朝由患难中救了出來，可是这个王朝却把在危难中对人民所作的一切美好的諾言全忘掉了。又須先經過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才來了一八四八年，人民才爭取到被扣留了几十年的东西。而到了后来，俾斯麦又如何在北德意志国会中把每个真正自由的要求都加以拒絕。他以独裁者的身份出現。

假定一下，一八六六年普魯士失败，那么，俾斯麦內閣和直到今天在德国还是穩如阿尔卑斯山的容克政权，就会被一扫而光。这一点沒有人比俾斯麦知道得更清楚。奥地利政府在胜利后决不会像普魯士那样强大起來。奥地利按它的整个結構来說，以往是、現

在仍是一个内部虚弱的国家，普鲁士却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强国的政府对于该国的民主发展更为危险。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在人民面前是软弱的。最可能的是奥地利政府在胜利后企图在德意志实施反动统治。那么，它就会不仅使全体普鲁士人民，而且也使极大部分其他民族，包括一大部分奥地利居民在内来反对它。如果革命曾有过成功的希望，那就是当时对奥地利的革命。结果可能是德意志帝国的民主统一。普鲁士的胜利却排除了这种结果。而且还有一点。德意志的奥地利被排斥于联邦之外（且不說放弃卢森堡），于是使一千万德意志人陷于差不多绝望的境地。如果在外国任何地方有一个德意志人受到虐待，我们的“爱国者”就会发出爱国的狂热，但是对于一千万德意志人在奥地利遭到的一场精神上的杀害，却毫不愤慨。

此外，在一八六六年以前几年，在我们的大人物中间就曾有过同样的讨论，这自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洛塔尔·布赫尔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九日，就是他参加俾斯麦的工作以前二年，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关于一旦对法兰西作战而普鲁士获胜这一点写道：“一个军事胜利，就是说普鲁士政府的胜利，将是一个灾难。”

一八五九年六月中旬，拉萨尔写信给马克思说：“我认为只有对法兰西的合乎民意的战争……才是件不幸的事。一个不合民意的战争对于革命却是无限的幸事……”拉萨尔还继续说道：“法兰西的失败会长期成为头等的反革命事件。事情永远是这样，不管有多少拿破仑，法兰西对欧洲来说是代表革命的，法兰西的失败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一八六〇年三月底，拉萨尔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必须说明，我在去年写小册子时”（《意大利战争》），“也渴望着普鲁士能对拿破仑作战。但我所渴望的战争是有条件的，即由政府来进行而非常不得民心并为人民所痛恨”。

的战争。这样它当然会是莫大的幸事了。”<sup>①</sup>

拉薩尔在一八六二年十月的演說《现在怎么样?》(第一版第三三——三四頁)里說：“但是德意志人的生存到底不是那么靠不住，以至他們政府的失敗中含有对民族生存的真正危險。您們，諸位先生，如果用深刻的理解力把历史細看一下，那您們就会看出，我們的人民所完成的文化工作是多么宏伟和坚强，多么破天荒和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指路明灯，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的生存的必然而不可移易，不容有任何怀疑。如果我们遭到一次对外的大战，我們的个别政府，如薩克森、普魯士、巴伐利亚等国的政府，可能在战争中崩溃，但是德意志人民却像个长生鳥似地从这些政府的灰烬中不可摧毁地站立起来，而对于我們这是唯一重要的。”

158

战争的結果据我們看来，好像是一个飞来的意外成功。有一天，李卜克内西喜气洋洋地来到我的店鋪，告訴我說，他买下了《中德意志人民报》，因該报亏累日增，萊比錫的自由派把它放弃了。报纸的訂戶在几个星期內由二千八百降到一千二百。此外，李卜克内西还承担了八百塔勒的債務。这个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一分錢也沒有，并且在那时情况下决不能使报纸发达起来。况且我們还应估計到普魯士会来占领这个地方。李卜克内西想法安慰我，說出版人暂时不要錢，另外有什么必要，我們再行筹办。做一个可以代表他的意見的报纸的主人，他是快乐的。他努力而且很彻底地做这件事，人們也許认为，薩克森的主人是他而不是普魯士人。快乐当然不会长久。报纸被禁止发行。对于这个处置我并不生气，但我留神不告訴他。我們因此免于陷入大大的窘境，因为我们曾作大胆的計劃，要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中推銷五千张每股一塔勒的股票，这个計劃会遭到巨大的失敗。

① 《奥迪南·拉薩尔給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书信》，斯图加特一九〇二年版。

## 战 后

战争的結果尽人皆知是北德意志同盟的成立，巨大的普魯士站在一些蘇尔小邦旁边作领导。如果由国王来定夺的話，他就会把小国中最大的薩克森也吞并了；但是这首先为拿破侖所阻止。也是这种顾虑才促使国王締結尼科尔斯堡停战协定，像俾斯麦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日給巴黎的普魯士公使的公文中所招认的。其中还提到，国王也預料到，为了和平，普魯士在德意志北部获得大量領土，是有保证的。国王对于一个北德意志同盟的重要性估計得比他（俾斯麦）要低些，国王把最大的价值放在吞并上，他（俾斯麦）也把吞并看做是和改革一样的需要，因为若不如此則薩克森和汉諾威就太大而不能有亲近的关系……国王曾声言，若不能为普魯士取得大量土地回去，他情願退位，并在今天召太子来这里。

对国王來說，吞并比整个北德意志的盟主权更为可爱，这只是符合他后来在凡尔賽宣告他为德意志皇帝时所采取的立場。对于他，老普魯士比新德意志亲近。这时同盟成立，并且因为从此也有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北德意志議会的希望，我們就需要有一个較牢固的政治組織和一个可供新党团结的中心的綱領。由于罗斯梅斯勒教授等一部分领导者所站的立場，要想綱領是个公开社会民主主义的，那是办不到的，而且还有一部分工人协会在政治方面过于落后，使我們不敢采取这一步驟。这样会发生分裂，但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必須避免分裂。最后这一种意見是决定性的，即当时因为刚发生的战事和德意志分裂为三部分，支配着一大部分资产阶级的160 情緒，有必要为了德意志的民主化把一切力量团结起来。

我們在八月十九日为建立新的民主党在开姆尼茨召开全国会



議，有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弗里茨舍、福爾斯台林、勒丁和其他人）參加。所通過的綱領是：

### 民主政治的要求

1. 人民的無限的自決權。在一切政治生活方面（包括議會、各邦議會、地方政府等）實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法。人民武裝代替常備軍。一個具有最大職權的議會，尤其是關於戰爭和和平有決定權。

2. 把德國統一為一個民主國體的国家。不要世襲的中央政權。不要普魯士領導下的小德意志，不要由吞并而擴大的普魯士，不要奧地利領導下的大德意志，不要一國三分。這些和類似的王朝割據主義的企圖，只能導致不自由、分裂和異族統治，民主黨要最堅決地對它進行鬥爭。

3. 取消一切等級、出身和教派的特權。

4. 提倡體育、智育和德育的國民教育。學校脫離教會，教會脫離國家，國家脫離教會。提高師資訓練所和給教師以相當的地位，把國民小學提升為由國庫維持的免費教課的國立機關。籌集資金來創辦補習學校，以備超過國民小學年齡者的繼續學習。

5. 促進公共福利，使勞動和工人擺脫任何壓迫和束縛。改善勞動階級的情況，遷徙自由，營業自由，全德意志的戶籍權，促進和支持合作社制度，尤其是生產合作社，借以消除勞資之間的对立。

6. 地方政府自治。

7. 通過以下各點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識：法院獨立、陪審員法院，尤其是在政治案件和出版訴訟中；公開的和口頭申辯的訴訟程序。 161

8. 通過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權，以及聯合權來促進人民的政治和社會教育。

這個綱領在決心方面可謂完美無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會員

們也同樣贊成，但听了馮·施韦泽的劝告，他們沒有加入新建立的党。罗斯梅斯勒也怀疑和不满，他认为社会性的要求过奢，他在綱領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的馬脚。在全国會議后不久我拜訪他时，他流露着煩悶。他強調认为，我應該对李卜克内西提高警惕，他是个危險人物，是个隐蔽的共产主义者。我設法安慰他，但无济于他在次年春季逝世前又经历了許多不如意事。这使他很痛心，竟拒絕接受做莱比錫的議會候选人，我們就推举他个人的对手烏特克充任。罗斯梅斯勒有个奇怪的思想，认为一八四九年議會还依法存在，所以必須由那个議会的末任議長勒維（卡尔倍，所以他爱听第一屆德意志国会的末任議長这个称号）来召集开会。勒維（卡尔倍）事实上曾在前几年向議員會議声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四九年議会的合法继承人，并且遇有一定时机将再行召集这个議會。但他后来留了神，以免把自己弄得极为可笑。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常务委员会主席斯陶丁格尔发布了一个传单，对其間在德意志所发生的变化发表意見。传单对由布拉格和約所造成的局势加以否定的批評。人民自由和人民权利沒有什么希望，相反地，常备軍制度，至少在北德意志，却是长年固定下来了。对于縮减国家开支，尤其是减低或豁免間接稅，現在比以往更不用想了。但这个負担将来肯定还要加重。

162

传单对于盛行的社会情况的批評更不恰当，传单注意到各邦眼前还非常落后的經濟机构，事物的新秩序首先必須导致消灭这种机构，如果新秩序有任何意义。这里首先要滿足资产阶级的經濟力量自由扩展的需要。

除了据斯陶丁格尔看来最近几个月的灾难所造成的阴暗面外，也存在着个别的、至少是消极形式的光明面。两种現象对于工人阶级特别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如作者所詳細叙述的，进步党的

大多数对于祖国的政治和社会革新表现出完全无能。第二个可喜的现象是，全德意志的工人表示赞成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法的普遍实施和一种自由的社会立法。

传单最后认为根据一八六六年的经验，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造成分裂的理由，而面对着进步党加强了敌意，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就比以往更加必要了。

“普遍和直接投票权，这个重要要求是两派的共同口号。此外，双方还要求彻底改革剥削劳工的税务制度，并改变把市民降为奴仆的陆军制度。对于劳动者结社权和合作事业的巨大意义和因此改变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双方都未加否认。但是关于国家对各邦的义务”(原文也有着重点)“在程度上低一点或高一点的争执暂时还是无意义的，当国家政权坚持着封建传统，把市民像一群无意志的畜类那样支配着的时候，当刀剑迫使祖国政治改组的时候，如果刀剑只会造成可恨的强迫来代替自由，它就有夺去我们为和平解决社会问题而努力的一切凭借的危险。” 163

这个号召在结尾时要求工人生气勃勃地走向工作岗位，消灭一切争端。

这个号召是由斯陶丁格尔个人发表的。他并没有征求常务委员会的意见。我们为这个传单吃了一惊。我对斯陶丁格尔较为熟悉，我认为这不符合他的见解。我这种推测被证实了。当他的纽伦堡进步党友人指责他这个传单的时候，他承认那是宗纳曼写的，仅由他签署。

北德意志议会的选举已日益逼近，我们有必要加紧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这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很大的牺牲。在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的心目中，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者是靠工人的几角钱来自肥的人。这样的指责是从来没有根据的，而在我才说的那个时期最没有根据。接受鼓动工作，就要对于事业具有高度热情、坚持到

底和牺牲精神。鼓动者的现金开支若能得到补偿，他就必须心满意足。为了尽量减少开支，人们认为接受任何一个党员同志的邀请而去借宿，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些人多半是穷苦的，他们尤其是在住家方面也是最简陋的。但是这里时常遇到稀罕的事情。我不只一次地不得不与夫妻二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还有一次在我睡的沙发下，老猫在生小猫，免不了嘈杂的咪咪声。又有一次，我同我的朋友莫特勒在深夜投宿到一个人家的閣楼上，里面堆滿經理人分发给家庭織工的紗綫。次日早晨日光由屋頂天窗照在我的脸上，我醒了，发现我是睡在一大堆黄色紗綫里，莫特勒黑鬚发的头钻在一堆紫红色的紗綫里。这种光景引起我哈哈大笑，把莫特勒惊醒，他惊讶地问：什么事！每个为党作鼓动工作的人那时都经历过这类事情，后来也还经历这类事情。李卜克内西当时在鼓动工作中特别活跃。出人意料之外，他的这种活动竟停止了几个月。普鲁士在战后宣布了普遍大赦。李卜克内西以为他被逐出普鲁士的处分也会同样失效，遂于十月初往柏林，并在印刷协会作了一次演说。就在当天晚上他便被逮捕，随后按违反禁令判处三个月徒刑，在市监狱内执行，与一般犯人受同样待遇。例如，每天晚上六时就把灯亮撤去，这使他特别难过。他的助手约·巴·冯·施韦泽在里面所受的待遇就好得多。施韦泽在监禁中所享受的自由和舒适，是此后一个政治犯在普鲁士监狱中所永没有再享受过的。

北德意志制宪议会定于一八六七年二月初进行选举。因此我们在一八六六年的圣诞节在格劳绍召开地方大会来推举候选人。物质力量和鼓动力量迫使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組織良好的选区内。这首先是第十七选区(格劳绍—美拉内)，以我为候选人，第十八选区(克里米朝—茲維考)以施拉普斯律师为候选人，第十九选区(司透耳堡—卢桌—什内堡)指定李卜克内西为候选人。由于他到一月下半月才从柏林监狱释放出来，他在选区内没有充分地做工作，所

以落选了。施拉普斯和我获胜。与我竞选的有四个，其中有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弗里茨舍，仅得将近四百票。在格劳绍选民大会上，他是我的敌手，但他注定失败。政治方面我超过他，在社会主义方面我也不在他以下。我得四千六百票，远远超过次于我的那个竞选人，并在最终选举中我以七千九百二十二票获胜。我的竞选人民族自由党的市参議員以四千二百八十一票落选。

竞选在当时即已用不正派的方式进行。有一天当我在选区旅行时，在火車上听到近旁座位中有一位先生将我肆意詆毀。据说我在格劳绍曾对选举人許願：如果选举我，就可望有双薪和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个謊言使我发起怒来。我站起来問那个讲话的人，方才他所讲的話是否从倍倍尔本人那里听到的。他答应是的。于是我把他叫做无耻的說謊者，当他要想向我发火时，我說出我的名字。这时他才哑口无言，遭到了旅客們的冷嘲热諷。到下一个車站，他赶快下車去了。

一八六七年要求进行两次議會普选，这就对我们个人的工作能力提出巨大的要求。虽然我们对于制宪議会的选举結果可以滿意，烏特克和許多与他在政治上接近的德累斯頓朋友却都感到强烈的悲观，这种悲观，他們在一八六七年七月在德累斯頓我們所举行的代表會議上表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民主主义者缺乏斗争性；他們对不参加选举表示贊成，但是他們抱着这种意見的仍占极少数。对于李卜克内西特别有利的是，罗伯特·施維舍尔代他在工人教育协会教授英文和法文，此外还热烈地参加鼓动工作。在八月底所举行的第一期选举，我們方面当选的是李卜克内西、施拉普斯、歌茨博士（林得璠，即体育家歌茨，当时是一个紅色的共和主义者）和我。拉薩尔派当选的是約·巴·馮·施韦泽和萊因克博士（他后来辞职，由弗里茨舍代替）和在补充选举中当选的哈森克萊維尔。同时，在拉薩尔的女友哈茨費尔

德伯爵夫人庇护下，有一部分人脱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另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派别也有一个代表福尔斯特林，后来第二个代表是門德，他继福尔斯特林之后参加了主席团。門德是个蠢货，他因为侍奉伯爵夫人，身体竟衰落到不注射咖啡就不敢发言，并且在他的演说结束时照例是这句话：“我说完了”，每次总是引起议会的哄堂大笑。关于我在国会中的态度和活动，以后再說。

##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常务委员会一八六七年三月在卡塞尔开会，但只有少数委员出席，这个会议确认了一年来政治事件对于协会所起的实际破坏作用。现金缺乏，有如上述，联合会的机关报《工人总汇报》停刊了，由普发佛博士（斯图加特）编辑而由宗纳曼印刷的《劳动》月刊也在出版后不久又告消失。这是联合会的领导无方所造成的。委员会决议刊行一种新的联合会机关报，名为《工人之声》，由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编辑，每十四天出版一次。我是他的最热心的撰稿人。

《工人之声》从一八六七年六月一日发行到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它的停刊是为了有助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初我们在莱比锡创刊而由李卜克内西编辑的《民主周刊》。最后，决议到秋季再召开一次联合大会。

创办了《民主周刊》，就满足了我們大家所深切感到的一个需要。我們一向沒有掌握一种代表我們的意見的机关报，因此也无法向我們的拥护者充分进行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启迪，而这首先是最必要的。再說，我們赤手空拳面对着敌人的攻击。自然，我們將因刊物而受到重大牺牲，但我們甘願承受，因为这是我們所有

的最重要的武器。

因为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上态度冷淡，我常常写信推动斯陶丁格尔前进。一八六七年五月底，我写信给他說，根据北德意志同盟以往帶給我們的和以后还要帶給我們的一切，我算做最大好处的是，群众的激昂情緒是从一八四八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并且我們由此取得了許多新的联系，这些联系，我們必須为运动的利益而加以利用。他应当与国际取得联系。我反对永久企图使工人协会脱离政治。还要考虑一个新的組織，因为北德意志同盟的气氛令人担心它会进攻工人协会。

薩克森工人协会的政治生活特别活跃，我們为了爭取群众，不停地进行鼓动。一八六七年圣灵降临节，我們又在弗兰肯堡召开工人會議，由我担任主席，會議首先申請修改薩克森工商业法。我們要求：十小时的标准工作日，取消星期日劳动，取消对劳动者結社的禁令，取消工厂和作坊里的童工，在工商会和劳資仲裁机关中增設工人代表，自管工人金庫，由工人和雇主協訂工厂和作坊的規則。瓦尔特希在作有关《工人协会对政治党派和薩克森政府抱什么态度？》的問題的报告时，提出一个議案說，會議可以把舒尔采—德里奇所建議的解决社会問題方法认为有缺点而予以否决，并且声明这个問題只有在民主国家中在全民参与之下才能解决。此外，他还介紹閱讀社会主义的著作和报刊。这个議案使少数派相当激动，于是我想應該用一个調和的議案来緩和一下激昂的情緒。这个我想錯了。瓦尔特希的提案有七票反对，我的提案有九票反对，都通过了。大会选择了格拉为下一次德意志联合大会地点，常务委员会也表示同意。

这个第四次联合大会是在十月六日和七日举行。出席的有三十七个协会和三个专区联合会的三十六位代表。专区代表中一位新人物，是一个馬格德堡的自由信仰教士烏里希，中等以上的身

材，披着皓白的长头发。不幸，在他那不无好感的脸上天生一个特别大的鼻子，因而大大地破了相。会议主席是由三个票数相同的来抽签，结果是格拉的著作家瓦尔顿堡中选。在他主持会议的过程中，联合大会向一八六六年盛夏逝世的班多(柏林)和一八六七年四月逝世的罗斯梅斯勒教授致敬。关于学校问题，由乌里希在一个大而无当的报告中提出了十六点要求。联合大会在一个决议中声明，对于这个报告，“大体”予以赞同，就此了事。关于组织问题，由侯赫伯尔格和莫特勒作报告，终于把我多年来所主张的意见基本上付诸实行。根据第四条，联合大会选举一个主席来领导一个由另外六个成员组成的理事会。这个协会的会所就是联合会的中央所在地。此外还决定，中央理事会每年得领取三百塔勒作为酬劳。在理事会以外，另选机要人员十六人，散布在德意志全国各地监察理事会执行业务并在重要事项上备咨询。在选举主席时，三十三票中我得十九票，麦克斯·希尔施十三票，克瑞布斯(柏林)一票。因此，莱比锡成为中央所在地。新的方针胜利了。我所长期努力追求的现在达到了。联合会现在有几分活动能力了。

议程中另一项是我关于矿工情况的报告。这是因为一八六七年夏季卢泉煤矿发生了巨大事故，当时有一百零一个工人丧命，留下了五十个寡妇，约一百五十个孤儿。我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举办募捐，捐得一千四百塔勒。一致通过的决议是：

“最近期间矿场所发生的事故使工人有责任促使地方政府制订法律，规定每个工业企业的雇主或企业家应当对于工人在进行活动时和因前者一方疏忽而发生的工伤事故负责。矿工方面所特别认为必要的是：1. 国家严格监督矿业公司。2. 法定施行双井制度，即一个运输矿井和一个安全矿井。3. 根据颁布的法律实行对被难者及其家属赔偿的原则，以及最严格地执行有关因疏忽而发生死伤的条例。4. 对没有工人协议和同意而由业主和同业联合会



片面实施的所谓矿工条例（关于罚款、包工制度、矿工救济金），作坚决的斗争。5. 由工人管理矿工救济基金。”

这是德意志工人会议第一次要求颁布一种雇主责任法令，后来在一八七二年通过帝国立法，诚然是以不完整的方式，满足了这个要求。

关于国防问题，因时间不够而不作报告了，但仍作出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在存在相反意见的情况下是一种糟糕的妥协，它把这个问题又推到下一次由纽伦堡联合大会来处理。

若干时候以来，我与日内瓦的约·菲·貝克尔通信。其中十月九日我写信给他說：

“您为格拉工人会议写的信可惜到得太晚。信是星期日到到的，而我在星期六已起程往格拉，我的妻子不知道信的内容，就把它搁置到我回来。友人李卜克内西未在格拉，相反地，克瑞布斯（柏林）却在。关于工人会议的讨论，您由报纸上将会知道得比我信上奉告的更详细。我们在讨论时必需特别谨慎，因为去年的事件也在工人协会内部引起分裂，这已多次显见于讨论中。但会议的经过大体上是令人满意的。

关于组织问题，我的建议，虽然有些人反对，仍顺利通过，并在选举主席时我也以十九对十三票战胜希尔施博士（以前在馬格德堡，现在柏林）。同时，蒙比錫因此成为中央所在地，运动暂时掌握在我們手里。

170

您关于设立国际支部的希望，我将设法予以实现，但在国会闭幕和我又确定在这里安顿好之前，对于这件事还不能有所作为。关于您想把《先驱》报的编辑部迁到这里来的计划能否实现，我不愿作决定性的判断。事实是，那些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抱着严重忧虑的人已经肩负这样多的工作，再添加新的是不适宜的。而对着各式各样的和各方面的要求，我们也感到力量不足。我将与友

人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对各点加以研究，然后再给您消息……

总之，运动还有许多应当改善的地方。在最艰苦的时期（失业、饥饿），许多人避开协会。因此，各协会须同物质困难作斗争。国会议员无薪给，同样给选举代表的选区内的协会加上不小的负担<sup>①</sup>，那么，就无怪各方面的成绩太少了。我担心或希望，随便您怎样说，欧洲这种古老的国家组织，迟早会有一天猛然一下子陷于崩溃。这种国家组织，不能按照以往的方式长久继续下去，即使在原则上反对暴力革命的阶层也会感觉到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由将来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要制造出健全的东西。 此致  
友谊的敬礼

您的 奥·倍倍尔。”

在格拉所成立的新组织也把一种新精神注入了联合会。首先是使很多协会摆脱一向漠不关心的状态，鼓励它们采取有力的行动。这只有为它们安排任务而要求其完成，才能办到。从现在起，沒有一期《工人之声》不把我写的中央理事会的号召登载在主要地位，它要求各协会对各种事项展开活动。效果并未落空。各协会渐渐活跃起来。那有限的联合会会费现在也以从来没有的准确时刻缴纳了。在中央的行政方面竟形成几乎全部事务重担都落在我的身上。我一人身兼主席、秘书和司库各职。只有理事会会议记录和文件整理由所选举的秘书办理。在这届理事会中有奥托·夫赖塔格，但他不久就辞职了，此外还有哈德里希和乌尔利希。与各协会的往来和由此而来的通信，数量渐渐巨大起来。在第一个业务年度结束时（一八六八年八月底），收件只有二百五十三件，发出的只有五百四十三件，虽然如此，仍然是比以前多。但从一八六八年九月初纽伦堡联合大会起，到一八六九年八月初爱森纳赫代表

<sup>①</sup> 議員免費乘車在一八七四年才實行。

大会止，收件数目达九百零七件，发出的则为四千四百八十四件，其中大半是卷寄邮件，其余的都是由我写的信，而且往往是长信。

这个工作包括：主持中央的行政会议，领导工人教育协会，在北德意志议会和关税议会中的活动，多次的鼓动旅行和从一八六八年秋季起为《民主周刊》经常写稿，它的整个工人栏都由我编写。进行这些活动，显然就会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把我的年轻妻子和我的生意丢到脑后，因而我在经济方面常常有遭灭顶的危险，有时几乎不知如何是好，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我以我展开活动的样子来要求别人，我曾一再写信给瓦尔特希，促使他振作起来。因此他在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我一封信大发脾气。信里说：

“亲爱的朋友！几个月前你给我一封同前天一样的勉勵信。但是我的复信只给你‘可怜’的印象。我现在深信这一点，可是我仍然请求你，要像重视真理那样重视我给你的信，因为我提醒你，我处在类似你的境遇时，如何用相似的方式，以狂热的、不怕牺牲的急躁心情去工作。

如果说我现在摆脱了‘强迫欲’，那么原因不在于懒惰，而在于辛苦得来的信念，即某些事情简直不能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手段予以强迫；我所赞成的是人们经常为我们的原则来工作，可是不必因此弄得精疲力尽。 172

由这个观点看来，我必须坦白地说：我担心，你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搞垮自己。如果是我弄错了，那末这对于事业大有益处，而我是高兴的；但就我对于事情所能判断的来说，我现在不了解，你将如何长久地继续你的鼓动以至一切公开活动……”

最后他说明，事情是这样的，他必须把他的鼓动活动或者他的业务职位辞掉一个。

后面的话无疑是对的，因为在这些年来有大批党员同志已到

了与瓦尔特希相同的地步。如果我們的敌人在今天还常常提起，比如說在社会民主党的議會党团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那就是因为，凡公开为社会民主党服务的工人立刻就被开除了。他或是沉默，或是在党需要宣传員、編輯、行政人員时，給他一个位置。党内独立的工商业者的遭遇就更加恶劣。我們的敌人常常訴說社会民主党的恐怖主义。啊，这些伪君子！沒有人比他們实行更恶劣的恐怖主义了。我十数年来看到多少杰出的党员同志由于敌人的恐怖手段而流血至死。

比如說，这里有尤·莫特勒，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当他在  
一八六七年参加选举鼓动的时候，他在一个工厂的眼房职位即被解除。为了不使敌人称心如意和在敌人面前撤出陣地起見，他在克里米朝設立了一个紡織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兴旺了几年。但到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爆发时，我們的态度惹得自由主义者极为忿怒，他們停止了对合作社的銀行貸款；合作社不得不暫緩付款。現在，莫特勒牺牲他的全部财产，尽可能来滿足債权人。他此后参加了萊比錫印刷业合作社的管理工作。由这类事件也可以說明一种現象，即如果說，在社会主义的議員和領袖之中通常有这样多烟叶商、紙烟商和飯店主人，他們所以必須从事这些职业，是因为这是被解除工作的党员同志維持生活的差不多唯一的办法。我自己在二十五年的工商业經營中，什么剝削顾客和社会活动与营业之間的利害冲突，我都不得不容忍。

173

我有几个站在资产階級立場的朋友，对于我在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不能理解，一再认为我是个傻瓜，为工人牺牲自己。他們认为我应当为资产階級工作，关心地方事件，做兴隆的生意，并且不久就可以当上个市參議員。这是他們的最高理想。我付之一笑，我的志向不在那方面。

我怎样能胜任这种沉重的工作負担（从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

二年，是我生平工作最忙的时期，虽则我直到今天从来没有缺少工作），也许很多人认为是个谜。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谜，因为我也曾同疾病斗争过很多次。我那时身材瘦小，两颊凹陷，面色苍白，参加我们婚礼的我妻的女友曾说：“可怜的人，她跟他不会长久的！”

幸而她们的话没有应验。

## 个人私事

对于一个在公众生活中同成群的敌人作斗争的人，站在他身旁的是怎样的一个妻子，不是无关轻重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她可能是他的事业的支持者和鼓励者或是一个累赘和障碍。可以说我是幸运的，我的妻子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我妻是莱比锡—马格德堡路线上一个路基工人的女儿，当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她的父亲已经去世。我们结婚以前，她是莱比锡一家装饰品店中的女工。我们在一八六四年秋季，她的慈母逝世前不久订了婚，并在一八六六年春季结婚。我对于我的婚姻从无遗憾。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她更为多情、更舍己为人、更随时乐于自我牺牲的妻子。我所以做了我所做的事，首先是只有在她那不倦的照顾和乐助之下才有可能。她尝到了许多艰苦岁月的滋味，到最后，较宁静时期的阳光才照临她。

174

一八六九年一月，我们生了一个女儿，这是我妻在苦难时刻一个幸福的源泉和安慰。在她出生时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在当天的上午我坐在房中的写字台前，极兴奋地等候着所盼望的事情，那时有人敲门，在我说声请进后，进来一位先生，自己介绍是阿尔贝特·特雷格尔律师。特雷格尔的名字我由他在《凉亭》杂志上所发

表的詩和他的社會活動早已知道。在彼此問好以後，特雷格爾惊奇地說：“您原來還是個年輕人，我以為您是一位年老的、納福的先生，放下自己的事業而以從事政治為娛樂的。”我圍着一件通常的綠色旋工圍裙站在他的面前笑着回答說：“您看，您錯了！”於是我們談起來，直到我聽見隔壁房間內所期待的嬰孩哭聲。現在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很簡單地把情形告訴特雷格爾，于是他向我衷心祝賀後離去。以後過了幾年，特雷格爾也進入國會，我們成為同事，雖然我們各有原則上不同的立場，却仍為好友。

我在工人運動中的地位，還有我的婚約使我觉得願意在萊比錫長久居住。薩克森在一八六三年固然已實行營業自由，但如果“外僑”，就是說非薩克森人，要想利用這一點的話，就必須先取得薩克森籍。這在當時需錢很多，而且同時也須有一個地區准許入籍。但是我缺乏資財來獨立經營和入籍。入籍連同在萊比錫取得公民權共約需一百五十塔勒，我由家里估計約可得三百五十塔勒。不料一八六三年底，我的師傅借口他已沒有工作給我做，把我解雇，于是我被迫獨立經營。實際上是因為他聽說我要想獨立經營而將我解雇。所以他是想把一個同業競爭者排斥開。于是我往維茨拉把所有能變現款的东西都取來。而後在城市中心租了一間作坊房子，這間房子在一個商店院內，是剛由一個馬廄改造成的車間。這座房屋簡陋得連個煙囪裝置也沒有，我為完成這個裝置，只好違背一切警章，把爐管由窗子通到院裡。因為我那一點點資金像日光下的奶油那樣融化無余，我只得把這個大房間兼做臥室，這在寒冷的冬夜把我凍得可憐。為暫時避開入籍手續，我用一個相好的本地市民的店名開張做我的生意，直到一八六六年春季為了結婚，我才借債把入籍的事辦妥。若遲二年，將因北德意志同盟的立法，我可以節省許多費用。

我的生意以最小規模開始，由一個學徒協助。起初，我常常連

日連夜地工作，就是說三十六小時連續工作，為的是能夠供應訂貨。幾個月後，我可以雇一個幫工了。但當我一八六七年二月當選為國會議員，在我離開的期間必須准許我的幫工了解他平時所得不到的生意情況，他在我回來後，就向我辭職而去獨自經營。後來我同一個以往的同事談這事時，他冷冷地說：“這是你咎由自取，你為什麼給他工資，使他可以積蓄錢呢。”這個“龐大的工資”當時是每星期四塔勒半，較其他作坊高半塔勒，而且在我這裡每天工時是十小時，在別的作坊是十一小時。

此外，我徹底了解了做小師傅的痛苦。貨物必須用長期賒欠的辦法交出去，而幫工和學徒的工資、伙食和自己的生計却必須每天、每星期支付。錢從哪裡來呢？我為了得到現款，把我的貨物以只較成本稍高一點的價格售給一個買賣人。可是我在每星期六去取錢的時候，我得到的盡是骯髒的紙幣，由於當時萊比錫同屠林根各小邦往來，這種紙幣泛濫於萊比錫。這些小邦，每個都徹底利用它的造幣權，使紙幣充斥市場。不過這種紙幣，一般也收也付，當作流通貨幣使用。同時，我也常收受任何一家工業企業未到期的聯票，或者是摩尼教徒所打造的杜卡特金幣，我按三塔勒零五格羅申收進，我必須到銀行去兌換，則往往只得到三塔勒，有時還要少些。所收的聯票也是這樣。我對於這種付款情形非常生氣，但是我有什么辦法呢？我把拳頭伸到衣袋裡，下一星期照舊送貨和收受同樣的款項，因為不管怎樣，我總需要現錢。

我的社會活動漸漸激起企業家反對我，拒絕向我訂貨。這就是抵制購貨。如果我不是在別的城市找到一個小小的顧客界來推銷我的貨品（牛角制的門窗拉手），那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就會被迫破產了。更糟的是在工作本來就少的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戰爭時期。當我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冬季同李卜克內西和赫普納遭到一百零二天候審拘留的時候，有一天，我妻叫人通知

我說，得不到一件工作而每星期仍須支付幫工和學徒工資。這是個使人痛恨的情況。可是不久就好轉了。和約一締結，繁榮時期就開始，繼續到一八七四年。訂貨的不招自來，顧主只要能訂到貨就滿意了。到一八七二年春季，當我同李卜克內西同在胡伯圖斯堡受二十二個月要塞禁閉，隨後我還有九個月徒刑的時候，我就能夠把生意和一個領工、六個幫工和兩個學徒留下來。當然沒有賺錢，且則我妻在這崗位上是幹練的。商業通信由我在要塞以及監獄中辦理。到一八七四年情形又惡劣起來，當時隨着商業恐慌，我的出品因競爭者用工廠方式生產而衰落下去，而且在價格上我以手工製造不可能與之競爭。我曾想到放棄生意而就黨的一個職位。這時湊巧找到一個黨員同志，即柏卡市（魏瑪附近）的商人斐迪南·伊斯萊勃，同我合伙，他既有資金而且具有必要的商業知識，並且不久就很可能佩服地學會了必要的工業知識。一八七六年秋季，我們設立了一個用蒸汽動力的小工廠，現在也把該項出品用青銅製造，因此我們不久就獲得了好的名聲。在開始時，因為危機仍很厲害，我們作了艱苦的奮鬥。我現在的主要活動是尋覓顧主並作業務旅行，所以後來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之下，我能夠為黨做很多工作。此後，在一八八一年，根據所謂小戒嚴，把我由萊比錫驅逐出境，這種驅逐又一年再一年地連續下去。我在这中間又曾屢進監獄，到一八八四年秋季我解除了合伙關係，專做業務的外勤工作。我覺得我已不能再對我那富於犧牲精神的同伙負責，不能再去分享他為之操心並擔任主要工作的營業的有限利潤。此外，我因為長久離開萊比錫，對於生意內部的動態也越來越生疏了。於是我在一八八九年又把外勤的職位放棄，從現在起全力從事寫作，由此我與斯圖加特的友人亨利希·施茨取得持久的業務關係。

此外，我在上文曾說過，人們常常把我這個人臆想成完全另一種形像。我們——我的合伙人和我——曾多次為這好笑。他的外



貌正像人們對我的想像。他是一個高大強壯的人，紅頭髮，紅鬍子一直垂到胸前。所以有時會發生這樣的事，不認識我的人到賬房來找我談話的時候，就直向我的合伙人走去。這種混淆常使我們大為開心。有一次也使我好笑，有一天，我因業務旅行到了杜賓根，同幾個熟人在酒館告別的時候，我後面一個杜賓根居民用純粹斯瓦比亞的方言吃驚地說：“什麼？這個小個子是倍倍爾？”——像這類的情形我時常遇到。就是早年也不少見，在火車中，旅伴們談論我，而料不到我就坐在他們中間，靜靜地听着。有時所聽到的簡直是強盜故事。

並且人們不僅講一些我的“強盜故事”，而且更多的人把我看做“強盜首領”，當做一個想毀滅一切的人物，敵人報紙的描寫對於這種想像有不少的貢獻。我曾多少次在我所參加的聚會之後聽到人們驚奇地說：“倍倍爾原來是一個很正經的人。”我必須把這看做一句恭維的話。

## 向紐倫堡前進

一八六七年七月，經過長久的協商後，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諸邦之間訂立了一個條約，根據這個條約，關稅和間接稅比率的規定應由一個所謂關稅議會來評議，這個議會是由北德意志國會議員和南德意志四邦特為這個議會選舉的代表所組成。巴登政府同南德意志自由主義者一樣，願意完全加入北德意志同盟，但為俾斯麥所拒絕。南德意志的八十個議員參加到國會里去，只會使普魯士政府陷入窘境。關稅議會代表的選舉法同北德意志國會的選舉法一樣。但南德意志的人民黨的大部分，尤其是符騰堡的人民黨，拒絕參加選舉，雖然一八六八年二月李卜克內西和我在班堡的一

个会议上曾竭力阻止这样一个无意识的、只能意味着临阵脱逃的决议。符腾堡的大部分工人协会也遵行人民党的口号。另外一部分则参加选举，并且因为人民党也陷于分裂，竟能让许多民主主义者通过关税议会的选举。当时在政治上分为两半的黑森则不如此。上黑森属于北德意志同盟。莱茵黑森和斯塔尔夫堡是独立的，并且现在选代表到关税议会。李卜克内西和我在选举鼓动中支持南黑森民主主义的候选人，并为他们召开选举大会。开这样会议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也来到达姆斯塔德的路易·毕希纳（《力量和物质》的作者毕希纳）的家里，在那里李卜克内西认识了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一年前死去了。李卜克内西在这次选举战中唯一的战利品就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此外，我们是战败而归。民主主义的候选人在美因茨和达姆斯塔德都失败了。

那时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有一大部分工人协会同人民党共同鼓动实施民兵制度，因为这是有关两邦的新军事编制的。符腾堡政府同议会商妥把服役期订为十七个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点成就。巴伐利亚议会的军事法律委员会在著名统计学家科尔布的影响下，宣布服役期只有九个月，并决议裁减四个骑兵团。这个成就因德法战争和南德意志诸邦加入帝国而化为乌有。

在萨克森，因为新的选举法将要付诸实施，我们就鼓吹赞成与选入国会同样的选举权。我们固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比起以往的情况，实际上有所改善。中央还促使各工人协会反对舒尔采—德里奇向北德意志国会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私法地位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远远落后于萨克森现行的合作社法。其他的鼓动工作是反对关税议会所计划的烟叶税和煤油税，反对在北德意志国会提出的一个工商业条例的法律草案中一系列的反动规定，关于这我曾在《工人之声》的一篇文章中加以阐明。

180 在中央的我们都明白，工人协会联合会中的政治分歧不容再

持續下去。我們在格拉取得權柄之後，我決定最好地利用這局勢。不管對於聯合會有什麼樣的後果，首先必須制定一個固定的綱領。自一八六七年九月以來由瓦爾特希充任主席的德累斯頓工人教育協會，響應我們的這種見解，並提出一個這方面的建議。艾希爾斯多夫爾由南德意志鼓勵同樣的思想。

我在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八日答复他說，我們討論了綱領問題並且作出了贊同的決定，即使在聯合會中因此引起分裂，我也並不認為是不幸。首先詢問宗納曼，他是否願意提出一個綱領草案，他拒絕了。於是我們請求羅伯特·施維舍爾（他由漢諾威遷居萊比錫並協助李卜克內西編輯《民主周刊》）根據國際工人協會的綱領來擬訂一個草案，並在下一次聯合大會上作關於這個草案的報告。我們得到李卜克內西的同意來推選施維舍爾。在還要爭取仍在猶豫的協會代表的情形下，施維舍爾的溫和性情較之李卜克內西的激烈性格要好些。

中央要想在下次聯合大會提出綱領的消息一傳出去，自由主義者所領導的各協會里就掀起了巨大的騷動。首先是南方和北方的自由主義報刊對我們肆行攻擊，並企圖煽動各協會來反對我們。各方面紛紛來信向我抗議和警告。紐倫堡工人協會的主席（首席教師勒格納），給我們的措施想像出一切可能的動機，如我們想用協會中的措施來彌補我們在國會和關稅議會中的“失敗”，對普魯士的仇恨指導着我們的行動等等。我們要犯錯誤，我們要遭到失敗。我回答說，正是在以往北德意志國會和關稅議會的討論中表明：必須如何大大重視工人用符合他們利益的方式有力地參與政治。社會事務和政治事務是不可分割的，是相輔相成的……就工人本身利益而言，他們必須是民主主義的……以往聯合會中的曖昧態度不能再繼續下去……他（勒格納）說，現在，當國家資助和自助之間的尖銳對立漸漸消滅，並且兩黨已趨於接近的時候，不

应当拿一个新的引起爭端的东西投入共同。我回答說，綱領的目的正是要表現这种接近……对立不是用缄默而是要用坦白的討論来消除的……可能，我們在联合大会中遭到失敗，但不能阻止我采取所计划的步驟。我本来占少数，但經過重新努力而达到多数，这在我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只記起，我的直接选举主席和中央的建議，从一八六五年就遭到反对，到一八六七年竟告胜利……我也同鄂尔敦堡的工人教育协会主席作了长久的辯論。我向他解釋，我們认为一个綱領是有必要的，以便使人人都知道联合会的立場，特别是中央和編輯部要知道如何才符合多数派所願望的管理。我們时常感觉到缺乏一个清楚的立場。一方面我們做得太过而另一方面则又不及。我确要承认，如果协会中的多数派拒絕社会民主党的綱領，那么，中央和薩克森协会的多数派就要考虑，是否还要隶属于联合会。

为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我現在向那些我认为可以同意我們的计划的一切人展开广泛的书信鼓动。但因联合会中許多人物的立場連我也不清楚，我几次去求他們，他们却声明对我不同意。这固然是可恼，但并不能改变最后的結果。

在这中間，摩里茨·穆勒在普佛尔茨海姆提倡創設工会，并倡議废除博士和教授們对各协会的領導。我在七月十六日答复他說，我同意他的关于行业組織的思想。德意志的印刷工人和卷烟工人已經效法英国工人的榜样，現在萊比錫的鞋匠和德累斯頓的訂书工人也来效法英国工人的榜样。关于工人协会領導人应由工人队伍中选举，我也和他的意見一致。我們从自己的經驗中知道，博士和教授做領導，照例是一无所成的。

七月初，我写信給約·菲·貝克尔，請他原諒我迟迟答复他的信。紐伦堡的联合大会使我們兴奋起来，我不知道工作應該先从哪里下手。我竭尽一个人的全副力量来鼓动，希望能有效果。反对

党也奋其全力，只是可笑的是，他們认为我們將向联合大会提出我們的开姆尼茨綱領。反对党如果看到最近一期的《工人之声》报，看見我們建議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綱領，他們就会吃了一惊了。

貝克尔认为，必須抓住这个机会来介紹我們參加以他为首的國際日內瓦德国人支部。我在七月十六日答复他說，这只能由联合会本身参加。强迫各个协会作为基层組織去参加，而且交納全部会费，那是不行的。各协会还有它們当地的需要占用它們的力量，所以要想使运动免于涣散，就不应消耗它們的力量。我打算提議，联合大会声明贊成国际的宗旨和目的，并努力同它作最紧密的結合。我盼望能很快地由他那里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去实现这結合。希望他或其他中央委員能到紐伦堡来作报告，同时可以证明一切国家的工人都是互相連属的。参加紐伦堡會議的人将十分踊跃，这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辜负高尚的人們为它流一把汗。

在附言中我提到，我們方才举行一个中央會議，在會議上关于与国际的关系取得了愉快的一致。下星期会作出明确的決議，得到有利的結局。一旦紐伦堡的决定揭曉，民族自由党的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的一部分协会被分离出去，我們或許必須将《工人之声》报停刊，因为它所需要的补助费过多。然后自然会把《民主周刊》相应地扩充为联合会机关报。

183

我們也再把国防問題列入联合大会的議程，这問題虽然按我們的意見在当时情况下就要求彻底处理，但一直没有彻底处理。我建議提名弗里德里希·阿尔貝特·朗格来作报告。中央理事会同意这个建議并委托我邀請朗格，我特別期望他的蒞臨紐伦堡在綱領問題上也可以发生對我們有利的影響。我当时写給朗格的信承埃里森(他曾出版一本朗格傳記<sup>①</sup>)代为轉遞給收信人。信里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阿尔貝特·朗格》，是埃里森著的一本傳記，萊比錫一八九一年版。一本值得介紹的書。

說道：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萊比錫

尊敬的博士先生！

久欲與您通信，但可惜為各種工作所累，未能如願。現在受中央理事會同人委託，有所請求，因而執筆，更覺欣幸，如蒙惠允，是所至盼。

正如您由《工人之聲》報上所充分知道的，我們在為下次聯合大會作準備。議程各項目中，有由波斯內克所建議並經我們完全贊同的國防問題。您知道，這個問題曾多次列入聯合大會的議程上而終未得到討論。在上次聯合大會上還以各種小手法把這個重要問題列為議程的最後一項，結果在當時並未經任何討論就作了個一致通過的軟弱無力的決議完事。

184 我們決定並已經採取措施，在下次聯合大會上不让這個日益迫切的問題再從議程上划掉，而要把它變成一個主要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極需要一個適當的報告，於是我們大家異口同聲地認為沒有人能夠比您（不是恭維話）再好的了。

我因此受中央委託，誠懇地請求您來作有關國防問題的報告。

聯合大會地址無論如何總是選擇南德意志的城市，或許是紐倫堡，時間我們希望是九月六、七日，旅費當然由聯合會賬房開支。我們極懇切地請求您，不要拒絕我們的請求。除國防問題外，議程上還有其他各項，您的蒞臨和您的有力的一票對於這些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

我們，如您所將要知悉的，還把綱領問題列入議程，因為我們認為，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德意志工人協會應聲明它將來在政治和社會方面要採取什麼立場。我們知道，這將帶來艱苦的鬥爭，可能、甚至很可能發生分裂。但是我們並不以為這為不幸，因為我們寧願要十個堅持信念的協會而不要三十個動搖的或者作了哥達帝制

派和資產階級的尾巴的協會。

我們在薩克森將竭力使我們的協會都出席，如不能派代表，就  
用委託的辦法，我還要向別處發出同樣的要求。

我估計定會勝利，若辦不到，那麼我們自己立刻就地着手創設  
社會民主工人同盟。目前的分裂，使人束手束腳，不能繼續管理下  
去了。

由傾向哥達派的協會的各種函件可以看出，人們如何害怕討  
論政治問題和深入的社会問題，人們想盡一切方法來阻撓這種討  
論；所以我們的人就更有必要人人都作好準備。

由薩克森前往參加的著名黨員同志有：格爾曼、李卜克內西、185  
莫特勒、施維舍爾等。我也要邀請奧地利人、瑞士人和國際工人協  
會；同國際工人協會相結合，我覺得是有必要的，但在我們肅清自  
己家園之前，是不能作此想法的。

我所收到的由紐倫堡來的私人信件，表示一種懷疑說，克萊  
麥·馮·都斯力圖插手其間，可能暗想竊取工人協會的領導權。  
這種思想很大膽，實現大概不可能，因為即使是民族自由黨的協會  
也不至於把他們的票投給一個政治和社会立場正與工人利益相反  
的人。還有人談起，他（克萊麥）有意邀請巴伐利亞的商業部長  
馮·施略爾參加工人會議。如果真有這事，施略爾來出席，那確也  
無妨，他必然要嘗些苦頭。<sup>①</sup>無論如何，這個懷疑表明，巴伐利亞  
的進步黨先生們在醞釀點什麼，要使這些人碰一鼻子灰，對您也會  
是件開心事。

我們在薩克森把運動進行得極為順利。工人協會、民眾協會  
像雨後春筍一樣生長出來，在我們的選區內沒有一個較大地方沒  
有設立工人協會或民眾協會的。個別城市如茲維考、克里米朝等，

① 我在關稅議會中認識了馮·施略爾先生，他是該會成員並在那裡從事反動  
活動。

在所有邻近乡村中也都設有分会，并且在农民中也有不少の会员。相反地，整个资产阶级，除少数个别例外外，都仇視我們，这自然符合我們的願望。我們所遭遇的唯一不幸是党十分缺乏財力。一切都是一分一角地湊起来的。由此您可想見，譬如說，到我們能創設我們的周刊时，要費多少力气。不过周刊倒有了个好基础（我們現有一千二百个以上的訂戶），由此我們才能保证有了把党團結起来并促其成長的工具。

186 格尔曼負責合作社方面，他把消費合作社当作嗜好，并把它們組成一个联合社。我們自然努力使这些人切記：要促进他們的經濟利益，这还不够，要用这种方法解决社会問題，是不可想像的，有必要并且有义务去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并且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消費合作社方面，我們的‘头号鼓动者’并不少。

我能奉告的还多，但一方面我缺乏時間，而且还希望，在下次联合大会上必定可以会面。我确实渴望能与您作数小时的談話。請不要以不能前来而請原諒，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希望立即賜复并致友誼的敬礼。

您的 奥·倍倍尔。”

我在七月五日接到朗格对于这封信的答复：

“亲爱的倍倍尔先生！

我十分抱歉，使你不明真象。但我最近几个星期的生活是，白天出去到苏黎世为宪法委员会作报告，夜晚在这里为一个日报和一个周刊工作。我的股东和同事充当宪法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很多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时时刻刻都为国家做許多事，把編輯工作还兼照料一个相当大的商店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所以我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顧到通信。遺憾的是，在新宪法完成之前（如能在今年完竣，我們就滿意了），不能有把握地支配我的時間。其間固然有几个月的休息，只是我还不能确知是在什么时候，所以非常



抱歉，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我也不能承担。如果我的时间许可，我还要到纽伦堡来，我这方面也同样渴望能再见那么多的能干朋友——可惜一部分处在分离的阵营里。”

朗格没有来。

不出所料，联合大会由大多数协会选定纽伦堡为会议地点，参加者异常踊跃。计九十三个组织单位，有一百一十五位代表。此外，应邀的来宾中有：国际总委员会代表<sup>①</sup>爱卡留斯(伦敦)，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代表奥伯温德和哈同，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奎克和格罗伊里希，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主义协会代表拉顿道夫博士(苏黎世，以往柏林监狱中的犯人)，国际在日内瓦的德意志支部代表海格尔(班堡)，国际在日内瓦的法兰西支部代表毕台尔，德意志人民党委员会代表布律克曼和尼特哈迈尔(斯图加特)。联合大会代表中有一个巴登协会的代表雅科布·维涅德，他作为科

① 我给总委员会的邀请书如下：

“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尊敬的先生们！大部分德意志工人协会有一个重要事项将临，特此函告。

九月五、六、七日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将在纽伦堡举行联合大会。列入议程的各重要问题中首先是最重要的‘纲领问题’，这就是说现在应该决定，联合会继续把现在的无原则和无计划的工作保持不变呢，还是按照坚定的原则和一定的方针进行活动。

我们已经决定采取后者，并极建议接受《先驱》报第一期所载的国际工人协会纲领，以及参加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建议已经可以保证多数赞成，所以成功是无疑的。但我们认为，如果国际工人协会能为这个极需要您来关怀的会议派遣代表出席，就会给人以极其良好的印象。兹愿将我们的希望和迫切的邀请奉陈，敬请派遣一位或数位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出席纽伦堡联合大会。

我们愉快地希望您应允我们的请求，并立即给予一个概允的答复。保证派来的代表先生们得到友好的接待。

敬礼和握手。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中央

主席 奥·倍尔

莱比锡，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伦的考貝斯<sup>①</sup>通过亨利希·海涅而有了一定的名声。还有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奇尔希纳博士，是受希尔得司海姆織工协会的委托来参加的。奇尔希纳可以说是第一个敢于由全德工人联合会飞到我們这边来的燕子。这在約·巴·馮·施韦泽的心目中简直是一种罪行。奇尔希纳后来也被选为受托人。联合大会的主要討論在有历史意义的市政大厅中举行，紐伦堡市政会所以让与这个大厅，是希望自由主义派得到胜利。这个希望却成为泡影。大会由我致欢迎外来代表的开幕詞，然后选举主席。九十四票中我得六十九票，勒格納(紐伦堡)得二十一票，分散的四票。因此，决定支配會議精神的抉择就定了下来。第一副主席由勒文施太因(佛尔特)以六十二票当选，第二副主席由比尔格尔(哥平根)以五十九票当选。敌对派全軍覆沒。它还想尽可能在排定議程上設法挽救；它要求把綱領問題从議程上取消。因此发生激烈的爭論。由許許多多方面发出“絕不妥協”的呼声，于是以大多数的同意決議接受全部議程。

大会討論进行得很好。紐伦堡會議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好會議之一。我作中央行政工作报告时声明，新組織表现得极好，比起以往来，联合会是輝煌地屹立着。联合会所属各协会約有会员一万三千人。維涅德企图用一个說明理由的議程来取消綱領問題，未能如願。綱領的討論是在大家极感兴趣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結果，綱領以六十九票(代表六十一个协会)对四十六票(代表三十二个协会)通过了。少数派对这个決議提出抗議，他們离开會場并且不再参加討論。他們企图用德意志工人同盟的名义創立一个新的組織，沒有成功。这些协会失去一切政治意义，从現在起只不过作各种自由主义党派的附属品而已。

<sup>①</sup> 維涅德的笔名，海涅用它写成一首詩《考貝斯一世》。——譯者

所通过的綱領是：

“紐倫堡的第五次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声明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綱領的下列各点：

1. 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得平等的權利與平等的義務，並廢止任何階級統治。

2. 勞動者在經濟上從屬於勞動資料的壟斷者（唯一的占有者），是一切奴役、社會災難、精神墮落和政治依賴性的根源。

3. 政治自由是取得工人階級經濟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社會問題是與政治問題分不開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以政治問題的解決為條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國家才有可能。

此外，鑒於過去為達到工人經濟解放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直由於每個國家里各個不同勞動部門的工人彼此間缺乏團結，由於各國工人階級彼此間沒有統一的親密聯合，總是遭到失敗；勞動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包括一切建立現代社會的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實行合作，所以第五次德意志工人協會聯合大會決定贊同國際工人協會的努力。”

紐倫堡工人協會聯合會關於綱領的決議，使人對於今後各協會站在哪個陣營不再發生疑問。雖然如此，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斯圖加特召開的人民黨代表大會上多數派做得好像雙方的地位沒有發生變化一樣；而且他們竟聲明同意在紐倫堡所作的關於綱領的決議，同時並特別提出綱領所強調的國家問題和社會問題不可分離，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和政治自由的實現是互為條件的。並且對於約翰·雅可比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柏林所作的綱領講話，他們也聲明同意。

这种程度的見識是一八六八年以后人民党的后继者所完全丧失了。尤其是出席于紐伦堡的尼特哈迈尔律师（斯图加特），努力于达成更广泛的合作。他认为民主党如欲完成其任务，必須提高为社会民主党。他若不是早年暴病（中风）死去，可能在后来完全加入我們的队伍。

除尼特哈迈尔外，首先是宗納曼拥护这次決議。宗納曼絕不願断絕工人协会和人民党之間的关系，对于綱領虽不热心，但在紐伦堡还是予以贊成。現在对他很关重要的是使人民党全体大会批准他在紐伦堡的行动。

少数派的退出，破坏了联合大会的議程，因退出者之中有各种問題的主讲人。宗納曼的关于創設一个应由国家监督的养老基金的报告，遭到反对，所有的发言人，特别是瓦尔特希，认为全部工人救济事业应由团結在中央集权的职工会中的工人来管理。

瓦尔特希和海·格罗伊里希所建議的与此有关的決議一致通过，決議說道：

“考虑到为工人設立的普通养老金，如听凭现存国家来管理，就会使工人不知不觉地对現行国家发生一种保守的兴趣，而这种国家是工人絕不能信賴的<sup>①</sup>；

考虑到疾病和死亡救济金以及养老基金，根据經驗，最好能由同业工会創設和保管，第五次联合大会決議，委托联合会成員，特别是中央，努力使在中央集权的同业工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

格尔曼（莱比錫）作有关疾病救济基金的报告，报告总括为下列決議：联合大会向联合会所属单位建議，由地方代表組成一个同业会，这个同业会，第一，有个好的金庫組織，充分的自治，把这些再按职工会組成联合会，并在适当的机关报上討論救济金有关事

<sup>①</sup> 很久以后，俾斯麦也声称，小額的退休金是使工人喜爱现存国家制度的最好方法，由此产生残废保險和老年保險的思想。

項；第二，爭取在工會金庫內部自由流通并按銀行方式經營疾病救濟資金，此外還有第三，也促使為僕役和女工創設從來沒有的這樣的金庫。

會議的下一步是由施維舍爾作有關間接稅的報告，李卜克內西作關於國防問題的報告。為考核中央的業務實施情形而設的委員會，對中央致以高度的贊揚。雖然工作負擔大大增加，書籍和公文却都處理得井井有條，對中央應致以最熱烈的表揚。這一個業務年度工作的物質報酬是五十七塔勒四新格羅申。選舉主席時我在五十九票中得五十七票。因此，下年度萊比錫仍掌握領導權。

當選為受托人的有：比爾格爾(哥平根)、璦茨(斯圖加特)、艾希爾斯多夫爾(曼海姆)、龔采耳(斯派爾)、宗納曼(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史圖特曼(呂色斯海姆)、奇爾希納博士(希爾得司海姆)、海曼(科堡)、莫特勒(克里米朝)、克勞塞(穆耳森，即聖雅科布)、布萊麥爾(馬格德堡)、瓦爾特希(馬克薩，德累斯頓附近)、考比茨(德累斯頓)、奧伯溫德(維也納)、勒文施太因(佛爾特)。受托人中代表北德意志的不多，其原因在於北德意志各協會的代表除少數例外，192都是屬於反對派的，而且各協會已聲明退出聯合會。

工人同盟組成後，發表了一篇宣言，其中對紐倫堡聯合大會提出激烈的控訴，並且不乏誣蔑和捏造。於是我在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第四六期《民主周刊》上發表一篇長的聲明作答，來駁斥它的攻擊。在敵對的宣言里說，我們要想引誘工人站在“社會一共產主義的立場”上。關於這點，我說：“社會一共產主義的”立場是個奇怪的立場；這只是兩個辭，卻包含着：第一，愚蠢，第二，謊言，第三，誣陷。我所以認為這里面有誣陷，因為他們想以共產主義一辭不僅使業主，也想使工人怕見我們。“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等辭已不敷用，工人和雇主對此業已見慣。這些人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全無可怕之處，所以必須把共產主義一辭拿出來，為的

是让那些市儈吓得要死。

紐伦堡联合大会的決議为运动創造了新的形势。施韦泽以前在他的导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几次三番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宣告它为小资产阶级党，尤其喜欢称呼薩克森的人民党为小资产阶级党，虽然他明知道党内的资产阶级成分占极其微小的少数，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說了。无论如何，党内的资产阶级成分并不多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像李卜克内西于次年春季在爱北斐特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上当面对他說的而且也是他点头承认的。他几个月后派到薩克森来攻击我們的鼓动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人（列·施·，后来成为公会会员，今天是正式任命的鞋业公会的首領）事后說：“施韦泽把我們騙苦了，在我們所举行的拥挤不堪的大会里，我們所看到的，除了工人还是工人。”他还可以加上一句：“我們的成績等于零。”李卜克内西和我几乎在他們所举行的每个集会中都跟踪着他們，并且使他們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

现在已沒有爭論，在薩克森的人民党和工人协会联合会内部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站在国际的立場上。因此，紐伦堡會議及其結果也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留下个印象，使他們对施韦泽产生深刻的怀疑。这种作用表现在下一年度。如果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領導是适当的人，則抱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的团結立刻就可以成为事实。运动就可以避免这七年之久的互相斗争的损失。

紐伦堡联合大会后不久，柏林的工人协会（它的主席克瑞布斯在联合会的整个爭执中态度暧昧）发生激烈的爭論，其結局是相当多的少数派退出协会而成立一个声明贊同紐伦堡綱領的民主工人协会。新协会的创办人中有：包斯、哈文尼特、卡尔·希尔施、約納斯、保尔·辛格尔、文采尔。后来加入的有麦茨納、米尔克和亨利希·孚格尔，他們或是由全德工人联合会自动退出或是象孚格尔

那样被开除出来的。这协会面对着拉薩尔派，在柏林处于困难的地位；拉薩尔派諷刺它是沒有军队的軍官的协会，这话还不算完全錯。但是軍官也会办点事，并逐渐地把所缺乏的队伍成立起来。

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弱点在于财力薄弱。联合会虽有会员一万人，但每人每年一格罗申的会費是不能办多少事的。人們除为本地捐款外，忘記了对联合会作更多的贡献。在这方面全德工人联合会胜过我們。因此，我們在中央的人郑重地想到以改組来补救。当施韦泽宣布要往薩克森和南德意志作大鼓动旅行，并为此指定相当数量的鼓动人員的时候，我們的处境就更加討厭。要作抵抗，首先要求我們这方面出錢，可是我們沒有。《民主周刊》自一八六八年十二月起成为联合会的机关报，也需要巨額津貼。我們用手中仅有的十塔勒把它創刊了，随后又陸續增加了些小額款項。后来常以同样的“财政基础”創設各种党报。据計算，这些报在第一期就会破产。但是为报刊甘愿牺牲和对报纸的热情是无限的。领导人員当然必須滿意于对他們所做工作的那少得可笑的报酬，他們劳就这样做了。今日党内的一輩人不曉得当时的贫困景况和无酬效的要求。譬如，李卜克内西作为《民主周刊》的編輯，月薪只有四十塔勒，后来充当每星期出版三期的《人民国家报》的編輯，每月六十五塔勒。一八六九年，以每月二十五塔勒录用赫普納；我为《民主周刊》写工人栏是沒有报酬的，主持报纸发行事宜，我每月得十二塔勒，我还須供給发送报纸的場所。到了一八七〇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放弃了这种工資。当时人們不知道加薪这回事。例如，当一八七八年《人民国家报》的后身《前进报》根据反社会党人法被扼杀的时候，李卜克内西还是拿同九年前一样的工資。可是这中間他的第二个妻子已生了五个小孩，其中最大的当时还不滿十岁。在财政方面，我們现今与以往相較（因为我在这里关于工人协会联合会所說的話，也适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已成了个資產階級政党。

可是党总是有好运气的，所以我常同朋友們說笑話：“若是有个上帝，那它一定是很喜愛社会民主党的，因为每次遇到最大的困难，救星总是立刻到来。”在当前情况中，救星来自我們意料不到的方面。我正在向一位來訪的我們外地的受托人訴說我們的經濟困难，邮递員送來了一封挂號信。寄信人是苏黎世的拉頓道夫博士，一八六六年我在法兰克福認識他，又在紐倫堡黨員大會上見過面。他信上写着，由他和他的友人管理的信托基金，即所謂革命基金中，撥三千法郎供我支配，我可以分三期收取，并将使用情形向他報銷。誰能能比我更加幸运？我高兴地跳起来，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告訴我那个愕然相看的朋友。后来在萊比錫叛國案中也發揮了作用的革命基金（关于审理該案的醞釀經過，其要点以后再述），曾多次把我們从困难里救出来。但是，后来因为我們对于巴塞爾国际工人代表大會有关土地問題的決議和一八七〇年戰爭的态度，同拉頓道夫及其同伴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个来源断絕了。

施韦泽在薩克森为反对我們所布置的鼓动并无結果；在南德意志，成效也只是微乎其微。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他的鼓动人員在南德意志也遇到我們协会的工作人員。但是显而易见，这种斗争使两党中的情緒越来越激昂了。

## 工会运动

我从事工会运动的程度，照我想，只能算是它的助产士。一八六八年可称为德意志工会的誕生年，但是这要加上一个条件。上文已經叙述，在一八六五年这个繁荣年，許多城市中发生多次的罢工，但因工人缺乏組織和沒有基金而大部分失敗。两者必須兼備，現在可以說是使人不得不加以注意了。現在虽然組成了許多大多



数是地方的专业协会，但是很快就認識到这还不够。一八六五年圣诞节，因弗里茨舍的发动组成了全德雪茄烟工人协会，一八六六年印刷工人继其后，他们从起首就对政治性的工人党严守中立，这无碍于理查·海尔特尔一八七三年十月在柏林印刷工人大会上声明说，他以联合会主席身份认为，联合会最好在形式上不与任何党派相联合，“然而在精神上我们是属于爱森纳赫纲领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严格地说，他这话不能指全体印刷工人而言，有许多还是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后来，在一八六八年以前，就已经成立了金匠联合会同它的机关报和全德裁缝协会。总之，直到那时，政治运动的领袖们在组织工会方面所作很少。主要只有李卜克内西，他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中和在莱比锡及各地的民众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英国工联主义的演说，使人对于工会组织有些了解。一八六八年五月，我们在中央理事会也曾讨论过创立工会，但因经常工作繁多而且首先有必要制定纲领来澄清联合会，所以我们不能立刻着手实施计划。一八六八年夏季，麦克斯·希尔施到英国去，研究那里的工会组织，在柏林的《人民报》上加以报道。这使得研究过这种思想的施韦泽和弗里茨舍想抢在希尔施（希尔施希望通过创办职工协会，把工人吸引到进步党里）的前头。现在二人迅速采取行动，据我推测，是由弗里茨舍策动起来的，因为弗里茨舍早已认识到工会的意义，但是新创立的组织也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假如他不受施韦泽牵制的话。弗里茨舍取得了施韦泽的同意和白拉克的赞成，代表不伦瑞克的会员在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汉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上建议如下：

“代表大会声明：1. 罢工不是改变现今的生产基础和由此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不过它是一个手段来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冲破警察的监视，假设有正确的组织，可由现在的社会中清除个别严重的恶事，譬如过长的工作时间、童工等等。2. 大会委托

各协会主席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来創設发生这种作用的全国性工会。”

議案的第一部分通过，第二部分被否决了。相反地，有如上所述，数日后，紐伦堡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并没有經過大的辯論，即決議委托中央創設工会。所以这里对于工会意义的理解，是与流行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多数派中的理解相反的。在汉堡那次表决以后，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声明，他們将以国會議員身份为創設工会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但是当这也遭到反对时，施韦泽就威胁說，如果連这也不允許他，他就立即辞职并退出联合会。这个威胁起了所預期的作用。九月二十七日和随后几天，在柏林举行了工人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不下二百零六人，多数是由工人集会选举出来的，代表着十四万工人。值得一提的是施韦泽开幕詞中下列的議論：

“英国是地球上远远跑在前面的資本最雄厚的国家，如果說外国的工业还支配英国的工业，那就是因为英国工人給那里的资本家造成那么多的困难。同样的情形也能发生在德意志，而且更容易些。德意志工人如果願意的話，就能够直截了当地毀坏德意志工业，而且当工业使他們只能拿到极其可怜的一点工資的时候，他們也将沒有兴趣保持这种工业……工人們如果牢固地組織起来，就能够使德意志工业沒有竞争的能力，如果资本家先生們不願意这样，那么他們就会付給較高的工資。”这种論证笨拙已极，但施韦泽沒有打算就不发表意見。

198 代表大会成立了处于中央领导机关领导之下的所謂工人团体，这领导机关是由施韦泽、弗里茨舍和卡尔·克萊茵(受北斐特)分任主席和两个副主席所組成。这个組織形式选择得不太恰当，这只有归功于施韦泽，他决不让他势力所及的运动(哪怕只是一部分)有独立性。

施韦泽于九月十三日写信給馬克思，信內附有他的条例草案，

他接到馬克思對於他的企圖的有利的復信，便把這當作很重大的事。像馬克思隨後寫給施韋澤的信所說，他把那封信誤解了，他對施韋澤的第二封信才作答復，其中關於施韋澤的組織一段說道：

“至於說到柏林代表大會，那末，首先是不要忙於召開，因為結社法還沒有通過。<sup>①</sup>因此，您應當和拉薩爾集團之外的領袖們交換意見，和他們共同制定計劃並召集代表大會。但是您並沒有這樣做，您只是公開地讓他們二者擇一：或者附和您，或者反對您。這次代表大會本身不過是漢堡代表大會（全德工人聯合會代表大會）的增訂版。

至於章程草案，我認為它有原則性的錯誤，我相信我在工會方面的經驗並不比任何同時代人少些。在這裡，我不想作詳細的說明，只想指出，集中的組織對秘密團體和宗派運動是極其有用的，但是和工會的本質相矛盾。即使這種組織是可能存在的——我說它根本不可能存在——，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國是這樣。這裡的工人從小就受官僚主義的訓戒，相信權威，相信上級機關，所以在這裡首先應當培養他們獨立活動。

您的計劃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實際的。在‘聯合會’中有三個來源不同的獨立的權力機構：1. 由工會選出來的委員會；2. 由普選產生的主席（他這裡完全是多餘的）<sup>②</sup>；3. 由地方選出來的代表大會。這樣一來，就到處都是衝突，而這本來是應當促進‘迅速行

199

① 這是指已提交北德意志國會的工商業條例草案，但還沒有經過詳細討論成為法令。

② 在這裡馬克思作了以下的附注：“在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中，也設有協會的主席。但是，實際上他的職能只不過是主持總委員會的會議。一八六六年我曾拒絕擔任主席，一八六七年根據我的建議根本取消了這個職位，而代之以在總委員會的每周例會上選出的會議主持人（chairman）。工聯倫敦理事會也只會有一個會議主持人。書記才是它的常設職位，因為他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國際的“獨裁者”就是如此。在我這方面我必須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我的通信中只以建議者的身份出現，而且他們的建議在許多很重要的場合，我都沒有採納，因為我根據實際情況自有更好的見解。雖然如此，我却同他們絕沒有嚴重的分歧。——奧·伯·。

动’的。拉薩尔从一八五二年的法国宪法中借用了‘由全民投票选举’，这是大大的失策。况且这并不适用于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著錢的問題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宣告結束。

但是，不管組織犯了什么样的錯誤，这种錯誤大概都可以通过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消除掉。作为国际的書記，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紐伦堡多数派之間的調解人，——这当然要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調解。我已經把同样的話写信告訴萊比錫。我不会忽視您的处境的困难，并且永不会忘記，我們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更少地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答应您，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責任。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答应您，我不会在某一天——当我认为这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絕對需要的时候——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薩尔派的迷信，就像当时我对待蒲魯东分子的迷信那样。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是怀着最良好的願望的。

您的忠实的 卡·馬克思”

200 但是新創的組織并不长久与施韦泽相适合。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觉察到工会中有某种倾向独立的企图。施韦泽在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說，有人企图把工人团体联合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分开并把它放在独立的領導之下；他对此提出警告。三个月后他更进一步。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第一五二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告說，各方面都表示希望把各种工会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总工会。他为此拟訂了一个草案，发表在同一期上。弗里茨舍在这以前就已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联合会断絕关系，并辞去第一副主席职务。同样与施韦泽断絕关系的还有：全德鞋匠协会主席路易·舒曼，全德木匠协会主席約尔克和全德裁縫协会主席邵布。

一八七〇年一月初，在柏林举行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迎合施韦泽的愿望而决议（好像工会会遵照这个决议似的）：到七月一日为止，把工会合并并创设一个新的协会，名为全德工会联合会。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又召开全德工人团体联合会代表大会。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施韦泽的建议。全德泥水木匠协会主席吕布克尔特认为，工会基本上无非是一个进行工人政治教育的预备学校。齐委夫斯基也赞成合并，这样一来，可以清除世界上大都使许多工会分裂的主席欲。哈尔特曼、沙尔麦耶尔和汉堡的法特尔也都赞成合并，所持的理由与前面的发言人相似。

在代表当中，一万二千五百票赞成合并，九千票反对。所以赞成解散工人团体联合会的虽然不足所规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但仍决议：从七月一日起，成立一个名为全德工人支援联合会的新协会来代替工人团体联合会。这个决议在有些工人团体中不生效力，它们于是还保持独立。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有一部分有势力的成员对工会的组织仍持敌对态度，所以在一八七二年它的代表大会上特耳克还提议，大会应决议，党内除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外现存的一切组合，如全德工人支援联合会、柏林工人同盟、全德泥水匠协会、全德木匠协会和所有属于这些的分支机构应予解散，并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它们的成员也转到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是这个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大会无权解散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外的现有组织。

除特耳克外，其他领袖对于工会的看法，表现在譬如哈森克莱维尔的发言里面，他说：“如果同盟”（柏林工人同盟）“已达到了它的目的，那么我们自己就会负责再使它消失。”哈赛尔曼说：“我们所以要创设同盟，只是为了要把这些工人吸引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我们做得也很成功。我们并不想使同盟做什么特别的事，它只是

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格罗特考和其他的人所说的与此相仿。最后通过了以下的建議：

“代表大会希望尽早地把我們党内現有的职工組織予以解散，把成員輸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有責任照这个意义去工作。”

202 如果人們可以相信門德（他的报告就我所知並沒有遭到反駁），那末，施韦泽也就是这样在一八六九年春季同門德和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所訂的协定中（我以后再談）答应了他們，认为工会組織是与拉薩尔的观点相矛盾的，要使它越来越退到后面。到后来，全德工人联合会才把見解改变得有利于工会。

我們履行了經伦堡联合大会所分配給萊比錫中央的任务，并为职工联合会起草一个标准章程，起草的任务又落到我身上。章程一拟好，就有許多人向各組織要求从事創設国际职工联合会（这是我們所选用的名称）的活动。我自己也动手，这时为創設这类职工联合会曾举行許多次集会。“国际职工联合会”这个名称本来有点过份，因为我們估計，只能吸收說德意志語的国家的职工到組織里来。这个名称主要是表明一种倾向。接着又成立了許多这类組織，如手工工場、工厂和手工工人的国际职工联合会、泥水匠和木匠、五金工人、伐木工人、裁縫、毛皮匠和制帽工人、鞋匠、訂书工人、采矿和冶金工人等等的国际职工联合会。

不容否认，政治运动在分裂的情况下已吃到苦头，而工会运动则在分裂的情况下吃到更大得多的苦头。但沒有哪个党派願意放弃工会的創設，因为每个党派都认为借此可以加强自己的势力。至于分裂有如何不幸的作用，特别是由弗里茨舍在次年亲身体驗到了，那时由于党派的激烈斗争，他的联合会的會員由約九千人减少到二千多一点。在汉堡—阿尔托那他失去了全部會員。誠然，

这个挫折有一部分应归咎于柏林和莱比锡的烟叶工人生产合作社的破产，这些生产合作社是在罢工失败后成立的。

我們在萊比錫尽力防止工会运动中的冲突。一八六八年十月底，我們与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联合召开工人大会，参加者十分踊跃，議程是“职工联合会”，由李卜克内西作报告并提出下列決議： 203

“考虑到，有必要按照英国职工会的模型来成立工会，为了組織工人阶级，以便保护和促进他們的利益和提高他們的阶级觉悟；

还考虑到，通过各种工人代表大会的決議，已发动并开始成立职工联合会，这次大会決議，要有毅力地組織这样的工会，并为这个目的选举一个委员会，委托該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尤須与工人阶级的管理机构等等取得联系。”

随后选举委员会，被选入委员会的，除李卜克内西和我而外，还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赛菲尔特和道特。委员会邀请一切工会組織的会员前来商討組織工会的事宜。这个集会由我做主席，并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拟訂的下列決議案：

“會議決議：由紐倫堡工人协会联合大会的多数派和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多数派所已成立的以及要成立的职工联合会都应致力于：

1. 由双方互相商定，为了統一和合并的目的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

2. 在統一和合并之前，双方的职工联合会之間訂立条約关系，双方的會計处尤要互相支援，并且只要可能就选举一个共同的临时委员会；

3. 双方無論在何种情况下，都拒絕与希尔施—邓克尔派的职工联合会合作，該会是由工人的敌人建立的，其目的不外乎破坏工人組織，并把工人贬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在征求意见时却没有受到对方的欢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 204

日，施韦泽在第一四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个決議，据此全德工人团体联合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拒絕了我們的建議，并且要求，“对于任何为个别人的个人目的来分裂运动的企图，都要用全力反对”。

于是这个企图，至少是我們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之間在工会組織方面达成妥协的企图，在目前是沒有希望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大同情于工会运动，而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即哈茨費尔德—門德派，則簡直对它抱着敌对的情緒。在这里，他們把成立工会看做是損害当作宗教崇拜的拉薩尔的原则和拉薩尔的組織。所以在当时为成立工会而举行的多次集会中，有一次我也参加了在德累斯頓召开的这样的集会，在会上我們和福尔斯特林領導的哈茨費尔德—門德派信徒之間发生了激烈的紛爭。我在发言以后提議下列声明：

“考虑到，工人階級为防止资产階級剝削而組織起来是迫切必要的；此外还考虑到，依照工业最发达国家的先例和經驗，通过职工联合会能够最好地达到把全体工人階級組織起来，所以會議声明同意創立职工联合会，并委托所召集的委员会来进行組織职工联合会的必要步骤。”

接着进行討論，我发现，主席——一个拉薩尔分子——一再捏造发言人名单，我把这公开地指证出来，因而引起福尔斯特林和我激烈的个人爭論。福尔斯特林突然把會議停止，于是发生大吵大鬧。警务长要求与会者离开会场。瓦尔特希和我提出抗議，警务长解释說，他並沒有理由来解散會議，但既已閉会，如再續开即与法律抵触。于是他和福尔斯特林离开会场。在一部分与会者的激烈反对下，瓦尔特希重新开会，并把我选为主席。討論进行得很好，瓦尔特希作为第三个发言人，才开始讲话时，警务长又出現了，打断发言并且要求我閉会。我抗議說，現在沒有理由閉会。于是他



以解散相威胁，我在抗議中閉会。在这事上的激动非常剧烈，如果福尔斯特林在場的話，定給他留下一个不愉快的紀念。

关于工会問題，我們这方面又在一八六九年八月的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上提出討論。像施韦泽所要求的，接受會員要看他的政治信仰而定，尤为人所反对。格罗伊里希表示贊成国际組織，认为这最适合于使群众参加工会。资本家害怕群众，并不害怕我們那可怜的几分錢。最后經約尔克的建議通过一个有利于工会統一的決議案。莫特勒的要求工会从事締結再保險（卡特尔）的建議，也同样通过了。在斯图加特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八七〇年六月），工会問題又被列入議程。討論仍不脫旧日窠臼。主要的又是統一問題，但仍无实际的結果。自一八七一年起，工会趁普法战争结束后大繁荣时期的机会，大大发展起来；它現在也以较为独立的姿态出現。商业繁荣助长了一切行业中的无数次罢工，繁荣时期到一八七四年因发生商业大危机而驟然中止。但是这种现象也給当时的組織增加了許多不能胜任的負担，它为救济罢工工人所应筹措的資財已大大超过它的能力。早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底，这已使萊比錫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在長時間討論后，通过并公布下列決議案：

206

“1. 罢工只是个緩和剂，无助于长远利益；2. 社会民主党的目的不仅为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内部提高工資而努力，而且要根本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3. 在目前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之下，工資的水平是按照供求来調整的，即使用最有效的罢工也不能超过这种水平而不断提高；4. 最近时期多次罢工可以证明是由厂主主持的，为的是把这当作在集市期間抬高貨价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这样的罢工只是对厂主有利而不是对工人有利，他們所抬高的貨价远远超过所增加的工資；5. 罢工失败就会使厂主气焰高涨而工人沮丧——于是使我党蒙受双重損失；6. 大厂商甚至还能趁罢工期間

得到特別好处，因小厂商不能开工，大厂商可以高额赢利销售存货；

7. 我們的党目前还不能在物质上支援这样多的罢工。

因为这一切理由，我們迫切地向党员同志们劝告，只有在极其必要并且具备所需要的财力时，才可开始罢工；此外，不要再像以往那样无计划地进行，而是应该按照包括整个德意志在内的組織计划来行事。作为筹款和成立組織的最好办法，建議創設并維持职工联合会。”

在維也納，奥地利党内同志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意志报》也有类似的想法和劝告，因为那里的经济状况也特別順利，致使罢工热潮日益蔓延。劝告虽好，却极少照办。在那些年代中工会仍在令人可喜地发展着。

与此相反，施韦泽所創設的全德工人支援联合会在这时毫无生气。它的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全体大会，只有由二十七个地方来的代表十九人出席，代表會員四千二百七十五人。这个

207 联合会乃是一个不合理的組織，它完全崩溃了。

一八七二年六月中旬，在爱尔福特举行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会上特別討論了工会（职工会）的中央领导問題和另行創設一个工会机关报。六月八日，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闡明我的代表大会綱領，并詳述我认为最好的各工会联合的办法。我还說明，不容否认，工会运动在德国还处于相当混乱之中。这应归咎于工人分裂为苦苦地相互斗争的各种派別。如果說工人們在各种社会政治的組織中互相对立是不好的，那末，如果各个行业的工人在每个工厂，甚至在每个作坊中也分裂对立，那才是真正不好了。而且并不是因为原則問題，而只是因为組織形式，但組織形式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必須适应环境。这就是运动所遭遇的不幸。还有可悲的是，群众被沒良心的人所煽惑，这就表明，一部分工人苦于愚昧无知。人們在嘲笑基督教的頑固，但它总是經过了十八个世

紀，因而达到了当然頑固的年齡。但是新的社会运动才十岁，就显示出頑固的征兆。这固然还可克服，但在目前它阻碍了发展……工人阶级的前途依靠着职工联合会；正是在联合会里群众得到阶级觉悟，学会对資本势力进行斗争，并且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使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随后我把我的关于組織的建議作了詳細的分析。

在爱尔福特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決議由代表手工工場和工厂工人、五金工人、伐木工人、裁縫、鞋匠、泥水匠和各种专业协会的六个工会組織組成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发行一种工会机关报《工会》报。根据約尔克的建議，全体一致通过下列議案：

208

“鉴于資本势力对于一切工人，不管他們是保守的、进步的、自由主义的或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样狠狠地压迫和剝削，大会声明，工人的神圣职责，就是消除一切党派爭吵，以便在一个统一的工会組織的不偏不倚的基础上，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强有力的反抗創造先决条件，保卫被威胁的生活，并为阶级地位的改善而奋斗。尤其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派别要竭力促进工会运动，大会表示遺憾的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柏林）作了一个相反的決議。”

我經過长期的要塞監禁和坐牢之后，于一八七五年春季恢复了自由，奥古斯特·盖布建議由我接替不幸于一八七五年元旦之夜逝世的杰出的約尔克，充当工会中央的報紙《工会》报的編輯。他认为月薪可望有五十塔勒。党和各工会在这期間經濟情况較好。盖布认为我除我的生意之外，还能很好地兼任編輯。我謝絕了。我不可能在我的生意和我的党务活动之外，又长久地从事工会活动。

这自然无碍于我依旧对工会运动注意和支持，特别是通过我为各种行业所举行的集会。当九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工会运动的发展很显著地落后于社会主义的政党运动，我觉得它好象注定要

有某种停顿，尤其是由于德意志保险法的制定，它夺去了工会作用的重要部分。这个看法我曾在一八九三年科伦的党员大会上公开发表。但是这种悲观是没有理由的。不久，事实就把我纠正过来。现在辉煌地证明了，我在运动才开始时关于工会的判断是比较正确的，并促使我重新尽我所能来协助工会。

在上述的七十年代，工会运动面临艰苦的时期。普鲁士政府，这就是说俾斯麦，不仅把社会民主党，而且也把工会看做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死敌。于是他认为有必要对两者进攻。俾斯麦的工具首先是检察官台森多尔夫，他在马格德堡时就已在这方面出了名。一八七四年，他被召到柏林，以便在这里在更高的水平上把在马格德堡已开始的迫害继续下去。台森多尔夫没有辜负对他的期望。他通过公断不仅达到对党组织实行镇压，就是各工会也成了公断的牺牲品。随后来了一八七八年这个行凶年和反社会党人法，这一下子就摧毁了十余年来工作中牺牲了无限时间、金钱、力量和健康所创造的成就。但是，这不是永久的。对于发展的压力和时代的需要，就是最强大的势力也不能持久抗拒。这一点俾斯麦现在不得不满怀诧异地体验到。

## 我的第一次判罪

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失政和宠臣弄权，使各反对党派联合举行暴力的反抗，结果是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底把伊萨贝拉赶走了。由于各反对党派领袖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讨论新政体问题而没有决定，各国的民主党以决议和请愿的形式向西班牙人民建议建立共和国。当然，我们认为还要更进一步，要劝告西班牙人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为此，几乎一切条件都还不具备。根据报纸

消息，国际的成员有六万多，可是大概有五万多向来没有登记，他们只是个幻想的产物。当时是个浮夸时代，这却对于国际有利。210  
听资产阶级的报纸说，国际在欧洲拥有上百万的成员，相应地，它的财力非常雄厚。老实的市民在他的报纸上读到，国际的出纳员只要打开巨大的钱柜，就可以给每次罢工几百万的钱来支用，他就惊惶失措。有一天晚上，我亲自看见和听到：在柏林报界协会的一个交际会上，坐在我的对面的普林士·史密斯同他的邻座亲密地说，他今天接到由布鲁塞尔来的信，提到国际总委员会发给博里纳日（比利时）的煤矿工人二百万法郎作为罢工之用。我竭力忍住笑。总委员会的账房能有二百万生丁<sup>①</sup>，它就会高兴了。总委员会有巨大的道义影响，但是金钱总是它最薄弱的一面。

在巴黎公社起义后的几年，这样夸大国际的力量也使俾斯麦上了当。他想举行一个国际会议来对付国际，在这事上，奥地利首相馮·博伊斯特先生情愿帮他的忙，虽则博伊斯特自己承认国际对于奥地利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这个美好计划的实行被英国政府打消了。并且不仅俾斯麦，就是像白恩哈第上校那样精明的外交家和谈判家也在国际这件事上大受蒙混。他在《太奥多尔·馮·白恩哈第的生平》一书中提到他的一个亲信报告说：

“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煽动将从伦敦和日内瓦热烈地继续进行，为的是革全欧洲的命，并且要唤起不仅政治革命，而且社会革命。这个革命是由伦敦和日内瓦的两个国际委员会来领导的。伦敦的委员会由路易·勃朗主持，日内瓦的委员会由菲利浦·貝克尔主持。革命先在巴黎发动，在那里得胜时，再向意大利，而后向导火物很多的南德意志扩展；但随后也要掌握住北德意志，在那里，他们同样有无数的联系，并且总要使整个欧洲面貌大改。他们首先 211

① 一生丁为百分之一法郎。——译者

到处竭力利用結社权，以军队方式把城市无产阶级組織起来。”

照白恩哈第所說，德国所有一切的主要城市都已在造反。运动的首脑就是施韦泽和倍倍尔。这种无稽之談竟由这些被认为很严肃的人們传播出来。

所說的《致西班牙人民书》是在一个集会上由李卜克内西申述理由，由我以會議主席身份宣讀并付表决的，因此把我們帶到审判官面前。最后把我們按散播禍国言論的罪名每人判处三星期監禁，直到将近一八六九年底——公文手續拖延这样长久——我們才在萊比錫地方法院監獄里服刑。

除因公布《致西班牙人民书》被控訴散播禍国言論而外，起初还打算兼控我們誹謗拿破侖皇帝之罪。但后者不能成立，因为不是拿破侖遵照法律規定亲自到庭作刑事控訴，而是由他的駐萊比錫公使前来。

至于西班牙革命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間接促起普法战争，当时还无人预料到。

## 巴門—爱北斐特代表大会以前

到一八六八年，我們同两个拉薩尔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但毫未因此改变我們为哈森克萊維尔在杜伊斯堡选区（一八六八年秋季）的选举进行募捐，和支持約尔克对民族自由党人普兰克教授（他后来是民法的主要助理編纂者和注解者）在蔡萊选区的最終选举。这两个措施足以证明，我們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和对他們的主席是有区别的。一八六九年三月初，我們在霍亨斯坦—艾恩斯塔爾召开一个全薩克森的工人會議，議程是“改革薩克森的結社法和选举法”。邀請书也由在薩克森的两个拉薩尔派的領袖連

署。在工人會議的前一天，我黨應舉行一次地方集會，議程是“職工聯合會”。但是哈茨費爾德—門德的計劃却作了另一決定。

當我於星期日早晨由米特維達一個集會向霍亨斯坦走來的時候，看見許多疲憊和滿身污穢的工人匆匆忙忙地跑向車站。我現在才知道，這些哈茨費爾德—門德的信徒，約有八十到一百人，在前一天夜晚由開姆尼茨來這裡闖進會場，要想把地方集會沖散。由此引起了巨大騷亂，最後演成暴行，因為警察已顯得無能為力，市長要求消防隊來恢復治安。瓦爾特希因抽出藏有刀劍的手杖而被逮捕，幾天後即被釋放。這些事件在全體居民中激起極大的憤怒，還導致地方集會的停開，我認為這是個重大錯誤，但已無法挽回。各方面都向我祝賀，因為當騷亂的時候，我幸而沒有在場；暴徒特別要找我，並恫嚇說要打倒我。

六個月以後（愛森納赫代表大會已經開過），我在開姆尼茨舉行一個巨大集會，取得了決定性的效果。在大會後，有一批工人來找我，他們都是參加過霍亨斯坦那次騷亂的，特來請求原諒；他們聲明，連他們自己也不再了解，他們當時怎麼會被煽動起來的。

李卜克內西和我早就願意能夠同約·巴·馮·施韋澤會面和辯論一次。這個願望意外迅速地實現了。二月十四日，一個由拉薩爾派在萊比錫召開的、李卜克內西和我都沒有參加的會議，決議邀請施韋澤和李卜克內西在一個公共集會上相會晤，並互相提出彼此的控訴。李卜克內西立即在《民主周刊》上聲明，他樂於接受這個決議並準備在一個民眾集會上同施韋澤晤面，並證明施韋澤（是為金錢或是出於愛好）從一八六四年底起，經常設法破壞工人黨的組織，並且玩弄俾斯麥的專制主義的把戲。如果施韋澤還像過去一次那樣迴避他，那麼他就準備——獨自一人或者同我一起——當著施韋澤的全權代理人 and 工人團體領袖的面去會見他，或者——獨自一人或者同我一起——到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大會

213

上陈述他控訴的緣由。

繼而他又建議，懇請国际总委员会作施韦泽和他自己之間的仲裁人。

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答复中先确认，施韦泽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几乎被全体一致地选为主席，因而获得了联合会的完全信任，然后回答说：“按照組織法，主席的行为只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負責。”施韦泽还在拘押中，他的决心，它——《社会民主党人报》——不能預知，但它相信能保证，他会对任何人，因而也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两位先生，在巴門—愛北斐特的代表大会上进行答辯。所以李卜克内西的話是完全被接受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不能对它的主席的事情进行仲裁。

我們对于这个显然是施韦泽亲自写的答复，非常滿意。在事态的过程中和它在两个陣营所引起的注意之下，施韦泽无法逃避。他决定准許我們参加代表大会，这是非常合我們的意的，虽则严格說来我們不应参加，因为我們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員。显然，施韦泽认为他在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間最易得到掩护，并且关着門在里面談判，他就最不至于被揭穿。

奇怪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三天以后声明，施韦泽将不与我們会面，因为我們无权参加代表大会。但是在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又把这条通知撤回。我們可以前往，而且施韦泽还要影响大会，使它准許我們参加。后来在巴門—愛北斐特，人們讀到的是另一个样子。

在接到参加代表大会的正式邀請书后，我們就出发前往。在卡塞尔，有一位先生进我們的車厢，我們认为他是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們的揣測被证实了。由談話中知道我們的旅伴是威廉·普范古赫，他也像我們对他一样，立刻猜到我們是誰。我們同往烏培尔河谷。



巴門—愛北斐特代表大會的經過和其後情形，我留在我的回憶錄的下一部分再來敘述；而且還要說明約·巴·馮·施韋澤和我們成為敵人的原因。

一八六九年對於德意志的工人運動是意義重大的一年。在這一年內，雖然先經過激烈鬥爭和消除許多誤會，才確定了正確路線，這些路線對於德意志工人運動的繼續發展，證明是有決定意義的。八月初，在愛森納赫代表大會上建立了德意志社會民主工黨，是為這個發展中的高峰。政治方面的情況也與前几年完全不同了。北德意志同盟的憲法使它的創始人——俾斯麥好像腹瀉如割，所以自由主義的要求自然遭到極慘的噩運，更不用說民主主義的要求了。自由主義者在這方面所抱的希望和期待顯然化為泡影。俾斯麥這個人不會不利用對自己有利的形勢而聽其消逝。他在衝突時期所經歷過的事件，他現在想一勞永逸地使它成為不可能。在這一點上，極大部分自由主義者迎合他。他們對於自己的有如上帝的姿態——作為頑強反對派的好漢——感到惶惶不安。普魯士的軍事制度全部地並且在相應擴充的情況下移交給北德意志同盟。對於海軍則播下第一批種子。部長責任制和議員公費都丟到垃圾堆里去了。俾斯麥成了國內形勢的絕對支配者。

215

自由資產階級在一切重要政治問題上對俾斯麥表示極為遷就，遷就竟至流為妾婦之道，而它的經濟要求卻完全如願以償，並按它的性質也滿足一些工人階級的要求。遷徙自由、取消護照限制、簡化結婚和定居手續，接着是一八六九年的工商業條例，在此期間都發生了法律效力。關稅議會一成立，在南德意志各邦參加之下，把關稅、商業和間接稅的立法也納入議會討論的範圍內。這樣一來，就開辟了一個活動園地，我將用全力協助耕耘這塊園地。如何耕耘和結果如何，將在第二部分中加以敘述。